

紅 樓 曉 書 系

# 死亡的 遐想

林 白 著

SUDDXX

上海书店出版社



# 死亡的遐想

林白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00K00.com.cn](http://www.B00K00.com.cn) 和/或 [www.B00K00.com](http://www.B00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00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00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00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 Inc. 的商标。

## 几句话的序

我的散文写作是一种个人化写作。它没有传统，缺乏规范。

个人化写作并不是一种风格，它只是一种立场，它以个体主体性来面对生命，这种写作所表现的世界也是个人的感官所感受到的世界。

以上所说的，并不是一种原则，所以这里所收的文章，也并不是按照什么原则写成的。不管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我写作它们一向没有太明确的原则，有的只是一些模糊的理想，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我，若原则比较强烈，甚至涉及到某种主义之类，可能写出来的就是别的东西了。

别的东西当然也好，只不过不是我的心性。

97年6月3日

进入

在黑暗中走进戏剧

戏剧对我来说非同寻常。再古板的正剧或再拙劣的喜剧都会感动我，使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在剧场的黑暗中静坐一旁的孤独景象跟我生活中的角色是如此相像，也许正是这种气氛和感觉打动了我。

我看见自己独自一人奔赴剧场，骑车的时候两旁的人流无声地哗哗流动，除了剧场的名字和戏名我的脑子空无一物。我的魂魄悬挂在头顶上方。把我全部的能量都吸纳在那里，它像一个无形但有质量的东西，这种质量就是与看戏有关的一切意识，此刻被全部调动与凝聚，悬在我头顶的上方。这时候我对的一切一无所感，我的身体凭着惯性向前游走，凭着惯性躲开车辆与人流，凭着惯性停下来，放好车。剧场的门口和台阶漫布着看戏的人。他们衣着体面、富有教养，我不认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从他们中间穿过，但我觉得我跟他们并不在同一个空间里。这种感觉有点像我看过的罗伯一葛

利叶的电影《去年在马里安巴》和《不凋的花》的某些场景、那里面的人像布景一样伫立不动。在我走进大门走上台阶穿过厅的的过程中，也觉得旁边的人像布景，我注意不到他们动还是不动。

然后我找着座位坐下来，这时我头顶悬着的东西消失了，或者是注进了我的体内，这时我才感觉到我在凝神屏息，等待大幕拉开。

奔赴剧场的念头强烈而急迫，我知道我不能让自己迟到。我第一次打面的就是要去看一出外地剧团进京演出的主旋律话剧。看任何戏我都害怕迟到，我对待它们就像对待贵宾，奔赴它们全都像奔赴节日，生怕迟到会削弱我的快乐。总之我所看过的一切戏，好戏、不那么好的戏、拙劣的戏，它们统统都是缀结在我过往岁月的珍珠，它们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地漂浮在时间中，它们聚合在一块，成为悬浮在我生活中的另一重生活。它们断续而完整，我在某些日子的夜晚手持门票纵身一跃就能侧身进入其中。平淡的戏是一重平淡的生活，尖利的戏是一重尖利的生活。有的戏是一汪浅水，我们撩拨几下从容退出；有的戏是深而无边的江河或海洋，将我们

彻底淹没，使我们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在好的戏剧面前，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海水生发器，迅速地把一切变成大海；然后我的身体在黑暗中变形为舞台上的一片灯光，悬挂在演员脸颊上的一滴眼泪；或者，就是那个人，那个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只要一旦被一种神秘的东西所触碰，我就会成为他（她），我内心的嚎啕被这个胸腔所放出，回荡在剧场的上空，如同一种闪电。我的尖叫和私语被一条秘密的通道送到舞台上那些被灯光笼罩的人们的身上。通过他们，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明亮中飞翔，这种飞翔使我感动。

我在黑暗中感动，泪光闪闪，忘却一切。

突然座位上方的灯亮了，我一下子暴露在亮光中。我回荡在剧场上方的声音被突然切断，舞台和我的距离迅速拉开，我身在那片纯净的光亮随即抛弃了我，它们被厚实的大幕所挡住；大幕再次启开舞台上的人面目全非，让我感到陌生和不解。就在大幕的开启与闭合中，原先台上的那片奇妙的亮光离我越来越远，最后它们完全消失了。台上来回奔跑着一些看起来毫不讲理的人，他们搬动着东西，台上的光线已经变得跟台下

的、我身边的光线一样混浊多尘。这时我确认我的确是被放逐到尘世里来了。灰尘在弥漫，剧场工作人员扫地的声音此起彼伏。

一次我得到一张前座一排的票去看人艺的《推销员之死》，那么近的位置使我能听清楚演员呼吸的气息，尤其是到了最后，朱琳身着黑色的丧服坐在舞台跟前的台阶上，近在咫尺，我一伸手就能碰着她。有的人不喜欢真人面对面的表演、念台词、觉得那样滑稽、不真实，但我对戏剧的热情压倒了一切，使我对舞台和现实产生一种倒错感，我觉得这个戏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真实，而现实则混乱不堪毫不可取。看完此戏之后的好几天我还对周围的一切不感兴趣，没有感觉。我沉浸在舞台上的那片灯光中，它牢牢地笼罩着我，我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日常的街道、汽车、人流、办公桌，而是那片旋转的绿色光斑，它像繁花舞台上开放和凋谢，把一种诗意的东西从一个远不可及的地方发送到这里，整个舞台充满了芬芳和欢乐的气息。朱琳穿着连衣裙，系着白色洁净的围裙，一转身就到了这片旋转着的绿色光斑下面，旋转的光斑一片片地从她身上掠过，就像是从她身上直



接涌出来的浅绿色花朵，它们明暗闪烁，从她身上涌出，又回到她身体的深处。她年轻而美丽，携带着整个春天从我的眼睛一直注入我的心里。这是英若诚（饰推销员）在回忆他们盛年时的美好时光。这个场面是如此打动我，直到现在，当我怀着疼痛抚摸它我的眼里仍然充满了泪水。我觉得它所包含的美是如此丰富和奇妙，以至于我根本无法真正进入它，它对于我，永远如同冰山之上的明月，光华四射而又永难企及。

### 德尔沃的月光

我迷恋月光下的事物由来已久，月光在我的记忆中，神秘而荒凉，它的阴影和清辉，以及月光下伫立不动的人、树木、接近明月的难以企及的高山，在这个夏天向我散发出阴凉的美感。

在这个夏天，我第一次与保尔·德尔沃相遇，这种相遇使我与他的作品（油画印刷品）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我总是下意识地把登有他油画的杂志放在明显的地方、这个地方常常是不固定的，有时是书桌的左上方，那是在写作的间歇总要注意的地方，有时是床头柜，在睡觉之前和起床后第一眼就看到，有时是餐桌。

我还莫名其妙地把这本杂志带着上班，我把它放在一个敞口的纸提袋里，搁在自行车的前筐，我在骑车的时候无意一瞥，就能从敞开的提袋看到杂志封底德尔沃月光弥漫的油画局部。这种下意识的动作反过来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这本神奇的杂志不是一本，而是许多本。它们同时被我置放在书桌、床头柜、餐桌、办公室等等，它们环绕着我，散发出非同寻常的月光。

我没有找到德尔沃的其他作品。我反复观赏的只有这本杂志中选载的五幅，其中两幅是黑白的题图，两幅是彩色插页，一幅在封底，是油画的局部。他的月光是梦幻中的月光，我们永远无法从眼前相同的事物中找到一点相同的质地（这跟当代和城市有关，高楼和霓虹灯早就隔断和污染了它，我们也早就忘记了它最初的样子），德尔沃，他所再现的遥远的国度的遥远的月光，我不知道它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笑容的夜晚，幽寒的弯月高悬，惨淡的清辉遍洒，月光下的裸体女郎，神色呆滞、表情木然、神不守舍，我无比喜爱她们。

德尔沃使我在心里再造了一片月光，这片月光广大而阴影重重，近于巫术地在我所到之处的白天和黑夜弥

漫，我在这片虚拟的月光中睡眠，远去的年代从月光的阴影中渐渐涌动，覆盖过我的头顶。

## 看牟森的话剧

听说有牟森的话剧许多人都赶去了，黑黝黝的后圆恩寺胡同布满了热爱戏剧的人们，肩披长发的男孩和光头男孩，漂亮的女孩和古怪的女孩，奇装异服，宽大得像戏装的披风和古怪得匪夷所思的帽子，化了妆的中年淑女，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也许是多年前走红的演员，对舞台有着超出常态的迷恋，在舞台灯光的笼罩下她们将重返往日，此后她们将沉浸在这种满足之中，直到下一次另一出戏的上演），外国人，金发的男女青年，他们一见面就互相亲吻脸颊，然后温和地微笑。

他们色彩丰富地漫步在胡同里，使人目不暇接，就像赶赴一个盛大的化妆舞会，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他们夸张地互相招呼，眼睛里全是会意的眼神。

然后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了一张与这样一出戏剧相配的节目单，有的举着大张的招贴画，它们设计得蛊惑人心，一名饱经沧桑的美丽女郎从阴影中神秘地浮现，

令我们产生无限的期待（后来我们发现这位女郎跟这出戏毫无关系，这使我们深深地失望，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这长着美丽的嘴唇和眼睛的女郎，当许多时日过去，我们将不再记得这出戏剧，关于它我们只记得它的名字、两扇切成两半的有着猪头和猪尾巴的整猪、舞台上蒸笼上方冒出的蒸气、弥漫在整个剧场的炸丸子的油烟味、十几个戴着白围裙的厨房操作者，以及座位周围垒起的有椅子那么高的红砖。它们确实跟那个在阴影中浮现的女郎毫无关系，它们以太平常、太令人不快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越到后来我们越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一出先锋戏剧还是我们在一个杂乱无章的集体厨房里看到的日常性动作和景象）。这张节目单设计讲究、印刷精美、纸张优良，与我们后来看到的戏毫不相称。当时我们手上拿到它，心里一阵激动，封面上印着的几个外国演员的头像和充满整个封底的阴影中的女郎使我们一下得到了一种提升，我们一下就感到远离了这条胡同，或者这胡同一下就变得不那么真实，我们一时觉得这份说明书的设计是如此高雅，以至于我们一看到它就知道这里饱含着最最艺术的特质，艺术这种高级的东西沿着我们的手臂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悬挂在我们的脸上，

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在这一刻自认为成了艺术人。说明书上方参加演出

者的名单上表明身份的“现代舞者”、“自由职业者”、“独立制片人”等字眼以它们新鲜的面目在我们的眼前飞舞，它们造成的光环使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白天的日常身份，我们手举说明书、脸上发出会心的微笑，我们立即发现周围的人均如此、一种类似《国际歌》的旋律在我们的心中同时升起。

我们展开 16 开的说明书。它从容而出人意料地变成了 4 开，各个部分的位置纷纷发生了变化，阴影中的女郎在剧情说明的下方，而另一面，则布满了艾滋病常识：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是怎样得来的？会不会从普通社交接触中感染到艾滋病？是否所有受 HIV 感杂的人都会患上艾滋病？如何减少染上艾滋病的危险性？其间充满了严肃的告诫，如。在进行性关系时使用避孕套。不要共用注射器。只和单一的伴侣发生性关系，等等、我们既疑惑又兴奋，不知道这出《与艾滋病有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被“献给十二月一日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重

新集合。这句庄严而神圣的献辞使我们变得严肃。我们严肃地走进了剧场，在狭窄的过道里（后来我们悟到这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些高过我们头顶的铁皮把我们行进的空间搞得如此狭窄是否是一种象征？我们看到了密集的招贴上坚定的献辞，这种坚定和我们的内心感觉和谐一致。

进入剧场。

这两样主要的东西使整个座池像一个建筑工地，铁板缺乏固定地一片片平铺在地上，一脚踩下去，另一头就会翘起来，抬脚的同时铁板撞击的声音轰然而起，这种装置连同上千号热爱戏剧（同时也热爱行为艺术、热爱装置艺术）的观众发出了嘈杂而热烈的响声，弄得比真正的轧钢现场还要热切而真挚。这种铁板撞击的声音一直伴随到终场，只要有人走动，铁板的声音就会出现。走动和噪音，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这出戏的要素之一，抑或是二者都是要素。

走动的类型有以下各种：观众的走动，置身其中，你会觉得坐在哪里都不合适，或者发现大衣的衣角已碰到了边上围起的砖块，或者脚下不平（脚下永远也不会

平整)，座椅摇晃，或者座位矮了看不清舞台上什么东西在冒烟（我们凭直觉认为，台上冒烟的是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看不清它我们将无从搞明白此剧的全部内容），或者太高了视线不好，在剧场后三分之一的地方做成了一个半人高的台地，上面堆满了红色的砖，我们如果来晚了，一般就会选择这些砖作为我们的座位，我们把刚刚拿到的说明书或者招贴铺在砖上。坐在砖上使我们姿势不雅，我们每隔 3 分钟就不得不换一次坐姿（开场不太久我们还会发现，我们的选择最终还是错误的。随着音乐声骤起，货真价实的民工就把我们赶起来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民工进来民，民的大潮汹涌澎湃，其实他们只有 13 个人，他们对我们说“起来”、“快起来”，我们不解地望着他们，我仍坐着不动。身旁的民工举着一块砖头向我做砸脑袋状，我们连忙站起来。我们声势浩大地开始了垒砖运动，使场内的音响效果无比壮观，第一次达到了高潮）。

观众的走动还意味着退场，从开演的十几分钟到最后，一直有人陆续退场，没有太多的人能忍受这样一出戏，它只是从剁馅开始到把包子蒸熟到吃的过程，我们

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赶到这里来，发现我们看到的是  
一出比生活本身还要乏味的戏，我们一忍再忍之后终于  
退场。事后我们对此感到奇怪，我们能够忍受整整一生  
乏味的生活，却不能忍受两个小时一点也不比生活更乏  
味的（谁能说做包了比生活本身更乏味呢？）戏剧。

走动的另一种类型是民工，他们在剧场内进进出出，  
他们衣服单薄，耸着肩，把手放在裤袋里，他们从不坐  
下，有时蹲在后面台地的砖丛中，有时站在半截砖墙的  
旁边，他们走进剧场不是为了看戏，他们不看台上，他  
们确实觉得台上一无可看，于是他们只看座池里的人，  
一个个怪男俊女，奇装异服，民工从来没有如此集中地  
看到这样多肩披长发的男孩，他们觉得这台下的人比台  
上的人好看多了。他们一边看人一边把铺在地上的铁板  
踩得山响。我们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来参加演出的，他  
们的一切行为都是这个晚上巨大的行为艺术的组成部  
分，他们垒砖的时候有人问：你们这是干什么？他们响  
亮地回答：演出！又问：怎么这样演出呢？他们高深莫  
测地答说：这是戏剧。

然后，还有一个不停走动的人，他手持手电筒，



游走在剧场的每一个角落，他大声地阻止那些吸烟的人，让他们看舞台两侧用红光打出来的字：“场内严禁吸烟”、“场内严禁喧哗”（与此相反的是台上真正的煤炉在燃着真正的煤火，真正的煤烟正从容地扩散到场内的任何一处，同时炉子上的油锅里正在炸肉丸子，烧焦的油烟比香烟一百倍地呛鼻；有什么喧哗比得上铁板的撞击？这使我们感到这种对比大有深意），他大声地声明要罚款，人家掐灭了烟头他还在继续唠叨，他没话找话，直到全场没有人吸烟他还在寻找目标维持秩序。当我们最后发现连民工都是这出戏的演员的时候，我们怀疑这个维持秩序的人（他还到前排驱赶那些拍摄者，但在同一个位置录像的人却在他的保护之中）亦是剧中人。没有人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无法弄清事实。

台上蒸笼冒出的气体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们白而浓，不停地上升、消失，它们从最大号的蒸笼（有一张圆桌那么大）升起因体积庞大而夺目，它的日常性从一开始就弥漫不绝，越到后面越浓厚、最后我们发现这片庞大的蒸气不是什么奇怪、深奥和神秘的雾气，它跟任何离奇的事物（比如艾滋病）无关，它的用处仅

仅是用来蒸熟包子，它蒸熟的包子将由最普通的民工（我们一出门就会看见许多）吃到肚子里去。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进场首先看到了它，我们警惕地望着这蒸气，充满了新鲜的感觉。我们曾经习惯布景上若隐若现袅袅远去的炊烟所展现的诗意，对眼前直截了当的蒸气不知所措，它庸常而温和，跟我们的前卫期待毫不相干，看见它我们也许立即想到孟京辉《思凡》中作为目光的镜子和林兆华《浮士德》中的大铁架，这铁架既是牢笼（囚禁了失贞的葛莱卿）又是升往天堂之梯（我们看到死去的浮士德站在铁架上缓缓上升）。

对于这团庸常的蒸气我们能指望什么呢？

与这团蒸气相对的另一边是另一个炉子，它冒出的烟灰色而细小，我们总是较迟才能看到它，它是比庞大的蒸气更为普通的事物。紧靠着它的是一张大案桌，一看到它我们总是首先想到块状的猪肉、整扇的排骨、带毛的猪尾巴和猪蹄子，以及白光闪闪头尖背厚的大刀。很快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会使我们大吃一惊呢？总是没有。

肉案的确就是用来剁肉的，除此之外它没有被用来派别的用场。

台上后半部分从右到左贯穿着另一个案台，上面堆着一些大白菜，跟这个季节里任何一个胡同看到的大白菜毫无二致，以及胡萝卜，以及大葱。水龙头是我们后来才发现的，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在流出真正的水。

总之，这一切就是全部。

这一切怎样跟艾滋病发生联系呢？蒸气吗？肉案吗？炉子吗？大田菜吗？水龙头吗？

当台下的铁板不停地撞击，椅子不停地被搬动，人流不停地涌入，台上的庸常的事物静静地冒着各自的气息。它们一直没有动静，开演的时刻过去了它们还是没有动静，我们一边不耐烦地望着它们一边想：

它们怎样跟艾滋病发生联系呢？

这个问题像灯光一样伴随着这出戏的始终，到最后也没有得到答案，我不停地移动我的座位，无论我移到哪里，总是听见有人在问他身旁的伙伴：这到底跟艾滋病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等待开场。

有两个穿着不太干净的白色厨师服的人肩背着一扇猪肉上场了，他们喘着气，重重地放下猪肉，又重重地挂到铁钩上，任何钩子都容易被我们忽略，除非它们挂上东西，于是一扇长而血迹清晰的猪肉自始至终正对着我们。另一扇很快就被放到了肉案上，这两个人整个上半场都在忙着切肉和剁肉。

其余的人陆续出来，每一个都像一些在大厨房里干了10年以上的人，他们的白色工作服和围裙皱而疲软且有油污的痕迹，一个个相貌平常其貌不扬，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中间有诗人、独立制片人、摄影师，我们早就知道了于坚，这位当今最出色的诗人，我们睁大眼睛在这些庸常的厨师中寻找他，在我们残余的诗歌热情中我们不时听到他的名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唯一能听到的诗人的名字，硕果仅存，茫茫夜空中最后一颗星星，他现在化身为厨师出场了，头戴滑稽的白长帽，淹没在人丛中。我们从类同的衣服和帽子中寻找脸和眼睛。它们在这片庸常的蒸气、炉子、白菜和猪肉中变得难以辨认。

我们残存的记忆想起了诗人于坚早年的杰作，《尚义街六号》和后来的杰作《O 档案》，对于前者我们倒背如流，对于后者我们只知道它的标题。时代已经不同了，《尚义街六号》写于 1984 年 6 月，10 年已经过去踪影全无，我们忽然感慨万分，散场之后我们将越回到某个阴冷的小屋，在这个夜晚，尚义街六号将越过 10 年的时光再次与我们相遇。

当年我们无比热爱这首诗，读到这首诗我十二分激动，读了 5 遍之后抄到了本子上，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总是把“于坚”这个名字挂在嘴边，到图书馆翻遍所有的文学刊物寻找这个人的诗。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忘掉了，抄诗的本子也不知道散落在何方。我们曾经熟知的许多名字都已消失不见，我们对他们遗忘已久，甚至舒婷（不久前有人告诉我舒婷到武汉签名售书，我一时问道：舒婷是谁？告诉我这一消息的人十分震惊，她说：你连舒婷都不知道了？她没有告诉我，过了大约 5 分钟我才想起来舒婷原来是诗人舒婷，她的诗曾经使我彻夜难眠泪而满面），甚至顾城，如果他不杀妻自刎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我们一样会把他忘掉。

有一天我们在北大校园看到了一本诗集叫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我们重新想起了“于坚”这个名字。

后来我们买下了这本诗集。

这是我们 5 年来第一次购买诗集。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购买诗集尚未可知。

正是凭了这本诗集上的照片我们辨认出了舞台上的诗人于坚，那个个子最矮其貌不扬戴着一顶长长的白帽子的人就是他，他在那里剁肉和掌勺，十分普通。第一次高潮到来的时候音乐骤起，所有的人聚集到舞台的中央排成一个倒三角形，他们开始跳一种奇怪的舞，站在最前面的小伙子肩上长发飘扬，据说这名现代舞者赴美学习现代舞达 3 年之久现在刚刚回来。

他们踏着步子做着鸟（或者别的什么）的姿势，诗人于坚站在舞台最右前方不住嘴地叙述，微型话筒已经插到了他的衣服上，他的声音我们听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一点也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他满口云南普通话浓得化不开，声音又大又快，既像机关枪又像冰雹，令我们遗憾万分。

在这个第一次的高潮中，于坚在边缘的角落里快速地说着云南的鸟语，所有的人在舞台的中间跳舞，他们的动作也像某种鸟类。一种动人的音乐升起，民工们开始垒墙，他们把我们从砖头上赶开，然后响亮而快捷地从已有的地基上垒上砖块，他们正在把我们围起来，但我们沉浸在难得的也许是这出戏中唯一有观赏价值的短暂的高潮中，对这种包围一无所知。

这跟艾滋病有什么关系呢？

女人们穿着颜色暗淡式样陈旧的宽大毛衣，她们趿着拖鞋，头发随便扎着一把，她们跟我们在大街上、单位里以及一切公开场合见到的女人不一样，那是一些多少总是经过修饰，或梳了头、或涂了口红、或者穿戴整齐的女人，正是这些街上走着的整齐的女人，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回到家要自己动手做饭，她们于是换过衣服趿了拖鞋系上围裙，她们在家里除了做饭还要洗碗，除了洗碗还要拖地，还要洗衣服，还要哄孩子，所以她们总是披头散发蓬头垢面，一直到老。女人们的这种形象结了婚的男人女人都十分熟悉。蓬头垢面的女人令许多丈夫厌恶，虽然他们从来不说，但他们从心里感到家庭里

没有真正美丽的女人，他们总是受到外面女人（女朋友、女同事、大学生，以及风尘女子）的诱惑，这种诱惑成为深渊使一些男人遭受没顶之灾。

我们本来指望在舞台上看到一些美丽的女人（这是每一个人心中的隐秘愿望），结果却看到了这些与一切家庭的厨房里毫无二致的女人，她们只不过是在这个与舞台一般大的厨房里，这个大厨房有灯光照着，有一面敞开着，底下有千把人仰着脖子费解地望着她们。

当她们全部出齐的时候我们看到她们一共 5 个，毫无特色，自始至终几乎不说话，同时我们看到台上的男性厨房工作者是 8 个，变化缓慢的舞台使我们百无聊赖，我们无事可干只好数起数来，这样我们就发现 5 女 8 男加起来一共是 13 个人。

一共 13 个。13 这个数字使我们在百无聊赖中感到了一种意味，我们闪电般地想到那顿 13 个人的最后晚餐。他们确实是在准备晚餐，蒸气、面粉、大白菜、猪肉，全都证实着这一点，之后谁来赴晚餐我们尚未猜到。

他们从容地干着自己的事，大概分成 3 组，一组揉面，一组剁肉捅炉子，一组洗菜切菜抹桌子拖地。



这跟艾滋病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词使我们想到性、想到同性恋或双性恋，想到性乱、注射器、注射毒品的人、避孕套、床单、毛巾、剃刀或任何可以割破皮肤的用具。未经妥善消毒的文身、穿耳。怀孕的母亲，以及豪华宾馆、双人床、低垂的窗帘。豪华的和末流的歌舞厅、黑色的丝袜、鲜红如血的口红与嘴唇、暧昧的目光与公然的媚眼、大腿和浴缸、枕头和沙发，以及卡拉 OK 的包厢里暗设的通道。

我们觉得这些跟艾滋病有关，所有性乱、同性恋的行为像灰尘一样沾满在以上事物的表面和深处，那种被称作 HIV 的病毒像肺炎病毒附在浓痰那样附在这些行为中漫天飘飞。它们跟大白菜和炉子没有关系。

他们揉面、剁肉、洗白菜，他们做包子、炸丸子，全场充满了呛鼻的油烟味，掌勺的人一边炸一边吃，女人晃晃荡荡地也踱到油锅跟前用手抓起丸子往嘴里进，一切真是没劲透了。

这跟艾滋病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越来越没有了耐心，我们心中的那个巨大的问

题、那个驱使我们坐下去的问题、那个我们一拿到这出戏的说明书就存在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像一只巨大的蜘蛛网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心烦气躁极不舒服。

我们中的许多人陆续离开。他们一无所获地离开。我们中的一半人坚持到最后，到了最后我们发现还是什么也没有等到

话筒在台上移来移去，我们总能听见他们在说话，但我们从来听不出完整的有意义的话，我们听见一些破碎不堪的字眼，北京……天气……物价……，我们不明白北京天气物价如何，我们听得心里着急，最后我们只好放弃倾听。台上的变化是如此缓慢，我们也不再仰着脖子看了，我们站起来寻找我们的同伴，然后凑到一块说话，时候尚早，我们边说话边等待最后的结果。

我们等来了第二次高潮，第二次高潮是第一次高潮的重复，音乐响起，所有的人集中到台中央跳一种现代舞，民工再次来到我们身旁或身后，再次响亮而迅捷地垒墙，这时我们发现这堵围在四周的红墙已经有半人高了，我们不可能从容地走出剧场了。曾经受过种种稀奇

古怪行为艺术（比如亲自孵蛋、比如全身涂满油彩裸体站在展厅里、打枪、弄两头猪交媾等等）熏陶的我们立即想到我们应该集体推倒这堵围墙然后突围。这个念头使我们喜欢寻找刺激的内心获得了一定满足。

我们开始等待结束。

这种等待已经好受一些了，我们看到包子已经放进了蒸笼，它们蒸熟的时间将以分来计。

最后包子蒸好了，13名做包子的男女退场。13名用围墙把我们围起来的民工上台吃包子。灯光暗下来，笼罩在长形的餐桌上。这长形的餐桌跟我们在那幅名画里看到的十分相像。

一切就结束了。

结束的时候民工们谢幕。

这跟艾滋病有什么关系呢？

类似问题再次来到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以为会听到与艾滋病有关的自述，以为类似这样的自白将遍布这出新鲜的话剧，正如说明书上说的“讲述你自己”，但我们没有再听到，一切就结束了。

## 滞留的时光

帕斯有一句诗：照片，一条语言链条上停滞的时间。对我来说只有黑白照片才够得上是滞留的时光，我从来认为彩色照片反映的只是事物的表面，而事物的深处本来是黑白的。那些从事物深处浮现出来的黑色白色和灰色，构成了时光的面容，它们和现在中断了联系，是真正滞留在过去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彩色照片，它们跟现实联系得太紧，缺乏一种中断和阻隔，因而也就丧失了审美的距离。我们会误认为彩色照片里的地方是我们能够到达的地方，彩色照片里的人正是与我们共同生活在此时的人，因此它们毫无神秘感和美感。而黑白照片里的世界是我们无法到达的世界，它悬浮在色彩中的现实感被过滤掉了，那些由黑白两色构成的东西是一种类似于灵魂一样的东西，存活在另一种时空中，与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能够打通：又如同一种经过了抽象了东西，按照古怪的规则排列在一起，我们一眼并不能把它们看透，所以我们才要久久地凝视，在凝视中表达我们对已逝时光的尊敬。

在黑白照片中，我所喜欢的并不是那种把景物处理

成水墨画的所谓的淡淡的美，据说那非常的美，而且需要高超的技巧，并且已经有了不少大师。与这样的杰作相比，我更愿意看《南方周末》上的写真版，喜欢那种真的人生对我造成的冲击与震撼的力量。

我越来越对美的愉悦产生反感，现阶段我甚至有一种极端的想法：具有力度的美才是最高的美。对摄影来说，来自平面的视觉冲击、压迫、震撼才是有价值的和值得保存的。

97 年 6 月 11 日

## 命名的过程

我把一部长篇小说命名为《彩虹组章》的想法跟一次音乐会有关。

1994 年 10 月 8 日，我到北京音乐厅看伦敦学会乐团的演出，虽然这只是一个室内乐队，它无法给我带来交响乐的灿烂与恢宏，但室内乐所特有的柔美与悠扬仍然吸引了我，使我在开演之前就预先感到了它精致的触觉。

我站在音乐厅的门口等票，我十分安静地等着，我当时觉得那些美好的声音全都在大门里关着，它们从一

些非常细小的缝隙中逸出，布满了门口的一溜空间，由于它们的分散和细小，我无法听见它们，但我所有的感官都感到了它们的笼罩，正是这种笼罩使我身心安静。

我刚坐下乐声就起来了，那是一种非常真实、伸手即可触及的声音，就像一种无形却又可感的丝绸直接从台上飘下来，直达我的内心。我想这种质是绝不可以被复制的，任何高级的 CD、完善的音响都无法再现它。我曾多次到音乐厅常听演奏，但这次音质的纯粹更鲜明地打动了，平日我们总是陶醉于音响，真实的乐声渐渐远离，复制的东西与真实的东西是永不可同日而语的。难怪法国音乐大师梅西安一生尽量去听真实的音乐厅演奏，直到晚年行走不便才在家里听音乐。所以我想声音的复制必须全息复制，不光是正面立体和立林环绕，那样全息的声音在不同的空间位置上显现，到处都有焦点，遍及前后左右上下八方。不过即使是全息复制，也无法与真实的声音相媲美。

我一开始就沉浸在声音中，第一个曲子演奏完了我才注意到演奏者，有 7 位穿着不同颜色的露背长裙的女子分布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贝司中间，她

们裙子的颜色分别是：深蓝、宝石蓝、深紫、浅紫、墨绿、紫红、深玫瑰红，这 7 样浓重的颜色分布在身着黑色晚礼服的男乐手中间，使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从台上弥散出来。事后我对自己从声音的盛宴中走神，感官轻易就被色彩夺走的现象感到不解，但事实上确是这样。

接下来是本杰明·布雷顿的《光明》组歌，组歌这种形式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我作品的构想之中的。

《光明》组歌的歌词是布雷顿从亚瑟·瑞姆勃德的诗集中精选出来的，诗人在 1870 和 1873 年间创作了大量不可思议的幻觉般的诗文，然后在他 19 岁时永远放弃了写作。大约有 40 首诗及散文诗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这些作品取名为《光明》。这些诗文原本并没有要自成一体、是它们经常重复的格调和形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些诗充满了逃离现实的狂乱行为，既华丽夺目又怪诞荒唐，相反性质的事物在其中并列出现：无知与经验，感觉上的美与丑，美妙与平庸。布雷顿从诗集中挑选了 8 首，并从两首长诗中删去了他认为不适宜谱曲的若干章节，组歌强调了《光明》的主题思想之一：诗人就像一位魔

法大师，可以任意地唤起或摧毁各种意识、布雷顿把组歌从一种非常自信、充满活力的质地逐步演变到一个孤独静止的意境，从而创造了他最为值得记忆的音乐。

我的追忆支离破碎，不足为凭，在当时，《光明》组歌就像一种特殊的水流在我的眼前汇聚，我意识到它与我有一种隐秘的联系，它将对我的某些日子、某些作品起作用，我安静地凝听和仰望着它，我看见它的水流汇聚成了大海，海水涌流，波光闪耀，声音在波浪上滑动，最后在《离去》那简洁明了的乐声中，我眼中的海水向两边分开，7种颜色的长裙从海底再次露出，并且升起，犹如风华绝代的彩虹。

就是这个时候，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将要写作一部名为《彩虹组章》的作品，从这一刻起，它将跟随我，直到最后。



## 遐想与睡眠

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种带毒的液汁，稀薄而尖利，如同月光与刀刃。

有一次我在桌上看见她的牙齿从墙与墙接合的地方伸出来，我伸出我的手指触摸它，一种被冰激痛的感觉立即传导到我体内的最深处。有一声叫喊，多少年来我就想喊出，这声叫喊憋在喉咙里，藏匿在一切幽暗的地方以及遍布我全身的细微之处，每一点冰冷的感觉都会使它颤栗，使隐藏的声音隐隐飘动。

多年来我怀着一个愿望，希望通过隐秘而细长的通道把那一声嚎叫发送到人群稠密的上空，它面目丑陋、布满皱纹、伤痕累累，又如同一名面目不清的超人飞翔在城市的上空，气流呼呼地发出怪叫，连同我的那声嚎叫呼呼地飞扬，我全部的身体被我自己射出去，那后面的力量就是冰冷的感觉。

我记忆中的那个人，她的全身都是橄榄色的液汁，这种颜色艳丽而幽香，令我心碎。她的牙齿比冰还要冷，

那种冰冷的感觉就在我的口腔中。

如果有谁想要看见她，就要把灯拧暗（不要忘记买那种可调明暗的灯，这种灯隐藏着秘密），把门窗都关上，一个幽闭暗淡的空间是她最喜欢的处所，她将安静地从某个深处（墙的深处吗？）出现在你的眼前，那时她已将她的长发剪去，她心中的明星是奥康娜，她想，奥康娜十三岁就偷东西，那是多么精彩绝伦。被许多人指责的时候，是她最得意的时候。

她的长发已经剪去、她瘦削而单薄的身体在过小的缝隙中变成了一种二维的物体，像电影一样，这个状态离飞翔只有一步之遥了。飞翔就是嚎叫，躯体留在原地，灵魂裸露在粗糙的空气中。

那个人，在我的记忆中嫁给了一个魔鬼，我在一个盛大的婚宴上看见了她，她的衣裳缀满了珍珠般的火焰，她的头发和鞋子，亦是不同质地的火焰，它们在她的全身跳动，是她最喜爱的饰物。她向所有的宾客微笑，那是她一生中最后的微笑。她冰冷的微笑是一种奇异的花朵，它脱离她的脸颊、悬浮在我的心里，它那冰的质地停留在我的心口。在我的记忆中，婚宴上的宾客全都穿

着黑色的衣服，他们的白衬衣在荧光下奇怪而刺眼，整个厅堂笼罩在一种幽蓝的微光中，大厅出奇的大，当中置放着一张红色的案桌，比女人的裙裾更艳丽，比水晶的杯子更剔透。这张桌子上空无一物。

大厅尽头的黑暗中无声地出现了一个队列，无人托举的金色盘托列队而行，它们从空中落到长桌上，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幽蓝的光线中黑衣人绕桌而坐。

那个人就是这个时候消失的。

珍珠色的火焰落在地上发出悦耳的丁当之声，它们因失去了那个人而滚动，这些带着她最后气息的火焰，将要在那间屋子里跳动三天三夜，使这幢房子弥漫出烧灼的芬芳。

那个人从一个我们无法知道的缝隙（或通道）中逃遁，她在我们中间一闪身就进入了另外的维度，关于那个维度的空间我们还要再过一万年（那时我们发明了六维几何）才能有所了然。

那个人在她消失的时候重新长出了满头长发，她的长发从那个不可知的地方垂到这个新娘缺席的婚宴上，

它们长而粗、尾部微曲，像风中的柳条在黑暗中飘荡。我的脸颊触碰到它的尾部，我从它冰冷的形体听见了一个声音，它带着一连串的气声，低沉，正是那个我听熟了的女人的声音，她在说：我从此将与你们为敌。

我所拥有的只是她的一根长发，这根长发由于仇恨在黑夜里发出的幽蓝的微光，使我不能久看。那个我如此爱慕的女人，我对她充满了狰狞的渴望，以及嫉妒，我看见她的肉体剥落，像水一样滴落在深渊，她呼啸而去，脱离了我们的生活，从此她的面容模糊，我们总是看不清她，她的气息留在我们中间，像冰凉湿润的雨丝垂落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产生一种隐秘的疼痛。

在结束之前我看到她把灯关掉，在黑暗中裸露她的全身，裸露是一种再生，一种结构，也是一声呼喊。在裸露中到达最深最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只为她所设。

我在记忆中想念那个总是出现在夜晚的女人，我无限地想着她、等待自己的来临。

1993 年 12 月 16  
日

## 死亡的遐想

我近来常常想到蒋子丹的散文《遐想死亡》。文章最早发在《作家》杂志上，它的标题从杂志的目录中一下脱出，寒光闪闪，锋利无比，如同闪电把死亡的面孔裸露出来。

那时我最感兴趣的是“期待鬼魂”一节，她说有一个夜晚她听见已故的父亲的茶杯发出轻轻的爆裂声，早晨起来看到好多天不曾盛水的杯子从上到了裂开了一条细细的口子，她确信父亲的亡灵回来过了，并留下裂缝为证，于是她换了只非常漂亮的新杯子，盛满水等待父亲的亡灵再来，但是他并没有出现。我一直觉得这个办法不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要给她的父亲传递物品，她的方法不对，须得是一样能烧掉的东西，比如纸做的杯子，在子夜时分，拿到露天点火烧掉，从这个世界消失的东西才能到达另一个世界。但是奇怪地她没有收到这封信，这事使我感到既失望又神秘。我不甘心，接着我写了中篇《青苔与火车的叙事》，在这篇小说中我重复了信上的内容。我想这样的白纸黑字印刷出来，总不会无端不见了。

我对鬼魂的兴趣来自我的家乡广西北流，北流是一个与鬼接近的地方，这一点，甚至可以从《辞海》里查到，查“鬼门关”的词条就可以看到此关正是在广西北流。我小时候曾到鬼门关附近看过一个溶洞，那是一个有名的溶洞，晋代葛洪曾在那里炼过丹，徐霞客也去过，洞里有一条阴气逼人的暗河，幽深神秘之极，使我想到鬼魂正是从这条河里漫出来的。在夜晚，我常常站在天井旁，看我自己臆造的绿色湿润的鬼魂从青苔中漫出，舞动它们绿色的长袖，长袖的颜色跟青苔一模一样，你分不清哪是青苔哪是鬼的长袖，必须凝神屏息，紧紧盯着，不眨眼，不打喷嚏，或者闭上眼睛，待它们毫无防范时猛然一睁，多次反复，在反复中就能看见它们，它们像潮气一样若隐若现，轻如羽毛。同时它们也在阁楼上，阁楼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从来不安电灯，在这样的地方它们大胆地窃窃私语，从黄昏就开始，到黎明才结束。

阁楼上的窃窃之声弥漫的时候，我就想要看看它们，我站在楼梯口，想象它们的另一种形态，跟天井里的鬼不同，阁楼上的鬼穿着宽大的黑衣，像阁楼上的空气一

样黑，黑且轻，它们飘在阁楼的空气中、它们是谁呢？

我常常觉得阳间是可以与冥府接通的，在我的家乡，与冥府相接之处就是那条名“圭”（这个字的音与“鬼”字实在是太接近了）的河，自然，接通的时刻并不是随时而至，而是需要一定的仪式、精确的计算以及某种契机，这种想法总是使我震动、我抑制不住总要把它写到小说里。

最近我有些疲惫，心电图不正常，医生认为是心脏供血不足，一个年轻的医生告诉我是冠心病，一个上了年纪的医生告诉我不是。不管是与不是都使我重新想起了死的事情，死于心脏病是一种不错的死法，没有什么痛苦，一下就过去了，不必在床上躺三五年，弄得满身褥疮，大小便不能自理，我想这真是好极了。我小时候常常梦见自己死，我总是梦见自己被人追逐，无论怎样奔跑躲藏总是被人抓住。然后被押到一面高大的墙跟前，枪口对准我，眼前红光一闪，胸口一阵灼热，我就在梦中死去了。有时我从梦中醒来，我就想象死亡就是从一条深长黑暗的隧道一直掉下去，永不能再回来。我还幻想死后不用土埋，不用火葬，而是扔到太空中，与许多

星星一齐飘浮、在那里没有空气，没有轻，也没有重，永远飘浮，永不腐烂。宇宙射线像梦中的彩虹呼呼穿过我的身体，等到某个神秘的，命中注定的时刻，黑洞或者某个恒星炽烈的光焰将我吞没，我将再次死亡。

发轫于幼年的这些瑰丽的遐想若能穿越我的整个生命，到达我的终点，停留在临界时刻，一定是要临终的时候不太痛苦，肉体的痛苦就像噪音，将会扰乱一切美丽的遐想。我的病扫清了我通往死亡的道路，那是一个光滑的水道，像滑梯一样，“嗞溜”一下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是多么的好！

这时我再读《遐想死亡》，最后一节“恭候死亡”就从这篇长文中凸现出来，前面的文字像潮水般退去，这节从潮水中浮起，坚硬而光滑，我站立其上，清扫尘嚣，获得宁静。

## 睡眠

睡眠与现实的关系是海水与岛屿的关系，这个比喻来自普鲁斯特，虽然从比例上看不太恰当，但其本质却



是奇妙之至，只有天才的脑袋才想得出来。

睡眠就这样夜复一夜地围绕着生活，浸泡着我们，它像真正的水一样、润泽我们的生活，使它变得松软。它将本来连成一片的东西分割成一点一点，如果生活不被分割，它们将沉重如铁，很快地把人压碎。睡眠又像沙漠中为了治沙而菱形种植的植物，它们分割了沙漠，使我们从某一个角度看上去，这片被分割了的沙漠就像绿洲。

睡眠绿色而湿润，清澈而斑斓。经由它的通道我们看到在那个幽暗的世界里——显形的事物：熟人和陌生人、莫名的所在、房屋、手炉、赤身裸体、丝绸、瓷器、某些手势、不解其意的话语、船只、森林、雪山、手帕、鞋、草莓，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在奔跑，所有的一切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它有时无声无息亦无色，像早期的黑白默片，有时候声音模糊而遥远，它的影像亦然。而在某些时候，色彩自天而降到达我们的梦境，它们像真正来自天国的色彩，比我们所在地方更美妙。在梦境中我们有时身重如铁，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们抬起双脚，有时我们身轻如燕，脚一点地就能腾空而起，

呼呼飞翔。我们在梦境中穿行，进出无常，完全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在哪里就被那种我们无法知晓的力量抓住了？（我们睡梦中的意识是否像风中飘来飘去手感很好一把就能抓住的毛巾，被那个人随意挥舞呢？）

这使我联想到有一种隐秘的水滑梯，我们上床就是登上它的台阶，它的通道长而平，我们甚至无法察觉它的倾斜，睡眠的水流递送着我们，把我们的四肢与大脑跟那个世界分离，我们全身在水流中划动却丝毫感觉不到任何运动，最后我们并不是“嗞溜”一下掉进广阔而深厚的水里（那是睡眠与梦的混合物），而是在水滑梯或冗长或短促的滑道上渐渐沉入水中的，或者说是那繁茂的水涌上来将我们沉没。

电影的梦境跟真正的梦境相比总是黯然失色，它清晰的声音和闪烁的亮光首先使我们感到它的人工性，其次它的幕布永远阻挡了我们通往它的脚步，使我们永远蜷缩在黑暗中，我们的神思虽然进入了那人工的梦境，但我们碰到的总是陌生的、与我们不相干的人。只有我们自己的梦境才与我们息息相关。在那里我们看见早已离去的亲人，我们曾经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但在

这个珍贵的地方我们意外地与亲人相逢，他们跟从前完全一样，时光没有损坏他们。多年不见的熟人也会浮现出来，我们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必知道，看到他们我们感到由衷的亲切，往事或未来的事情围绕着他们，变成一种我们依稀可辨的飞鸟，在我们的睡眠中飞来飞去，掠过我们的脸颊。

## 幻觉

在落日之城我觉得我曾经听到了一句话，我一点都不感到它生硬和做作，它纯粹、自然，就像从晚霞里直接滚动而来。化为气流弥漫在我的周围。这个声音在它发出的时候是一种耳语，一种薄如蝉翼的翕动，它最初我的时候也是耳语，但它在我体内的荡涤使它声如震鼓。一种缓慢而有力的鼓点，在我的头宇震荡和扩大，一下一下，每一下都准确地击中，毫不偏差，它从我的心脏奔涌到我的四肢、眼睛、血管、头发、所有的末梢。然后，我感到这声音从我的身体向外扩散、疾走，闪电般地越过街道和草原。到达天边，并在那里发出滚滚惊雷。

我站在原地，雷声的震动和气流一直包裹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别的人现在在哪儿，那句耳语把我长久地

定在这里，这句话的回音像水的波纹一圈比一圈大。我站在空旷无人的街道，想起超现实主义大师保尔·德尔沃所画的《回音》：在月光下，裸身的女子举起手，仿佛在追忆着寻找什么，同样的人体，同样追寻的姿势重复三次，一次比一次缩小，一次比一次稍稍后退。我现在就觉得自己正置身于这样的梦境中，月光下，一个男子雕塑般的身体在转动，他以同样的神情、同样的姿势转身，但他每转一次他的身高就升高一点，在月光下完美而超拔的一个男子，浮动在那个奇怪的夜晚里。

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夜晚而不是黄昏时，我发现波涛汹涌的晚霞完全消失了，连灰色的过渡都已完成，我的头顶和脚下悬挂着拳头般大小的星星，就像梵·高《星柏之夜》里的星星，又大又美。这使我觉得，这正像那句要紧的耳语突然间换了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惊喜地看到，星星就在离我的鼻子不远的地方，伸手就可触及，而不是平常的在天上很高的地方，需要仰起头才能看见。

我惊奇地转动着身体，我发现每个方向的星星都同样的近而大，大而美丽，饱含深情地在我身边隐隐浮动。

它们淡黄的颜色映照在我的衣袖上，我浑身全都是星光的颜色。

我不知道这个奇怪的夜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只记得最后是水的波纹一层一层地漫过了星星，人如拳头的星星在水中摇摇晃晃，我听见那句耳语再次从水与星星之间到达我的耳朵。

### 置身于一座草原城市

置身于一座草原城市，顷刻就会置身于奇观之中。

在它空阔的城区里，从街心中就能一眼看到太阳从地平线落下的壮丽景观，晚霞辉煌的色彩笼罩了整座城市，树木、房屋和人全都镶上了一层金红的颜色。瑰丽无比的晚霞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从天边和地平线（在远处，这两者汇合在一起，使这完全不同的事物在我们的眼里变成了同一样事物）向我们滚动而来，它们的浪涛厚实多变，闪耀着难以言说的光芒。这跟海浪的反光不同，我们明确地感觉到那最辉煌的光源就在云层的中间，它被层层遮挡又被各个反射和映照，它从云层的缝隙飞奔而出，一泻千里，在我们仰望的视野里漫射出一片金

色的光线，或者在浓厚的云块的背面蔓延，直至到达边缘形成极其明亮的金色镶边。

风从天边浩荡而来，这是推动云霞变幻的巨大力量，无论它作用于大海，还是作用于太空，它同样制造浪涛汹涌。晚霞金红、桃红、灰红、桔红地从草原的尽头一直滚动到我们的脚边，它反射的瑰丽色彩覆盖了我的全身。那一刻，就像是神的手掌掠过，我深怀感动，呆若木鸡。

一定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到达了我的心里。天空幽蓝深邃，草原无比广阔。这片草原上没有一个多余的人（牧民和羊群是草原画龙点睛式的点缀），天老地荒，只有我们一行随车疾驰，地平线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汽车向着地平线猛冲，每时每刻我都感到我们的车已经到了地球边缘，很快就要从地球上掉下去了。

在天老地荒的空阔草原上，所有的自然景观全都改变了常态，它们夸张地逼近我们。暴雨前夕乌云密布，我们停车片刻，看到浓黑狰狞的乌云全都聚集到我们的头顶，伸手可及，仿佛整个天都要从我们头顶砸下来。在瞬间把我们砸得稀巴烂。而四面的风仍在把这个已经

十分逼近的天继续往下刮。我们只有赶快逃回车里。

在雨中疾驶，前面出现了一道彩虹。我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彩虹，它横跨了整个天际，从天边的一头到另一头，巨大的天幕一无阻挡，仿佛正是为了这举世无双的彩虹而存在，我从前看到的彩虹总是被各种丑陋的建筑物所切割，这使我看到的只是被肢解后残存的片断。有一次我在家中的阳台看到它被一截粗黑高笨的大烟囱所截断，烟囱里喷出的浓烟像一些黑色的虫子布满了彩虹的一端。那景象令人心疼。

彩虹与烟囱，这两种事物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这是我未来的电影（个人电影或大众电影，在默想中或回忆中，或者在真正的银幕上）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镜头。但是这个镜头在我的心里哗哗掠过，纷纷坍塌在身后，它所带来的疼痛瞬间就被眼前草原彩虹的完美所覆盖。我惊喜地看到一道七彩的拱门正劈面而来，那来自天国的彩色的水珠缤纷而晶莹地悬挂在眉睫的前方。我们的车一直向前开，彩虹一直在我们的眼前。

我最后也没有到达彩虹。在黄昏的时候它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乌云繁拥的落日，浓厚的云层黑红参半，

落日奇大奇红，跟我平日看到的落日完全不一样，我相信这颗非同凡响的落日绝不是我在城里看到的那一枚，它体积硕大，红光充盈，比任何时候都更靠近我。

### 猜想大麻

一个不吸烟、不喝茶、不喝咖啡的成年女人，为什么会对大麻感兴趣？这是一个谁也弄不清楚的问题。我对这个非法的名词向往已久、它的领地是另一重神秘的黑暗，与剧场中的黑暗有相同之处。它分离常态，将日常生活驱赶到黑暗之外，让我们感觉不到它们的喧嚣、纪律、锁链一样的环节。我们轻身遁入黑暗中，这重黑暗就是我们内心的宁静（一切内心的渴望、风暴、呻吟，只要它真正来自我们的内心、它就是一种宁静），在离现实生活咫尺天涯的一个隐秘的地方，香气在浮动，它从容地到达每一个大麻爱好者并且变成他们脸上恍惚的神情。

香气在空气中浮动，在人体内中进出，就像在剧场中第一道铃声响过，寂静的气流侵入到场内，人们不再说话，脸上出现期待的神情。香气的出现犹如这道铃声，它只被那些经过挑选的人听见，它寂静地潜入这些人的



心中，附着在他们的皮肤上，他们深深地呼吸，他们在香气中犹如鱼在水里，任何东西都不能挡住这种呼吸。

香气从一种丑陋的东西上散发出来，黑色的、小颗而圆的东西，由较硬的膏状物构成。如果点火加热，香气骤然浓郁。黑而小的膏状物犹如一种奇妙的花蕾，火是另一种浓缩的阳光，它使那黑色的花蕾骤然开放，香气就是它巨大的花瓣，布满人的嗅觉，热烈而辉煌。这种难以言说的浓香使我想到另一种艳红的颜色，这正是它自身的花朵。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被称为罂粟花的花朵是在一片神秘的红土高原，在蓝天红土之间，层层薄如蝉翼的花瓣在明亮的阳光中跃动、飘浮、闪烁，红得无比娇艳，夺人心魄，它们就像一些在天堂和地狱都熔炼过花朵，既纯清又邪恶，这个世界最精美最深刻最神秘最不可理喻的东西，都以气体的形式到达这片荒僻无人的红土高原，它们携带着叛逆的红色（那是一种我们不易觉察的物质，它遍布在空气中，既冷静又热烈，只有它们高度凝聚，我们才看出来并感受到它的力度与危险），能纷纷抵达这些花朵、薄如蝉翼的花瓣，因为它们的高度集结而浓红欲滴，无论在近处或在远处，我们都

能看到这片花朵在太阳下散发出漫天的红光。

这时香气已经抵达了我们的神经。它驱动我们浮出黑暗，浮到迷幻的光线中。正如在剧场里，大幕已经拉开，我们的身体停留在黑暗中，灵魂飞离了肉身停留在舞台的亮光里，附着到人物、布景和道具上，通过它们，我们再次看到的世界变得稀奇古怪。

这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有什么必要知道自己是谁呢？我们正在飞翔，身轻如燕，气流的摩擦声掠过我们的耳边发出呼呼的响声，我们的头发已被扬起，与我们飞起的身体成平行状态，奇幻的光线在我们的脚下哗啦啦地坍塌，整个世界缩小成一粒黄豆。

梦境是一种飞翔，看电影看戏是一种飞翔，创作是一种飞翔，吸大麻是一种飞翔，它们全都是一些黑暗的通道，黑而幽深，我们侧身进入这些通道，把世界留在另一边。

### 小时候的梦

小时候几乎每夜都做梦，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梦见自己的亲人死去。有时是外婆，更多的是母亲。她像电影

里的革命者，江姐，或者韩英，铁链在梦中叮当作响，缭绕着母亲，她有时被流弹击中，仆倒在地，有时血肉模糊，鲜血如注。我在梦中清醒地意识到，我的母亲一旦死去，我就会成为真正的孤儿，我只有 8 岁，我怎么养活自己呢？

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常常是一身冷汗，但我知道，我从梦中回来了，梦中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终于逃脱了出来。我知道，母亲并没有死，她只是下乡去了，我只是一个人睡在家里。在那样的夜里，虽然不是孤儿，仍然害怕极了，除了被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使我不至于一闭眼就掉到梦里去。

到后来、我梦见自己的死。

我总是被人追逐，无论怎样奔跑躲藏总是被人抓获，然后被押到一面高大的墙跟前，面对枪口，在被枪口对准的瞬间，我想，这次真的要死了，我永远不能再活过来了，紧接着眼前红光一闪，胸口一阵灼热，我便在真切的梦中死去了。

除了梦见死，最怕梦见和常常梦见的就是结婚，不知道小小年纪怎么会梦到结婚。结婚在我的想法里是一

件可怕的事，我想我是永远都不会结婚的。但我在梦中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控制着，违背自己的意愿结着婚。结婚的梦永远是一个婚礼，像多次看到的大人的婚礼一样，不知为什么毫无道理地自己就在了一张桌子的跟前，别人说，这是你在结婚。站在身边的新郎不是全班最差的男生就是全镇最难看的男人。我立即就吓出一身冷汗从梦里醒来。

还有一个重复多次的梦。8岁以前每次发烧这个梦都会如期而至。这个梦很抽象，没有任何情节可追寻，我至今仍无法猜到它隐秘的意义。由于它的多次重复，它的形象清晰而鲜明，像光谱一样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有时是其中的几种，像彩虹一样渐次排列，但不是弧形，而是长条形。色彩时粗时细。是竖着的，它们从某一个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充斥着梦中的全部空间。它进入的速度时快时慢，快的时候色彩紧密，几种颜色紧紧挤在一起，让人觉得很难受；有时进入的速度慢些，颜色与颜色之间疏朗些，长长的一段红色长长的一段黄色，从容地鱼贯而来，这时就觉得好受些；有时来势汹汹，头都快裂了，忽然就慢了下来，很像快要憋死了又

从水里浮了出来；有时不是发烧，只是觉得难受，这时也会做这个梦。

彩虹的颜色来自哪里？

这个彩虹的梦萦绕我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我病的时候母亲常常不在，她一年中在家的日子不多，病了我就自己睡觉喝水。以及做这个彩虹进入的梦，从来不吃药，我知道吃药会增强抗药性，到病得厉害时什么药都没有用了。那个时期我没有邻居，母亲的单位是妇幼保健站，一共四个人，大人全部下乡。我独自住在三楼上。这是一座奇怪的房子，每层都只有两间小而长的房间，很像从前的客栈。

我独自置身于空无一人的黑暗中，彩虹的颜色从另一个黑暗的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

这个梦在我 8 岁以后就消失不见了，再发烧时也没有再来。20 多年之后，我 30 岁那年，我当时的男友送给我一个黑色的小钟，比巴掌略小，正方形。有一天晚上我发现这钟放出彩虹的光芒，彩色的光线照在发亮的桌面上，成为一小片淡淡的彩虹光。钟面和桌面的彩虹两相映照，构成一个极为奇特的图案，这使我突然想起了

小时候常做的那个梦。我至今搞不清楚这种神秘的联系昭示了什么。我跟男友的关系破裂后才突然发现，那个黑钟是一个可怕的象征，瘦长白色的指针，黑色的底，像一只长着白须的黑猫的脸，如同岁月一样阴险。

## 记忆

### 怀想水稻

这个夜晚我无端陷入了对于水稻的怀想之中，南方稻田的万顷绿波高低起伏，如同 B 镇的丘陵地带那样绵延千里，宽阔无边。我常常身在高处看到这无边的稻田，水稻在它的秧苗时期清新而柔软，它们像一群小姑娘紧紧挨在一起，站立在一汪南方的水中。它们比最美的麦苗还要美，顷刻间我就看到所有的水田遍布了它们。“水稻”，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字眼，它遍布着全部的南方农村，倒映着南方的身影，它们在水田里等距离地一兜一兜地站立，吸纳阳光和纯正南方的气息。水稻生长的姿势令我无限怀想。它们在我的视野中扬花抽穗，乳白色的花粉在阳光下闪烁、飘扬和芬芳。比起后来金光灿烂的成熟季节，我更钟爱这一片绿色的万顷波浪，它在我远离南方多年之后在我睡眠和遐想的日子降临。在这片一望无际的万顷绿波的缝隙间，南方的芭蕉树、古榕和竹子，水塘与河流，竹篷船与花头鸭在水稻的身影下时隐时现，它们给无边的水稻以亲切的实感，但更为浩大的事物仍是水稻。

南方的风在水稻的绿波上翻起涟漪，它们一圈圈扩大，与别的涟漪溶为一体，只有南方的风才能使南方的稻田有如此从容闲雅而又生机勃勃的涌动。有一顶斗笠从高处慢慢飘落，飘落，它一直没有落下，一直在万顷绿波之上，在我的视野中一再飘落。

在这个闷热难耐的罕见的夏天，水稻的意象使我感到了双足的一片清凉。赤足站在水田里的感觉被我遗忘多年，那种切肤的裸露之感被我长年累月的鞋袜所覆盖，多年来我完全忘记我的童年和少年的赤足时代了，那时候我每年有半年打赤脚（这半年是亚热带漫长的夏季，是4月到9月，有时会更长，从3月到10月，别处的春季和秋季到了亚热带一律变成夏季，就像B镇的柚子到了别的地方会变得又苦又涩），我看见自己每天光着脚沿着河岩踩着细沙去上学，这种情形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生长期。我脚型的形成得益于这种长期的放纵，成长得天然、舒展，与所有生长在城市的从零岁开始就包裹着双脚、除了游泳和洗澡外从不赤足的孩子截然不同，是真正的无足，健康而自然、我看到自己在久远的年代举起一只沾着沙子的脚，那上面的石英质在南方的阳光



下闪闪发亮，它的形状使我想到了最野性的初始时期。这样的双脚没有任何事物和以阻挡。

长久以来，只剩下了与游泳池坚硬冰冷的建筑物质相对接的赤足感觉，与水田里泥土接触的快感已经成了久远的概念。在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部位（眼睛、耳朵、舌头、胳膊、乳房、腹部、大腿、脚）中，脚的记忆是最为麻木的，它几乎没有记忆。在它的感受中，只有丝袜与线袜的区别，皮鞋与胶底布鞋的区别。在无限的重复中它的记忆已经遭受了毁损，接近它的事物如此简单，远远不及手和眼睛。只有裸露的脚，它的记忆才最丰富，它直接接触水泥地、青石板、砖地、木垛、沙子、泥土、河里流动的水、落叶、草（稀疏的草和茂密的草；春天、夏天和冬天的草）。裸足失去的感觉是我们文明的代价之一。

让我在这个闷热的北方的夏天重新追回多年前裸足在水田里的记忆。首先我们通过田塍到达水田，田塍柔软而湿润，中间是棕色坚硬的泥土，两边是密集而无法阻挡的草边（公园里人工修整的草边是对它的拙劣模仿），这是一种自发的、奇妙的线条，将水汪汪空白的稻

田分割成块状。光脚走在上面，草尖神秘地碰触到脚窝，这一点细小的碰触诱发了我们想要得到全部的愿望，于是举起一只脚在草蓬中来回掠动，密集的草叶顷刻充满了整个脚窝，有一种辉煌的酥麻之感通过脚窝传递到我们的全身。当惊喜落尽，我们发现脚面一片冰凉，草叶上的露水尽数落到了我们的脚面上，既是一种印记，也是一种余韵。这样，我们的双脚已与田塍融为了一体，刚刚落脚时的那种陌生、警惕、小心翼翼的感觉消失了，代之以一种融融于心的亲和力，这种力改变了我们走路的姿势，使我们坦荡而稳健。

经过了田塍的热身运动我们来到水田边，被水覆盖的泥土是精耕细作的泥土，它们经过几千年的耕作而无比成熟，它们一年一年生长水稻并且还要生长水稻。我放下脚，碰到了另一种冰凉，它猝不及防，跟田塍浅表的湿润毫不相同，这种冰凉以它滑腻、粘稠的泥质一下贴住了我，有一种被彻底封死、全部占领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快感，不如说是震惊。

只有震惊这个词才能准确地形容我的感觉。每次我初下水田总是会感到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惊呼（在我

心情放松的时候)或者心里格登一下(我常常表情严肃),这是一种简单的感官刺激导致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情感,我对它的记忆绵延至今。经过浸泡的光滑细腻的泥土犹如大地的肌肤,它们与我短兵相接,如此之近的距离,如此之近的拥贴,与我在别的时候看到它们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也许从这时候开始我才真正发现了“切肤’这个词的丰满含义。冰凉的震惊感只停留在两种肌肤刚刚相接的那个瞬间,在这个瞬间之后冰凉就缓解了,它一点点变暖,最后同我的体温一样,我在其中再也不会会有异样的感觉,明确的快感与不适都消失,它变成了我的另一双奇妙的鞋子。有时我想重新召回那种感受,我把脚取出来,再放进去,再取出来,再放进去,一会儿凉丝丝一会儿温呼呼的,如同踏着一只双温的轮子,但那种震惊感却没有了。

这时我站在水田中,远处和近处的水亮令我眼花缭乱、水田在阳光下一片一片,广阔而夺目,泥土的气息和水一起蒸腾,沿着田塍飞奔。在即将生长水稻的待种水田上交汇。秧苗递送到我高挽着的手臂上,我托着它们,把它们一兜兜插入在水田里,碧绿、俊逸、苗条的

秧苗一兜兜地挺立在水中，它们均匀地漫布在水田里。它们渐渐在我的眼前伸延，这时候，时间变成了水稻。

### 流水林白

我的本名叫林白薇，这个名子据说是我的外祖母取的。外祖母出身于一个开明的地主家庭，曾经读过女子师范，是当时广西农村罕见的女知识分子。她的母系家族曾经出过一名我国最早赴美学铁道工程的留学生和一名当过两年大学校长的大学教授，外祖母常常以此为自豪。她活到 93 岁，喜欢《水浒》，不喜欢《红楼梦》。

我于 1958 年 1 月生在广西北流县，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林青是县城里一个小单位的领导，1959 年他被打成了“右倾”，降职降薪，次年年底就查出了癌症，1961 年去世，当时我 3 岁，我弟弟刚刚生出几个月。

我的母亲在 50 年代初进了一个卫生系统的培训班，从此她一直从事妇幼保健工作，开始时在防疫站，后来成立了妇幼保健站，文革期间合并到县医院，后来又归队。

母亲常常下乡，一去就是一两个月，我 4 岁到 7 岁

在县幼儿园度过。我不喜欢跟小朋友玩，不参加集体的游戏，而喜欢独自在树林子里唱些莫名其妙的自编歌。7岁到10岁，是我独立生活的开始，母亲下乡，弟弟跟外婆在乡下，县城里只有我一个人，每天我自己睡觉，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到龙桥街防疫站的饭堂吃饭，自己拎半桶水到洗澡间洗澡，然后自己洗衣服，然后回到在沙街的妇幼保健站的家里。

妇幼保健站在一所类似于旧时的客栈那样的房子里，这是一所奇怪的房子、又窄又长，深而幽闭，全靠三个天井采光，整个房子阴森森的，潮湿的地气弥漫着整幢房子。有两处阁楼，前面的阁楼是三层，每层只有一两个房间，后面的阁楼只有一层，没有隔墙，用来堆放旧物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后阁楼堆放着一些母亲们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时用的男女生殖器模型，有石膏的和塑料的两种，大多数是局部的剖面模型，有细小的血管和骨骼，它们奇形怪状、惨白和肉红，令人触目惊心。在漫长的星期天，我常常心惊胆颤地走上后阁楼，在幽暗的微光中凝视这些七零八落的人的肢体。

这幢古怪阴森的房子几乎只有我一个人住，当时全站连站长在内只有四个人，全都是女同志，她们常常全部下乡，在房子的最尽头住着一个带婴儿的老保姆，我则住在前阁楼的三楼上，这中间隔着三个天共和暗而窄长的过道以及后阁楼的楼梯口，我没有勇气穿过如此漫长危险四伏的地段，老保姆蛰居在她的房间里，她房间的灯光永远传不到前面来。

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我就是一个人睡在这所曲折诡秘的房子里。我总是在下午五点半（晚饭四点半开）之前回到我的房间，我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上床。否则我无法在天黑之后独自穿过黑暗到达我在三楼的房间。我把蚊帐放下，在蚊帐里使我感到安全。

在这样的夜里我总是做梦，我一次次地梦见我的母亲死去，有时她被人用枪打死，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有时她被压在车轮底下，血肉翻。我在梦中全身发冷，我想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我成了一个孤儿，明天我将怎么办呢？我独自在深夜里惊醒，黑暗中的窃窃之声被我想象成无数狰狞的鬼魅，这使我手心出汗，无法入睡。还有一个梦总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出现，那是一个像

光谱一样彩色的梦，各种颜色一道一道地从无限远的地方进入我的梦中，它们时疏时密，无法扼止地堆积在我的心中，使我十分难受，我总是在梦中挣扎着要摆脱它们，但它们不让我摆脱，我现在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做这个梦。

这个梦，使我知道自己是在生病，于是我大量喝水，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我的成年。

10岁那年，母亲再婚，不久就因为备战的需要开始疏散城镇人口，母亲让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把我和弟弟接到在另一个县的农村老家，在那里，我们住在叔叔家，白天上山打柴，喝些很稀的粥，晚上早早睡觉。到了开学的日子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到母亲身边上学。我每天到大队部等母亲的回信，一直没有等到，姐姐说母亲改嫁了，这里是我的老家，让我不要再等了。

这对我是一个晴天霹雳。

那是我失学的日子，我常常忍不住到大队学校去眺望，对那些上学的孩子充满了艳羡，我跟现在希望工程需要挽救的儿童毫无二致。

过了一个学期，姐姐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罗列了许多有关我的天资聪明的好词，这封信打动了母亲，她寄来了路费，我重新回到了北流县城。在那里，我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

8 岁至 17 岁，我在寒暑假期间陆续干过以下的活：剥桂圆肉，锤石子，洗化肥袋，到工厂运煤，在工程队搅拌水泥浆，到卸木厂运木头，运水泥浆到工地，等等。

寒暑假找零活干是我们镇的时尚，但我身体极差。一见太阳就头晕，从小厌恶体力劳动。

1975 年我 17 岁，高中毕业，下乡插队。

插队一年左右让我到大队学校当统筹教师（在生产队拿工分，每个月补助 5 块钱），那是一个囊括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全部年级的学校，是教育革命的成果之一。在这个学校里，我曾在同一个学期中同时教过初中一年级的语文、初中二年级的数学、高中二年级的化学、高中一年级的新闻写作、初中一年级的英语，同时负责全校的文艺。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诗，这一年我 18 岁。



19 岁，是充满机遇和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大起大落，影响了我的一生。

这年我写了一组诗，一共 10 首，其中有一首是抄袭之作，我把它投到《广西文艺》，被当时的《广西文艺》主编符昭苏偶然发现（他到诗歌组去偶然翻到了堆在桌上的一堆来稿），随即让人用长途电话通知县里、县里通知公社、公社通知大队，一级级地通知我到南宁改稿，这是我生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我长到 19 岁，还从来没有到过城市，最远的地方是跟我母亲到贵县开会。

省会南宁就像一个梦境，我 19 岁的时候看到这个城市，觉得它又辉煌又巍峨。我到编辑部去，第一天他们让一名同乡领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林则徐》，我激动得连夜写了一首四十多行的诗，第二天就拿给符昭苏老师看，正好他养的一株昙花开了，我又当场写了一首《昙花》，符昭苏老师很兴奋，他告诉我，这次让我来不是来改稿的，小样已经出来了，不用再改，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有些人不相信一个小姑娘能写出那样的诗，是让我来考试的。符昭苏看了我当场的诗作，认为考试已经通过了，他领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看校样，我看到我的诗变成了铅

字在长条形的纸上，一共有四首，抄袭的那首排在第三。我沉浸在再生的诗句中，没有提出拿掉那首抄袭之作，我听见符昭苏老师说，你的本名很好，你就用真名发表吧，我很高兴地同意了。这组诗的总标题是《从这里走向明天》，那首抄袭之作是《脚印》。

从南宁回来之后就听说高考制度恢复了，于是我立即忘记了写诗的事，一头扎进了复习资料里。我准备报考理工科，我狂妄地想着，凭我的基础和我在大队学校教这一年书，全县哪怕只有一个人考上，那也将是我。

在这个时候，命运拐了一个弯，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世俗的好词在这里显示了它无限的魅力），有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母亲对我说广西电影制片厂来了一个同志要见我，晚饭后她领我到招待所，电影厂人事科陆好谋拿出一封当时编剧组组长吴荫循的亲笔信给我，信中说，电影厂目前需要编剧人才，根据我的诗作和他对我的观察，认为我形象思维能力强，有良好的秉赋，具备了培养的基础，所以特地请人事科陆好谋同志来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愿意到电影厂当编剧，则要放弃高考，来厂之后，先不给创作任务，而是在老同志的指导下读

书，读大量的文学经典著作，并一起下去深入生活，几年后再练习写剧本。若万一培养不出来，也不会退回原处，还可以当编辑或从事其他合适的工作，吴荫循老师在信中说，我来厂后，工作由他安排，以上各点由他负责兑现。

我在南宁改稿时，诗歌组组长轲炽领吴荫循到我的住处见过一面，所谈不多，没想到留下了如此大的伏笔，这使我大喜过望，电影是我最迷狂的事物，也是我最隐秘的梦想，我不加思考就作出了选择，我当场就对陆好谋表示，我愿去电影厂，并放弃高考。陆好谋让我写了一份自传交给她，第二天就赶回南宁了。

我把复习材料全部送了人，整天看闲书看戏看电影，那是我此生最自由最轻松最狂妄最轻浮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再有了！），我目中无人，得意忘形，我想我马上就是一名电影编剧了，一名全国罕见的 19 岁的编剧。总之这件事就像一个绝妙的童话，本来要跨越万水千山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忽然出现了一道彩虹，这道彩虹横跨了整个天空，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从这彩虹上走过去吧，这是特地为你架设的！

我轻飘飘地在游逛，命运狰狞的面孔却已在不远处隐隐地窥视着，很快就要露出它的脸来了。我对此一无所知。离考试的日子只有 10 天了，我忽然感到我必须参加考试，日后证明，这种感觉正是冥冥中的某种暗示，它渗透在空气中，被我敏感地捕捉到了。我没有意识到这将是我的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我轻桃地对人说：我考上了也不会去的，我只是试试自己的能力。

我只有 10 天的时间了，只好改理科为文科，我奇迹般地从浮躁中冲了出来，静下了心，平均每两天复习一门功课。考场设在公社，刚刚考完两门，我母亲就从县里赶来了，她说电影厂的陆同志又来了，让她告诉我，没有必要考试了电影厂肯定是要我的，这次他来是补充政审材料，他要到公社和大队跑一趟，很快就到了，母亲怕我心乱拿不定主意，所以先来告诉我，我说横竖还有两门，考完算了。

高考过后我就开始等电影厂的消息，一直没等到，我便给吴荫循写了一封信询问，吴尽责地复了信，信中说抄袭的事被人揭发了出来，去厂的事已没了可能。与此同时，《广西文艺》的信也到了，那是一封充满了安

抚充盈着仁慈的信，信中用了“参考”这样的字眼。我在这里感谢我的恩师符昭苏，他的信是我在绝望的日子里唯一的安慰。

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事件，这个事件理所当然地堵塞了我写作和上学的两条路（在当时，有什么能逃得过政审这一关呢？），这是我仅有的两条路。我只能回到生产队劳动。所有的光荣和梦想，一切的辉煌全都坠入了深渊，我想我是彻底完蛋了。没想到，奇迹在那一年的年末最后一次降临，我以全县第二名的高考成绩被录取到我胡乱填写的第一志愿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多年以后，《广西文学》的散文编辑凌渡告诉我，当年我的政审材料中的确有抄袭这一条，武汉大学招生的同志为此专门到编辑部了解情况，之后才决定录取我。

我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提前到武汉上学去了，在路上我想，10年之后我也许还会回到电影厂去的。不久我就把这事忘了。1985年的秋天，我在图书馆的同事鄢和琴（她是当时电影厂文学厂长亢进的妻子）到我的部门问我想不想到电影厂文学部当编辑，几乎是同一天，当时的文学部主任陈敦德也托人给我捎来了一张同样意思

的字条，约我面谈，亢与陈分属厂里的两种势力、我与他们从未见过面，我当时除了写诗外跟电影毫不沾边，当年的吴荫循也已改行当导演了，我去厂的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我很顺利地借调到电影厂文学部，1987年6月正式办理调动手续，这时距1977年正好是10年。

1978年春至1982年元月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当学生，这时我的精神在经历一次大起大落之后变得七零八落，19岁以前那种一往无前丧失殆尽。我变得沉默、自闭，大学四年也未能使我从阴影中走出。那四年是我的生命最低潮，在我的记忆中一片灰色。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广西图书馆，为了走出这次缠绕已久的生命低潮，我在当年的9月用自己头几个月的工资开始了一次大行动，我独自一人游历西南的几个省份，在发烧下雨的情况下一个人登上了峨眉山金顶，这在我的内心历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我确实就是从这个行动中重新振奋了精神，找回了自信。

这之后我继续写诗，并于当年开始发表作品，这距离我第一次发表诗作整整隔了4年。

1985年12月我借调到广西电影制片厂，1987年正

式调入。1988 年到北京香山参加第三届国际电影讲习班，15 天看了近 80 部外国电影。

1990 年 3 月借调到《中国文化报》，先在新闻部当记者，后到副刊部当编辑至今。

1990 年底结婚，次年生一女，现已两岁。

1993 年 12 月 7 日晚

## 逝去的电影

逝去的电影不论多么粗糙，它们的插曲多么难听、当它们越过 20 多年的时光向我飘来时，它们总是超凡脱俗，散发出月光般雪白而淡青的光泽。

一部电影，只要它逝去了 20 年，它的歌曲就像一些小小的柔软的手，从草编的花篮里伸出，舞动着各种令人心疼的手势。在我的怀想中，它们有时是明确的吐字，一个字一个字，带着圆润，滚动成珍珠。有时却是一种无言哼唱，像意大利影片《美国往事》和《西部往事》里的主题曲，华美的女声在弦乐上滑动，时而浮出，时而潜入，时而漂远，时而浮来，它没有歌词，令人心碎。

我热爱它们。

所有的电影和它们消散已久的主题歌都是我的所爱。

我爱《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沈阳》、《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桂林》、《万紫千红》、《科学养鱼》《宁死不屈》、《森林之火》、《第八个是铜像》、《回故乡之路》、《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艳阳天》、《创业》、《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以及《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在平淡的岁月里，彩色电影就是书日。在我的中学时代，最兴奋的日子就是包场电影的日子。此刻我凝望故乡，看到自己的眼睛里掠过的第一道霞光就是美丽的莫尼克公主。

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沈阳又访问了桂林，美丽的莫尼克公主穿着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徜徉在飘荡着鲜花和歌声的地方，失去了祖国的公主浅浅地微笑着。她的微笑从那远不可及的天边穿越层层空气，掠过鲜花和歌声，颤动着形成一道又一道波纹，一直来到我的面前。我在黑暗中布满红晕的梦想、手心出汗，默不作声。

多年以后，我还在等待电影院的那道开始的铃声。我们在黑暗中屏息凝神，等待这道神秘的铃声，这是一



根时空的魔杖，又长又细，悬在我们的头顶，它的声音在空气中颤动，在黑暗中打开了一道神秘的大门。铃声一停。我们就进到了一处更为幽暗的处所，我们丧失了意志，不知身在何处，我们只有听任幽暗的援引，我们不禁直起了腰，收缩了毛孔，紧张地等候事物的降临。

这时我们脑后的上方突然亮起了一道灰白的光柱、它毫不犹豫地直抵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眼前顿时就有了四四方方的雪白的空间，我们紧盯着这空间，这是我们的新世界，唯一的幻想，唯一的天堂或梦乡，我们无限信赖地仰望这个前方。这时候音乐骤然响起，梦乡的大门隆隆启开，我们灵魂出窍，我们的身体留在原地，我们的灵魂跟随着这道银白的光柱，这唯一的通道，梦乡之舟，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无法忍受熟识的人与我一道看电影，越熟越不能忍受。她们会妨碍我进入梦幻，她们是平常现实的日子

的见证，我看电影却要超拔这些日子，我要腾空进入另一个世界，她们却像一些石头，压着我的衣服。

我的眼前永远是一片空阔之地，白色的四方布幕在空地的中间高高竖起，既像船帆又像旗帜，场地的周围

是高大的柚加利树，它们紧密环绕，风从树干的空隙长驱直入，像无形的波浪涌向空地中间的布幕，布幕呼应着鼓荡起来，鼓荡起来的布幕又加倍召唤着四面的风，如同召唤着四面走来的人，人们从空地下面的斜坡上升，他们走上平地。一眼就看到了高高鼓荡着的银幕，他们亮着眼睛仰着头，朝这面旗帜快步走去。人们围绕着银幕的正面与反面，如同上了一艘大船，等待起锚远行。

### 丝绸与岁月

丝绸是一种活物，能吸纳空气中一切湿润和冰凉的东西。湿润和冰凉贮存在绸子里，变得更加精致、敏感和锐利。我们年轻时候光滑而结实的皮肤喜欢那所有湿润和冰凉、灼热与干燥的东西，前者是水珠的滚动，后者是阳光的照耀，这如同不同颜色的花朵点缀在我们的皮肤上，前者幽蓝，后者嫣红，连同我们年轻的皮肤，组成青春的图案，但如果我们到了60岁，皮肤萎缩而松软，冰凉就像一种不可抵挡的细小的针，即使是无从察觉的风也能使它现形，它们抵达我们的皮肤，从毛孔进入骨头把我们身上最内里最坚硬的东西刺痛，这种刺痛只有在我们老的时候才能感知。我想这种感知很快就要

到达我的身上了。我小时使听我的母亲说，以前不明白老人说“冷到骨头里”，现在过了 40 岁才真正体会到了。这是她在秋天的一个清晨蹲在公用水龙头前洗青菜的时候说的，我记忆特别深，过了 20 多年还能感觉到那个秋天隔着单衣的清冷，而我母亲认为这是一种冷到骨子里的风。在这之前她对我准备在冬天里实行洗冷水浴的计划大加压制，这个计划必须从秋天开始。冷水烧在温热的皮肤上，感觉上就像烧了很烫的水，身体马上发热变红，一层白色的水气从身体长（升腾）出来，这是我闪体内深处五脏的热气变成的，冷水从我们肩头落下，流经我们的上身、腰及臀部，沿着腿直达脚背，冷水从肩头出发，到达我们的脚背时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温水，我们的皮肤收缩成一层难看的鸡皮疙瘩。我坚信这就是锻炼。最后天气越来越冷，我终于放弃了冷水浴。

现在我青春已逝，我的年龄离骨头能感受到寒冷已经不远了。

丝绸永远年轻，只有岁月已经衰老。

## 回忆饥饿

记忆中的饥饿像一只血盆大口，它在过去的岁月里逼近我，把我啮咬和吞没。

我 8 岁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饿倒在课堂上，饥饿的烧灼感从胃部蔓延到全身，灼烤着体内的每一个器官和每一寸肌肤。这种烧灼从第二堂课刚上课的时候就隐约出现，随即它们越来越明显，它们以极快的速度滋生和集结，每一个分子一手举着长矛一手举着火把，在我的身体里步步紧逼，它们一次次把我的唾液驱赶到我的喉咙，我一次次地把它们咽下去以平息腹中弥天的烧灼，饥饿的怒火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拉锯战中我很快就败下阵来。我全身的冷汗奔涌而出，眼睛再也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也听不见老师的声音了。我全部的感官只提供同一个感觉：腹部里有一个越来越烫越滚越大的火球，它正在挤压我全身的水份和力气，它已经烧到了我的心，快要烧到我的脸和我的头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唯一的感觉，遮天蔽日，如果我不逃脱，我将死于这个火球，而这正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同时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没有任何能力熄灭这个

凶猛的火球，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我全身发软地瘫倒在书桌上，我知道我再也不行了，但酷刑般难忍的滋味还在继续，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切。后来我绝望地哭了起来。当我回忆这饥饿的哭泣时，我已经无法证明是什么引起了当时正在上课的老师的注意，是哭泣还是晕倒，我回想不起来哭泣的声音，一个饥饿至极的孩子，趴倒在书桌上，她哭泣的声音像游丝般微弱，有谁会注意这个声音呢？我模糊地感到老师在走近我，温热而干燥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摸了摸我的手，她说：你是饿的，快去买一碗米粉吃就好了。她从口袋拿出一角钱和二两粮票放到我手上，说：你现在就去，不要等下课了。

我什么都没说，握着老师给我的一角钱就往街上跑，当时的一角钱是小镇许多家庭一天的菜金，两分钱能买到一斤空心菜，五分钱能买一斤咸萝卜，四分钱就能买到一碗汤米粉。我握着一角钱，就像握着了神话中的某种宝物，体内那只烧灼的火球奇迹般地消退了，我的眼睛和脚重新有了感觉。我一溜烟走出校门，紧盯着街上最近的一家米粉铺飞奔而去。我交上钱和粮票，坐在凳

子旁，既兴奋又新鲜，饥饿的感觉暂时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街上吃东西，母亲在卫生方面要求严格，任何时候不允许在街上乱吃东西，“细菌”这个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狰狞地灌输进脑子里。我看见条状洁白的米粉被放进了一口大锅，浓白的蒸气在升腾，时疏时密，婀娜而澎湃，米粉的香味从这片白色的气体中散发出来，犹如太阳的光芒从云层中透出，气味的的光芒越来越灿烂，它们在浓白的水气中间跳荡，闪烁，照亮了整个店铺，每个人的脸上都被这特殊的光亮所照耀，脸上一片满足的神情。蒸气风起云涌，气象万千，我们的太阳就要出来了！

围着布围裙的人将一只光滑的竹漏爪伸进大锅里，蒸气的云雾从正中破开，竹漏爪水里光闪闪开始左右晃动，沸腾的汤如大花般怒放，米粉，我们饥饿之躯的太阳，在竹漏爪的托举下，从云雾的中央，从沸腾的汤中迅速上升，它呼的一下就升起来了，呼的一下到了大瓷碗里，然后它飘动着白气，如同翕动着柔软的翅膀，明眸皓齿，仪态万千地来到我的面前，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见到、也再也没有见过如此美好的食物，它的颜色

和香味在时间中聚集、堆积，成为坚硬的晶体、隐藏在我的味蕾和呼吸中，它的光芒永不落。

缀结着这所有一切的人，是我的老师庞桂珍。这是一个真实的名字，这个名字珍贵而朴素，多年来我把它珍藏在心里，多年我等待着一个庄重的场合把它庄重地说出，等待饥饿的记忆再现在我的文字中，犹如等待一个坚硬而平整的台地，语言的青草繁茂地生长，芬芳而雍容，饱含着感恩的心情。我默念着我的老师的名字，把它郑重地写在这里，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我希望所有与我的作品相遇的人、也同样与她相遇，被她慈爱的眼光所笼罩，是我永远的福份。

饥饿的感觉跟随我多年，在我成长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感到饥饿，因为大多数的日子里没有早餐可吃。饥饿使所有的上午漫长难熬，每到第三节课就头昏，弱不禁风，在太阳底下站立都会眼前发黑。最后我就这样长大了。我知道我的饥饿比起大量死去的人微不足道。

## 峨眉经历

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曾经单枪匹马一个人从广西南宁跑到四川峨眉山去。选中峨眉山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原因，我只是想试试一个人到很远的地方的那种浪漫与冒险。但我一旦选中了峨眉山，它就成了我一定要到达的一个目标。

我从南宁出发，坐火车到武汉，从武汉坐船过三峡到重庆，然后到江津，到成都，路上经历了不少曲折，到成都的时候天气已经转凉了，旅游列车都停开了，当地人都说现在去峨眉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但我执拗地想，我无论如何都要去，我甚至把是否能登上金顶看成是人生是否成功的隐秘象征。

第二天我又到成都火车站去，打听到有慢车同样可以到峨眉县，我便排队买了车票上了慢车。

开车大概个把小时后，我发现隔了过道的同一排座位上一个年轻的男孩翻出了一本书在看。他在三人座位最靠走道的一侧，他的右边是另外两个人，阳光照进他的右边，他正好是一道明影。我突然看到他看的书是诗，这使我有一种亲人久别重逢的感觉，我问他，读的是谁



的诗？他说是莱蒙托夫。

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就像《国际歌》的旋律一样，一经说出，立即连空气都充满了同志般的微笑。

读诗的男孩给了我高度的信任和自由，我告诉他我是如何一个人来到这里，又将一个人到哪里去。

读诗的男孩毫不辜负我的信任，他马上叫起来，哎呀！他说，我们早点认识就好了，我刚刚休完假，假期已经用光了，不然我一定陪你上峨眉山。

他说他是峨眉县境内一家国家兵工厂的工人，工资和假期都很多，只是工厂保密，叫什么 724 或 659，他郑重地写在我的本子上，我没能记住这组数字，他说他姓李，好像是叫李华荣，一问年龄，他才 20 岁，现在回想起来，他面容俊秀，红唇皓齿，像花朵一样，浓密的黑发，让人想起“蓬勃”与“茁壮”这样的词。

这是我漫漫长途的一道阳光，明媚、坦荡、像火车的节奏一样，把遥远而美好的东西送到你的脚下。

20 岁的男孩因为假期已满不能送我上山，但他决定把我送到山脚。

到了峨眉县，男孩帮我找地方安顿下来，晚饭后他从家里带来了他姐姐的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即使是山下、也已经秋意很深了，我只穿了一件单衣和一件风衣，身上也没有买衣服的钱，如果不是他拿来了衣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还找来了几个跟他同样大的男孩跟我谈诗，第二天一早他又很负责地来叫醒我，陪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山脚，下了车，他四处看看，觉得不放心，又陪我走了几里地，直到他看到了两男两女的一伙游人，问清楚他们是两对新婚旅行的夫妇，他将我托给了人家关照，懂事的男孩才放心下山。

好男孩今又在何方？

愿上帝格外宠爱他，给他一个好的女孩，让他过最好的日子。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下山后我按照约定将他姐姐的衣服寄到地的秘密工厂，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我一直等他到南宁来，一直没有等到。

我跟着两对蜜月夫妇上山，我发现他们步履轻盈、行动敏捷，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地质队的，这使我大惊失色，我想我最好还是重新搭伙，但我前瞻后顾，总是没

看到合适的团伙。

当时我发着烧，天上飘着小雨，我没有带任何雨具，我淋着雨一步一步往山上走，雨飘进眼睛，四周水蒙蒙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着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一定要上金顶，无论如何要上，这成了我唯一的信念，而一切审美的心情，观光看风景的心情统统消隐了。我看到自己的衣服已全部淋湿，身上发烧的热量把湿衣服蒸腾出一层白色的水汽，我全身裹在这层水汽中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我一步都不敢停，我知道，只要我一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走下去了。从我身边经过的大多数人郁拄着拐棍，所有的女性都是男伙帮她们背着包，拖着她们上去的。只有我是一个人，背着自己的东西，全身湿漉漉地往上走，我觉得自己英勇极了。

我跟在那两对地质队员后面，走了一整天，以最快的速度在当天的傍晚到达了金顶。他们都是好心人，拉远了就等我一下，在洗象池他们还替我照像，那照片在几个月之后寄到了我手里，还放大了。

我们在夜色浓重的金顶发着抖摸到了气象站的房子，那里有棉大衣、炉火和热水，管房子的人问：你们

有没有夫妻，可以住在一起的。两个新娘纷纷说：不消了，不消了，她一个人会害怕，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好了。

一个接着一个地烫脚，又摸着黑手拉手去上厕所，然后上床。被子像铁一样又冷又硬，把租来的棉大衣压在上面还冷得发抖，像在南极一样。

第二天没有太阳，阴沉沉雾蒙蒙的，我站在悬崖边的铁链分留了一个影，是山上的摄影服务社照的，这是我在金预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画面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我穿着一身深色衣服，外面是长长的风衣，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黑色的铁链。

这是一张难得的照片，我把它放大，加印了好几张，它是我生命中到达的一个顶峰。

## 失学的日子

一个医生的孩子也会失学，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也许都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一年是 1969 年，是备战的年月，城镇人口一律要疏散。母亲和继父商量，决定把我和弟弟送回另一个县

的农村老家。他们叫来了我同父异母的姐姐，让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乡下。我们经过地区县，在姐姐的同学家吃了两顿饭，其中吃了一次十分好吃的炒米粉，那家还有一台织布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怪的机器。在街上我母亲给我姐姐的五块钱被小偷偷走了。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姐姐首先想到的是不要把丢钱的事告诉妈，她找了熟人，让我们不花钱就坐上了开往家乡县城的解放牌大卡车。那车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个小镇。然后我们步行20几里回到老家，开始了每顿吃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的日子。

那就是我失学的日子。起初我不知道我将失学了，我以为仅仅是因为备战，母亲让我们回老家暂时躲一躲，很快就会把我接回去的。在农村的叔叔家一安顿下来我就给母亲写信，信发出之后几天，我便每天到大队部等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个月，母亲的信还是没有来。这时姐姐对我说：你不要再等了。你妈既然结婚了，你就在老家过吧，叔叔是好心人，不会嫌你的。这番话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隐约

感到，我也许回不了北流了。

回老家的日子是暑假，秋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就开学了。开学的日子永远是我的节日，我总是在开学的前两三天就会兴奋起来，心情轻松愉快。在那个四年级开始的学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没有人想到我应该上学，母亲没有来接我，也没有给我写信、现在想来，她当时也许真的是打算把我们放在老家了，她已经尽到了责任，问心无愧了。在那段日子里，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队的学校张望，我远远地站在教室的后面，看着那些衣衫破旧的孩子在上课，我的内心充满了艳羡、焦虑、茫然等复杂的感情。我跟现在“希望工程”所要救助的儿童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孩子，而我不是。

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听着陌生的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我想我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啊，我怎么不能上学了，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算术老师会走到我的书桌前，把我提前做出的算术题抄到他的课本上。20 多年过去，老师写信来，仍说我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

命运有时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母亲后来又把我接回身边上学，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长到 16 岁就嫁人了事。每当我想到这个可能的结局时就心惊胆颤，全身冰凉。

至今我感谢我的小叔叔，他都在自己的四个孩子之外收留我们姐弟，使我们能吃上他的孩子也吃的稀粥和咸菜。叔叔让我上山打柴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我母亲都想不到让我上学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所以我一点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子里，听不懂他们说的客家话，没有书看也没有电影看。老家的日子使我沉默、孤僻和绝望。

那些日子我没有想念母亲，我入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跟她们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们。我入神地想念她们的外号，她们吵架的声音、难听的粗口话，她们所有恶劣的行径在我的眼前都如繁花般灿烂和明亮，就像不是我真正经历过的，而是一个梦境或天堂。我与她们真正是隔了千山万水，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我怀着永别的心情给她们写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来了，信封胀鼓鼓的，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动不已地拆了封，里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张

纸，是五六个同学写来的，她们每人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是当年的习惯。她们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鼓励才好，她们便抄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写了庄严的语录，才是她们各自寥寥数语的信。文革中念书的四年级学生，表达不出更多的意思，她们的信空洞无物，千篇一律。我如获至宝地捧着它们，就像捧着最精彩的小说。它们像火焰一样一朵一朵地在我的头顶开放，成为我的节日。

从秋天到冬天，荒凉而无望。春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又要开学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是个聪明的孩子，她举例说，她唱过的歌，不管有多长，只要我听她唱了一遍就学会了。她希望母亲能重现我培养我。我的姐姐是地区高中的高材生，只是生不逢时回乡当了农民。现在想起她，我就看见她一个人站在一片匕首般锋利的菠萝地里，她的裤腿全是湿漉漉的露水，她用凄清的音调唱着毛泽东诗词《七律·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这首歌连同她那凄凉的唱法成为我在老家的日子背景音



乐。

不知是姐姐的信起了作用，还是母亲重新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春天到来的时候妈的信和汇款来了。姐姐重新带领我和弟弟上路，先步行到一个圩镇，然后坐车到县城，从县城换车到地区，从地区换车到母亲所在的县。

到家没几天，学校就开学了，我怀着重获新生一般的心情到学校报到。

## 呼啸而下

在未成年的岁月中，我曾经从事过多种体力劳动，有一些体验是我早年经验中的顶峰。

## 锤石子

铁锤的起落声“叮当”作响，垂直而密集的起落。在铁圈的范围内，石块被一次次敲击，最后四散而去，或者飞起，碰到脸和手；或者像子弹那样落到远处，空中是繁忙的弧线。然后它们堆在一起，排成整齐的梯形，以立方米计算，付给工钱。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底有什么用。用来做混凝土吗？用来铺柏油马路吗？我们从未见过。

石山脚下，或马路边，或学校的操场，排列着大小不一的梯形，它们占据着小镇的月光，使小镇的景观含有严肃的、像街垒一样的气氛。

月光下的小镇梯形林立。

## 洗化肥袋

想起这种洗涤我就想到手，手的记忆至为深切。化

肥厂将用过的化肥袋回收，雇人清洗后再用。残留的化肥对皮肤的掠夺毫不犹豫，侵入和损伤，双手都被烧灼，充满皱褶和细小的裂纹，无论在水里还是在空气中，烧灼的疼痛从十根指头尖利地到达心。

多少年来我还对化肥怀有无法磨灭的恐惧感。

在手的记忆之下，极其难闻极其呛鼻的化肥气味弥漫而来，在烧灼的疼痛之上一层又一层地堆积使人头昏恶心。整个池里的水都散发着浓烈难闻的气味，铺天盖地，无处可逃。在恍惚的状态中，天的颜色绿而陈旧，水的颜色绿而肮脏，那种有毒的绿色与青草与树叶的绿色有天壤之别。

## 运煤

铁铲与斗车，几个人一伙，从堆煤的地方运到用煤的地方，亦按梯形的立方米算工钱。有一块凸出的大石块始终横亘在我的记忆中，坚硬而突起，不规则，像一头牛卧在那里，占据着两斗车煤的体积。我们看中了这凸起的体积，我们疲惫不堪，精神恍惚，在我们恍惚的眼睛里，这凸起的体积妙不可言。我们身不由己地自然

而然地将煤倒在这凸起的石堆上，这样我们的煤堆就像吃进了一头大水牛，陡然变得庞大而突出。

测量的人远远地出现，我们记起了煤堆里掩埋的华而不实的部分。我们觉得这土堆惊人的大，构成了严重的事件，初中生已经知道了“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词以及解义，这些词从煤堆里的非煤部分辐射出来，漂浮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一阵阵心虚。同时我们彼此告知，这煤堆里的石块没有多大，只是稍稍突出，是凹凸不平的地上十分自然的部分。我们彼此证实着这石堆其实非常小，事实上我们已记不清楚它的大小。

测量的人正在走近，我们紧紧挨在一起，他尚未到达我们就已经受到了惊吓。我们感到了电影中被追捕者濒临抓获的紧张，汗从我们的额顶冒了出来。测量的人走过来，他火眼金睛般地用一根木棍探进我们的煤堆，结果碰到了一堵硬邦邦的东西。他马上掏出了小本子，厉声问道：你们是哪里的？都什么成份？我们想大祸已经临头，天就要塌下来了，全校马上就会知道，从此就会像林彪那样身败名裂了。

我们不得不老实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出处，测量的人

一听说有医院的子弟，立即改变了态度。他弯下腰，看我们，问：你们怎么要来运煤？我们同声回答：勤工俭学。和蔼的微笑立即像花一样浮在这人的脸上。他连说三声：好，好，好。

### 搅水泥浆

搅拌的过程伴随着夏天的烈日，沙、石、水泥,三者按比例堆成堆，然后加进水，铁铲摩擦沙石的声音是最刺耳的噪音。在 70 年代的夏天，这样的噪音此起彼伏，密集如雨。阳光照耀在工地上，水、石、铁冒着热气，闪着刺眼的亮光。铁皮斗车，铁皮的车身和铁管的手把，极其笨重，将拌好的水泥浆铲在斗车里，推到建筑物跟前，用固定滑轮递送上去。在某一天，一个少女在递送中从三层楼高的建筑物上摔下来，她经过脚手架，经过铁、绳子和竹片，落到地上，就像一个装满了东西的麻布袋落到地上，她因五脏破裂而死去。

### 运木头

这是另一种高峰体验和另一种呼啸的声音。这件事远远超过了我的能力，用斗车将圆而粗的木头运到解木

厂解成木板然后运回来，横贯镇子远远伸出的两头，经过车辆密集的公路，有两个既陡又长的下坡，这是许多人在骑车时必须下车推行的险恶的坡路。我总是在拉车上坡的时候感受到一种要死过去的感觉，竭尽全身的力气，在将要力竭而死的时候才把车拉上去，没有人帮助，没有人因为你小就少装车。

下坡是一个走向深渊呼啸而下的过程，比跳伞、从高处坠落更可怕。斗车和木头，巨大而沉重地顶在身后，完全无法控制。车轮飞快地滚动，越来越快的加速使车速变得像闪电一般！它们迫使我飞快地奔跑，拼命奔跑，车子就像一头凶猛而健壮的怪兽，如果我跑不过它，就注定会被它压碎。

我被巨大的惯性推动着在大下坡上奔跑，这种奔跑完全无法控制，如果迎面开来一辆汽车或拖拉机，我肯定是必死无疑。我深知这一点，这种恐惧从出发就笼罩着我，我紧张万分，提心吊胆。没有人帮我，所有的人都比我有力气，我走进这个行列，别人就以为我跟他人一样有力气。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一个16岁的弱女干这件活随时都可能送命。

我走在行列中，害怕之极。

直到现在，那种呼啸而下的感觉还能在记忆中惊魂夺魄地复现，它们瞬间就能抽取我身上的重量，变为多年前悬挂在车把上的轻飘飘的少女。那一次，木头没有绑在车的中间，重心靠后，下坡的时候车把一下把我整个扬了起来，我脚尖碰不着地，身体一下悬空，同时我不能松手，不然就会掉在车轮底下，我尖叫着呼啸而下，滑入坡底。这个情景多年来沉淀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恶梦的根源之一。

## 到达南宁

—

我 19 岁的时候在农村插队，有一天我从大队回生产队，刚拐出大路就听到有人在背后叫我，同队的大队干部从单车上兴冲冲地跳下来说，上面让我到南宁改稿。我一时有些不太明白，他又说：是真的，南宁来了长途电话，打到县里，县里又打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大队，让大队赶快讲给你知道。

正说着又有一个大队干部从路上过来，也说让通知我到南宁《广西文艺》改稿，路费由我先出，到了再给我报销。

我匆匆回到队里，匆匆在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黄绿色帆布挎包里塞进毛巾牙刷，以及一本《现代诗韵》。我拉出单车，沿着门口窄而斜的下坡飞奔到路上，链盖被路面的泥坑震得蓬蓬响。

我在山道上呼呼他骑着车，下坡的时候放胆地不抓闸，车体飞快地下坠，又惊险又过瘾。

走上柏油马路的时候，我看到公路两旁的蔷薇正在



怒放，正是在怒放，怒放这个词发明得多么好！充满激情和活力，既像气体般自由，又像火焰般热烈，我从未见过如此茁壮、繁茂、层层叠叠争相开放的蔷薇花，哪里会有这如云堆积的花朵呢？我第一次发现，粉红和粉白的颜色也是可以鲜艳的，它们白里透红，红中泛白，如同天上的花朵。

太阳正在落山，浓彩的金色光焰高高低低地跳荡在娇嫩的花瓣上，五月的风一直从大路的尽头一路吹来，仿佛来自一个不可名状的梦幻之所。

这蔷薇花多像梦中所赐啊！在我 19 岁的时光中，遍布着它们的芬芳，我此前和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灿烂的花丛了。

我在慢车上坐了 7 个小时，南宁马上就到了，它在黑暗中越来越近，一个巨大的幻影在我眼前变化着各种色彩和亮光，轰隆隆地走近我。

火车快进站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片灯海，真是辉煌之极，我睁大眼睛仰望每一处高楼和灯火，我一次次地想：我到南宁来了，这是一个大城市。后来我在南宁居住了 8 年，无数次到达过南宁火车站，从出站口看南宁的街道，

客观地感到这些街道十分平淡，只不过是南宁这样一个中等城市的普通街景。

在我 19 岁的时候，以后的日子尚未到来，一切的惊喜都未曾被剥夺，它们如同一个蓓蕾，牢牢地被包裹着，它们只在一个时刻绽开，那个时刻是如此短暂，这短暂的时刻已经永去不返了。

我在出站口的栏杆旁看到了我的哥哥，这个唯一的哥哥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是我的继父带来的，但他天性善良，待我不错。当时我哥在一家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化工，家里给他拍了电报，他就来接我了。

他像许多性急的人一样攀在栏杆的横杆上，以便使自己的头从众多的头中浮出来。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我先看到了他，他还在往人群中焦急地找我。

那是一个熟悉的、亲人的面孔，从那里散发着安全的气息。多少年后我想起第一次到达南宁时看到我哥哥的情景，还是满怀感动。试想一个 19 岁的女孩、从未出过门，当她在夜晚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万灯闪烁，万头攒动，如果她看不到接车的人，她将怎么办呢？

我跟在哥哥的身后，迎面看到大街上的一座七八层高的  
大楼，一时觉得十分巍峨。

## 二

我走进一座巍峨的五层楼，兴奋而紧张，金色的蜂群在空气中震颤，金色的闪光在白色的墙上和水泥楼梯上闪耀，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刻的文联大楼就是一座宫殿。我又黑又瘦地在楼梯上一步一探头，很快，我面前就出现了一些热精微笑的脸，我坐在诗编室里，听到有人在走廊里探头探脑。诗编室的一位中年编辑一边给我沏茶一边连连问道：你第一次出远门吗？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本来是要去接你的，你妈妈放心吗？不放心？我来给她挂一个长途电话，等会你还能跟你妈说话呢！

他立即到走廊里挂电话，我听见他在走廊里大声说我母亲的名字：文章的章，珍珠的珍。过了一会他进来说：你妈妈不在，我托你们县里的总机转告她，说你已经平安来到了，请她放心。

紧接着来了一个个子很高大、肤色黑黑的人，一进门就说：来了吗？作者来了吗？诗编连忙说：这就是组

诗的作者，又对我说：这是我们的主编符昭苏。符主编说：快坐快坐，很年轻啊！你多大了？

我说：19岁。

他又问：你怎么这么黑？劳动晒的吗？

我说：是天生的。

大家都笑。符主编又一连串地问：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林白薇是你的真名吗？在哪上的学？读过什么书？我也一连串地回答他。

符主编兴致很好地说：那天我没事，就转到这里，问老柯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稿子，老柯说新来了一些，都堆在这里，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就随手翻了翻，就看到了你的组诗，我一看，这就是好诗啊！很不简单，一个年轻女孩子，写出了这样的诗。我一想，就让老柯打长话把你找来了。

老柯说：是啊是啊，让诗歌作者来改稿以前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听见我的心脏充满了呼呼作响迎风飘舞的气体，它们从我的体内奔涌而出。

我在心里使劲地想道：符主编就是我的恩师，我将永远记住他。我想他简直就像一只神仙伸出的手，一把就把我从众多的来稿者中拎出来了，我无法判断我的诗句，而符主编只吹了一口气，我的诗顷刻晶莹透亮地在南宁的天空中飞舞起来了。

符主编高兴地领我从三楼到四楼又到五楼，他边走边说，我带你见见文联领导。他领我走进一间又一间屋子，我听到了一些陌生的头衔（如党组书记、秘书长、文联主席等等）和奇怪的名字（大概是笔名），老头子们大概刚刚恢复工作，一个个又老又精神，老而弥坚。他们和蔼而亲切地望着我说：好，好，这么年轻。他们问我一些相同的问题：父母是干什么的？他们会不会写诗？在哪里上的学？读过什么书？这些问题像一些彩色的气球，悬浮在我的头顶，我走进哪间屋子它们就飘到哪间屋子，我像一个熟练的弹球手，气球一只只地落到我的鼻子尖前，我依次将它们一一弹回到空中，周围的人说：不错，不简单。

啊啊，它们在空中跳动的弧线是多么优美，多么灿烂，繁花似锦的气球们，被我弹碰发出的“噗噗”声悦

耳动听。我的指尖触及那富有弹性的触面，那颤动的感觉传遍我的全身。

符主编领着我一路从五楼回到三楼，他说，南宁你没来过，你先玩两天吧。我们这里刚分来一个复旦的毕业生，是你的同乡，下午让他领你去看电影。

我忽然想起我应该改稿子了，符主编却说稿子不用改了，小样已经出来，他让我到他办公室看看。

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它在其他的惊喜后雍容地来到，像幽蓝的天空上一些先至的焰火尚未消散，一朵大而丰满的焰火就横空出世，在空中绽放，它们一朵朵落在我的头上，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我看到办公桌上正撑着一溜长长的白纸，大小既不像杂志又不像书。符主编拿起其中的一条让我看。

我在那条长窄的白纸上看到了变成了铅字的自己的名字，署名用了我的本名，看到平日里无数次手写的名字穿上了铅字的外衣端立在符主编的桌子上，一时觉得心里有许多感动，我想自己的名字已经变成了黑色的精灵，它们将要分散到许多地方，它们会比我存在得更长久。

一共选了四首，有三首是我自己写的，有一首是抄袭之作。我一行行地看诗，铅印的诗行如同一根魔棍，我的眼睛一触及它，我的四周和我的内心顷刻安静了下来，就像被这诗行吸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些诗句又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确实写过它们，陌生的是我从未觉得它们有这么好，我被它们深深地吸引和感动，我的眼前和耳边满是另一种雷鸣电闪和随风飞舞的事物。

我的视线十分自觉地徘徊在自己的诗作中，一碰到抄袭之作就收回目光，就像一个老实人在邻居的栅栏面前收回自己的脚步。我把自己的诗看了两三遍，我觉得它们就像自己丢失的东西在南宁被重新找回，这件珍宝洗去了尘土焕发了光泽来到了我的眼前，使我惊喜交加；又像一台排练已久的戏，本来是各人穿着平常的衣服分段分场地排练、看不出光彩和激动，所有闪光的东西都被平凡的服饰遮盖了。而一旦正式演出，演员全部化了妆，穿上了戏服，该红的红，该绿的绿，灯光一打，熠熠生辉，乐队一伴，万物噤声，华丽的唱腔自天而降。

真是有说不出的好。

下午我骑着一辆就我的个子来说较高的自行车跟在

我的同乡后面去看电影。我虽然车技不错，能单手在田野的小路上骑车，但南宁车流和人流使我很不适应，我紧张地躲过横冲直撞的车和行人，一抬头，同乡已经骑出很远了，他一点都想不到要领我、我既要紧张地骑车，又要顾着在遥远的前方搜索他，他穿着极易消失的白上衣，常常一眨眼就看不到他的背影了，我急出满头大汗才又找着他，我最担心的是过十字路口，生怕在他拐弯之前失去目标。

更为惊心动魄的就是过邕江大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江。在家乡，只有岸低水缓的河流，河面上有一

nD 条供人行走的木桥，而邕江却是一条真正的江，因 1958 年伟大领袖在江中冬泳而闻名全国，江面上雄踞一条能并排开过五辆汽车的钢筋水泥大桥，在高岸之上，如彩虹飞渡，这一切对我来说犹如梦境。特别是在夜晚，桥面的灯呈弧形悬浮在黑暗的空中，连成一道薄光闪烁神秘莫测的通天之桥。

我看见同乡已经上了桥，但我前面还横着一条横街，人车之流汹涌而过，我跳下车，推车步行着寻找空隙。我一点点在人流中浮动着，一边寻找越走越远的同乡，



我绝望地看到他的头发在桥面上一闪就不见了，在如此危险如此奇峻的地势中唯一认识的人消失了，我感到万分的孤独，南宁的敌意渗透在汹涌的人流中，变得铺天盖地。我觉得我快要被淹没了。我拼命突围，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前冲，我只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冲出去。

等我到达桥头，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的面前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邕江，在我受了惊吓并且疲惫的身心中，这平缓的邕江成了金沙江、大渡河，几乎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汹涌澎湃，浪涛滚滚。我上了桥面恍惚中感到同乡正在桥的对面等得不耐烦了。我心一横上了车。这是我第一次在桥上骑车，巨大的悬空感立即吞没了我，身下深处是河流，桥梁已是悬空，人骑在车上又隔了一层，这两层的悬空感像一根绳子把我吊着，使我上不到天下不着地，我全身的感觉都在那窄窄的两指宽的车轮上，一点都不敢分心。

在我 19 岁的时候，南宁总是给我震惊。

震惊是一种雄大的力量，震惊比没有震惊好。后来我在南宁住了 8 年，我对南宁的一切都已司空见惯。我觉得南宁的车站是这样小，街道是这样窄，河流是这样

浊，桥是这么的短，它的一切都已太平凡。美丽动听的雷声在 19 岁的初夏已滚滚远去，无可追寻，我的天空是一片寂静。

## 沙街

我 7 岁到 12 岁居住在沙街。多年来，沙街横梗在我的胸口，它午后的灼热和半夜时分的细雨飞扬常常在寂静中不期而至。它们广阔、明亮，在阳光的照耀下或明或暗，层次丰满，它们从幽深中浮现，散发出特有的气味，这气味像一种显形剂，将沙街年深日久的房屋、人物一一展现，它们变换着颜色和位置，时而局部时而整体，时而干燥时而湿润，它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浮动，充满了善意和美感。

许多年前，我的沙街就是这样浮动在我故乡的大河上。这条河新鲜丰盈，拥有一个木船厂和运送砖瓦瓷器的浩大船队。船厂与沙街遥遥相望，船队浩浩荡荡，自上流而来，它们停泊在码头上，码头的伸延就是沙街。

船队停泊在码头，把船上运载的气味带到沙街，新出窑的砖瓦、水缸的气味、咸鱼的气味，豆豉的气味，

沿着码头走向大街。木船往码头上搭一条厚木板，船上的大人小孩从船上走到陆地上，他们全部非常瘦，并且黑。

黑瘦的船上的女人穿着士林蓝的布衫，脑后编一根独辫子，尾梢扎红毛线。

船上的女孩子，学习了新鲜的发式，她们扎两根辫子或两把刷子。她们的母亲或祖母，则永远在脑后拖一根营养不良的头辫。

船上下来的人全都光着脚。他们光着脚走在沙街全是细沙的街上。黑衣的男人和蓝衣的女人，以及红衣的抱在手上的孩子，跑得很猛的狗，他们深沉的颜色点缀在沙街的灰色背景中，又和谐又突兀。

沙街灰蒙蒙的日子是下雨的日子，是春天。春天每天下雨，大河又宽又满，沙街充满了水的腥气。水的气息饱含在街面的每一颗细沙里，沙街的树、临街湿淋淋的墙壁，屋顶的瓦全都浸透了雨水。

在下雨的日子里，船特别多，雨把河涨满，船在水里轻松地驶行。

雨是船的阳光。船是雨的孩子。

从船上下来的人，消失在沙街靠河的第一所房子里，这是他们的驿站，不是他们的家。

他们的家在船上，每只船的内舱，都有一块擦得锃亮的地方，既是他们的床，又是桌子，又是地板。

暗红的木板，刷了一层桐油（桐油的气味经久不散），只有两张桌子宽。他们全家睡在这舱板上。到了夜晚，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全都睡在这上面。

地板就是床，因此脚要特别的干净，他们不穿鞋，光着脚走在船上，也光着脚走下船。在我的小镇，一年四季都很暖和，只在短暂的冬天要穿鞋袜。

他们从外面回船，便都要洗脚，他们洗脚的姿势，带了一种船上人的印记。一只脚站在窄窄的木板上（这木板是码头通往船的独木桥，又湿又滑），半弯曲着，另一只脚探到水里，划水，溅起水花，如果脚上的泥较多，就要多划几下，而那只在独木桥上的脚，既要承受全身的重量，又要保持身体的平衡。这种金鸡独立式的洗脚法，很要些功夫。

他们在船上睡觉，也在船上吃饭，也在船上拉屎撒尿，也往船上洗澡。

他们的身影，在黑色的船上游动，站在河边上眺望，像看见着另一种人类。

他们与陆地的人有着天然的隔膜，天然的自卑与自尊，在我站在河边眺望的岁月里，他们带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我站在河边，看见船的尾部在傍晚的时候用竹编的席子围成半圆，挡住岸上的视线，竹席的上方搭着黑、蓝的衣服，白色的水蒸汽从竹席半筒里升腾、弥漫、或飘飞，（这是水汽在我童年印象中留下的另一种新鲜的形体状态，）泼水的声音从竹席里隐隐传出，水在船板上流淌，然后，从板缝流进河里，形成一道奇妙的水帘。

有时竹席围在船板的边沿，板上有类似石头的东西掉下河，发出“咚咚”的响声并溅起水花。

但是你不可以问他们，询问就是触犯。一个清秀的船上女孩冲我翻白眼，就是因为我问她那是不是他们船上人在拉屎。她的反应使我极困惑，以至于把明明白白的东西搞得很糊涂。

我一次次到河边去，观看围着圆圈的竹席下面掉下的东西，它们飞快地下坠，溅起水花，但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船上的人是沙街的过客，沙街不是他们的街，沙街又是码头的伸延，是扩大的码头。

他们在沙街的家，叫“水运合作社”。水运社是沙街靠河的第一所房子，一面墙壁对着大河，一面墙壁挨着沙街。对着沙街开了一个正门，对着大河，开了一个旁门。

他们从船上下来，上了码头就走进旁门。如果要上街，就从正门出来，去买盐买布买咸菜，如果要上船，则从旁门出来。

水运社的房子，样子特别，门口很斜，骑楼特别宽，（在我的小镇，商店铺子和民居大都有骑楼，每家的二楼向前伸出一块，用来躲太阳和避雨。在有的街道，骑楼可连成一条走廊。夏天每天一场阵雨，行人在骑楼底下行走，雷暴雨独自在空彻的路面冲撞，蒸腾起灼热的水汽）骑楼底下放着绞麻绳的水架和铁钩，堆着竹子。

水运社的大门，漆着一种晦暗的朱红色，这种颜色在沙街，显得特别的怪异。在我的小镇，这种晦暗的朱红色，是棺材的颜色，这颜色与死人相连接，象征着不祥与死亡。

沙街上的人，不明白水运社为什么要上这种颜色。

水运社的房子里，永远是湿的，有时湿润，有时湿漉漉，连墙壁都沁出细小的水滴。据说这房子原来曾是一家盐商的仓库，老盐沁进墙里，到回南天就出汗。

水运社里主要是床，上铺下铺，堆着颜色暗淡的被褥，船上上学的孩子，或者不愿随船走的青年人就住在这里。

船上的女孩子，常常年龄很大了才上学，我的同班就有三个，比我大了三四岁。

她们不合流，自成圈子。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不同的班级里，船上的女孩子下了课就聚在一起，高高低低的像一个家庭的成员，小的听从大的。她们很安静，从不喧闹。

我们从远处观看她们。她们脸上的汗毛已经消褪，

脸颊光滑，红润，身体浑圆，胸前微微凸出（我们觉得那是可耻的）。

我们管那些发育早的女生叫“妇女”，但我们不敢叫她们，那些船上的女生，她们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群。一群的力量总是强有力的。

船上的老人也是水运社的长住人员。骑楼下的绞索架和铁钩就是他们的，堆放着的竹子也是他们的。

老人干瘦、沉默、黝黑，他们独自摇动铁把，在木架的一端，粗糙的麻被拧紧、延伸，再拧紧，再延伸，成为坚硬的绳索。有些老人削竹篾（另一些不绞绳索的老人），筒状的竹子被敲开，发出抗拒力量的“嘎嘎”声，然后裂成四瓣、八瓣、十六瓣，然后削成薄的长的竹篾，像白色柔软的长蛇轻盈地跳动，它们仆伏在老人的脚前，最后变成竹席。

码头上堆着山区运来的木头。新伐的松木（永远都是松木），湿润，包裹着树皮，流淌着松脂。清新的山林的气息顺流而下，来到沙街。

码头边的木垛是我童年时逃避母亲的地方，松脂的



芬芳深入我的骨髓和内脏，成为我童年期深感安全的气味，即使在睡梦中也能感到它的笼罩与消失，它就像我皮肤上的那层薄薄的脂膜紧紧贴附在我身上。

木垛经常更换又长年堆积。它们给沙街带来足够的柴：树皮。在冗长的午后，沙街的老人和小孩、手提一把窄口的长把刀和竹篮，蜂拥（或鱼贯）来到新卸的木垛上，各占一方削树皮。他们手脚熟练，削下的木皮大块、完整，稍加晾晒就是不错的柴。

春天是木垛的季节，它们的气息在这个细雨飞扬的季节浓重地弥漫，松脂和松毛的气味在我童年印象中就这样代表了春天，它们藏匿了春天，只等一场细雨，它们才从看不见的地方把春天释放出来。细雨飞扬就是某种信号，松木的气息就是某种证明。

夏天和冬天不是水运的季节，木头滞留在码头，木垛像生了根似的停留在那里。夏天的太阳和冬天的风把木头的水分夺得一干二净，被剥光了树皮的木杆由湿润的棕色变成浅黄、灰白、最后是干涩的白色。

冬夏的木垛有一股由干裂的木头散发出来的呛鼻的气味。夏天的晚上，木垛是乘凉的地方，铺上一涨破草

席，河上的风吹过来，鬼的故事就开始讲述，在我小的时候，许多鬼的故事以及似懂非懂的下流故事就是在木垛上听到的。

事隔多年，当我想从码头上的木垛寻找往昔的爱情故事（真实而完整的）时，我发现我一无所获。河边和草地，木垛和沙滩，因为没有爱情而空空荡荡。

木垛是我的眺望之地，向远眺望船厂（船厂是本地光荣的存在），向西眺望沙街，沙街是我成年后，所有的故事的发源地。

坐在河边的木垛上，眼皮底下就是码头。码头是沙街上的所有人，全都要使用的地方。

首先是挑水。六七十年代，在我的小镇。自来水是一种奢侈的东西，连自来水这样一个名称，也带上了某种贵族色彩。沙街上的贵族是两家国家机关，农业局和防疫站，只有这两家单位装上了自来水，在他们的院子里，竖着一管水龙头，沙街上的人从门口瞥见，就像今天的人们看见私人轿车一样，情不自禁地露出艳羡的神色。

沙街上的人全都吃河水，不像别的街（如火烧街、黄泥街）离河边太远，只好吃井水。（当然这是沙街的人的一种说法，井水自然比河水干净。）

到了下雨的季节，在雨越下越大的日子，河水浑浊、发黄，沙街上挑水的人就到农业局或防疫站挑自来水，比河边更近许多，三两步就挑到家里，哗哗的往水缸里倒，十分干净，和井水河水全不一样，井水有时会有青苔，河水有时会有稻草，即使没有青苔稻草，也有别样东西，因为这河水就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连船上掉下来的大便都是看得见的。

只有老人不喜欢自来水，他们在下雨的日子，吃着用自来水做的粥或者饭，味觉与嗅觉都格外的灵敏，在发现了铁锈味的同时，又发现了“药”的气味，有懂科学的晚辈说出漂白粉的必不可少，老人却认为并感到，自来水寡淡无味，会把肚里的油水刮掉，容易肚饥，且远远比不上河水的香甜。

沙街挑水的时间是在清晨，最早的是一家卖猪红的（猪红即猪血），常常是天还没亮或刚刚亮，沙街上深黑的颜色变成浅黑，浅黑变成深灰，深灰变成浅灰，浅灰

变成灰白，在这样的递变中码头上的台阶变得朦胧可辨，在这样的时刻，沙街尽头的一扇大门开始发出沉重的嘎嘎声，这响声十分大，全沙街都能听见，这家挑水的男人从骑楼底下一路走过，铁桶碰在别家的墙根下，发出咣咣的响声。

卖猪红的在挑到最后一担水的时候，沙街上的其他人就陆续地晃着水桶出来了。水桶有两种，一种是木桶，一种是铁皮桶。木桶比较便宜，但需要养护，在干燥的冬天容易裂开，要记得用水泡着，不然会漏。铁皮桶又结实又轻巧装水又多，但挑回的水有铁腥气，这是沙街上的老人比较计较的。因此只需看看水桶是铁的还是木的，就能知道哪家开放，哪家保守。

沙街是一条临河的街，挑水并不是一件苦差事（如某些干旱地区，挑一担水要走十几里），妇女和儿童，都有去挑水的。妇女和儿童，也都用的是一样大的水桶，并不因为力气小，就换小一些的水桶，小一号的水桶是没有的。力量小就少装些水，或者只装一半。女人挑水的时候，不知因为力气还是因为姿势，总会把桶里的水泼溢出来，两道湿漉漉亮汪汪的水的痕迹从码头一直贯

穿着整条沙街。

这两道水痕，表示了挑水的高潮，太阳一出来，水痕就被晒干了。水浪晒干之后，就很少有人再挑水了。不挑水不是因为水痕已干，而是因为出了太阳，沙街上的人认为，出了太阳之后，河里的水就不干净了。

太阳出来之后，洗菜和洗衣服的就都来了。洗菜的在上游，洗衣的在下游。洗菜和洗衣的几乎全是老女人，也有年轻的（没有工作），她们背着孩子，或者不背，一字排开蹲在码头上，她们将衣服团成一团甩到坚硬的水泥码头上，拍打揉揉一阵，然后往河里一荡，衣服就干净了。

机关的干部职工，也有到河边洗衣服的，若在家里用自来水一桶一桶的洗，过程既漫长又琐碎，不如河边浪漫洒脱，但机关的人洗衣服，决不在早上，而在傍晚，他们吃了晚饭洗澡，洗了澡接着洗衣服。他们拎着铁桶到河边，边洗衣服边看风景。

他们的塑料肥皂盒在灰色的水泥码头上鲜艳夺目，红的绿的，很好看，不像居民们，用碗来盛肥皂，衣服则装在竹篮子里。

除此以外，码头对沙街的功用似乎就没有了，不用刷马桶。

沙街上的人不用刷马桶，每家都有一个粪坑，拉屎撒尿，直接下到粪坑里。后门一开就是菜园，盛上一勺粪便，从河里（大河的支流）盛半桶水搅搅，泼到菜地里。很方便。

菜叶子沾上粪便，长得很好。

沙街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家种菜。沙街靠近河，浇菜很方便，不需要经历大的辛苦，看人淋菜，能看出美感。沙街的种菜人有专用来淋菜的特制的木水桶，比普通的木桶大，在桶壁上凿一个小孔，插进一根竹管，竹管的末端开一道口子，淋水的时候不用把水桶放下，一边挑着水一边将竹管探到菜地里，一路走过去，竹管像喷泉一样喷出弧形透明的美丽水帘，从这头走到那头，一畦菜地就淋完了。早上六七点钟，太阳刚刚出来，站在沙街的后门，看到菜地上淋菜的人三三两两，各执一副突着竹竿的水桶，湿淋淋的水桶在阳光下闪亮着，透明的水帘一闪一闪，淋过的菜叶子明亮碧绿。

他们要卖菜。他们在河里洗菜，把黄叶子和显眼的

不好看的虫叶扔掉，一篮菜装点得鲜亮艳嫩，水淋淋的干净。

于是放在扁担的一头、招摇着走回家、碰上菜好运气好，不到十步就有人问价，走到沙街的街口就卖掉一半了。

有时农业局或防疫站的炊事员兼采购员用单车后架驮着大箩筐出来买菜，碰到了就一挑子叫到伙房去，过秤、付钱，然后一日清闲自在。

一年四季，从沙街挑上市的菜有：空心菜、芥菜、小白菜、韭菜、苋菜、上海青，等等；豆类有：豆角，蛾眉豆；瓜有：南瓜、香瓜、石瓜和葫芦。还有一种长年不衰的菜：南瓜苗，毛茸茸长着小白刺的南瓜苗连同金灿灿的南瓜花，用来做汤，清香四溢。

除了种菜的人家，剩下的营生五花八门，发豆芽的，浸酸菜的，卖猪红的，卖茶水的，卖糖粥的，打毛衣的，晒蚯蚓的，捡橘子皮、捡骨头兼挖草药、打槐花的，还有修钢笔配钥匙的，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论，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

先说卖猪红的，我的小镇有一种说法，认为猪红是洗尘的，吃了猪红能将吸进肺里的灰尘洗干净。沙街上的人便总要打着洗肺去尘的名义买猪红吃（猪红虽然便宜，五分钱一碗，但毕竟比青菜贵，吃贵的东西必需有理由，否则就成了败家子）。

一海碗猪红，用刀划成小方块，往沸水里一投，配上生姜和葱段，几分钟后起锅，猪红像凉粉一样又嫩又滑，热气腾腾香气四溢，边吃边感到肺里的灰尘正在被清洗，所以就连机关学校里大扫除，食堂里也都学样买半桶猪红做汤。

因此卖猪红的生意不错。

除非下雨。

下雨空气湿润，没有灰尘，大家觉得吃猪红有点划不来。

下雨天是挖蚯蚓的那家的大好时光，黄金日子。这是一个寡妇，姓郑，才40多岁却偏偏被称为“郑婆”。

郑婆在睡梦中都能感觉到下雨，空气中雨的气味在她的被头和蚊帐顶飘荡流连，温柔地将她唤醒，她充满



感动地呼吸雨的气息，脑子里做着关于肥硕蚯蚓的想象，如果天还不亮，她在床上辗转反测的时间长一点，她就会想起亡夫，想起自己的命，会哭上一阵。

然后天就亮了。

天一亮，郑婆起床看天井，天井一片亮汪汪的，指甲花的叶尖上滴着水。

郑婆挑着一对小木桶从后门走到野外，看见蚯蚓东一条西一条的都冒出来了，她用手捏用铲子挖，一下就装了小半桶（如果不下雨，蚯蚓躲在泥土里，根本看不见，必须泡一担茶麸水排到野地里，浇地，把蚯蚓引出来，这要顶着太阳耐心等待，很不方便）。

蚯蚓挖回来，郑婆径直往大门口一放，端出小板凳和一根极薄极锋利的竹箴，坐在大门口边干活过望风景。

她一左一右放着两只木桶，人坐在中间，一手捏着蚯蚓，一手将竹箴捅入去，再顺着一挑，蚯蚓就被开了膛，顿时肝胆涂地。

开了膛的蚯蚓肚子里是一些泥汤似的东西，腥气四溢、郑婆将内脏刮干净，把蚯蚓一条一条的搭在一个竹

架子上。

这时最好出太阳，出得越大越好，把蚯蚓迅速晒干。

如果没有太阳或太阳不大，整条沙街就会从街头到街尾都飘荡着蚯蚓内脏的腥气，并且招来成群的苍蝇。

在中药里，晒干的蚯蚓叫“地龙”，郑婆把地龙装在布口袋里拿到医药公司收购站，换得钱供独养儿子阿狗上学。

收购站还收购橘子皮、槐花、某种草根，顺带收购头发、骨头、破铜烂铁等等。郑婆除了制作地龙，也捡些橘皮，打些槐花，有时挖不着蚯蚓，也就势在野地里挖些作药的块根，那是一种奇怪的草，叶子由三个心形组成，很均匀规整地排列着，叶子和茎有些酸，底下是手指大的一分块根。以上物什，一律晒干，然后由收购站分出二三等级，按级定价付款。

除了地龙，这些都是郑婆的副业，因此接近垃圾的东西，比如骨头废纸之类郑婆是不屑捡的。

这是王二的一份营生。

王二是一个孤老头。

住在沙街的边缘，傍着水运社用砖头搭了一小间屋子，十分的矮，举起手就能碰着屋顶、又十分的小，只放了一张床，蚊帐是黑的，火灶就在屋里一进门的地方，也是用两块砖头架成的。

王二的门口有一小块空地，终日不闲地晒着垃圾，红的是橘皮，白的是槐花，灰的是骨头，斑驳的是浸过水的废纸，也晒着蔗渣、木皮、木屑，是王二做饭用的柴。

王二一个人，没有负担，换来的钱用来买半壶三花酒，偶尔也买花生米，做熟的猪头肉。

王二个头很矮，鼻头却又红又大，据说这就是酒糟鼻。不知是饮酒饮成了酒糟鼻，还是酒糟鼻导致了嗜酒。

1967 年发了一场大水，淹没了沙街。大水过后王二的矮屋不见了。王二也不见了。

王二从此以后，就在沙街消失了。

再说那发豆芽的和浸酸菜的。这两家正好挨在一起，而且各有几口大水缸，所不同的是，一家的水缸里铺着细沙，放着绿豆或黄豆，盖着树叶，每天洒水。而另一

家的大水缸里则长年留着酸水，一年四季上市的青菜萝卜生姜豆角，轮番在大缸里浸泡，变尽了颜色，变化了味道，成为我的小镇上交口称赞的宋家酸（这家人姓宋），宋家为了陪衬酸菜，还锦上添花地专门制作了一种辣椒酱。

这种辣椒酱色泽鲜艳，味道独特，辣中有点甜丝丝的，抹在雪白的酸萝卜（只有宋家的酸萝卜是雪白的）上，极其醒目。宋家又制作了一辆特别的推车，上下两层。各各放着几只养金鱼的玻璃缸，内中泡着各色酸制品，盖着木盖，沿街推着。

木制的轮子辘辘地响，听见响声就知道里宋家酸来了。中学生小学生一群一群地围过来，挤进去的举着钱，挤出来的举着涂了鲜红辣椒酱的雪白萝卜块。

一抢而光。

宋家的悠着步子，辘辘地推着空木车回家去。

卖豆芽的是上午，卖酸菜的是中午到下午。这两洋都是须得挑着担子从这头到那头，走走停停地做买卖的。

若下了雨，宋家的站在门口看了一回，一般就算了，

否则几个玻璃缸都用塑料布遮住很不方便。磕磕碰碰的也不利落，她就坐在门口等雨停。

卖豆芽的却不管下雨不下雨，戴着一顶大斗笠就出门，也不披蓑衣。他用手挎着一个木桶。一路走在骑楼底下。

下雨天大家难得出门买菜，看到豆芽到了家门口，心中喜，连忙喊住，一买买了不少，够两顿吃的。因此卖豆芽的在雨天买卖更好些。

沙街上只有两家不必挑着担子做买卖，一家是茶水摊，一家是糖粥摊。

这两家均在沙街的最西头，在沙街与别的街交接的地方，这是我的小镇上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叫东门口（小镇一共有两个十字路口，另一个叫西门口。西门口是全镇的中心，有百货公司和邮局）。

他们在自家的门口摆上两张案桌。桌上布着各自的茶杯碗盏，骑楼伸出半截，挡住了天，有喝茶吃粥的，就正好在骑楼底下。

茶水摊卖两种茶：菊花茶和黄老吉。菊花茶二分钱

一杯，黄老吉三分钱一杯。

黄老吉是一种极苦的凉菜，大多数人需要皱着眉头才能喝下去，可见其难喝。但镇子上的男女老少，没有不喝黄老吉的，黄老吉是我的小镇上有着特殊功效的饮料，小镇宁可没有菊花茶，却不可没有黄老吉。

在我的亚热带的小镇，所有的病，不管是伤风感冒，或是发热长毒疮，一概称之为“热”，有点类似上火的意思，但比上火范围要广。而苦茶黄老吉，就是专门降热的极为灵验的“药”。

谁眼睛红肿，谁喉咙发痛，谁拉不出屎，谁手背上长疮，一概都去茶水摊饮黄老吉，有只喝一杯的，有站着一气灌上两三杯的，也有一天三饮，像喝药一样准时来的。

有不少“热”喝了黄老吉果然就降下去了，也有降不下去的，就只有们喝着黄老吉，一天一杯，或者一天三杯，好在黄老吉并不贵，比抓药便宜许多，而且吃到最后往往总能治好。

因此大家很信任，没有病的时候也宁愿喝黄老吉而

不喝菊花茶。

（后来风靡全国的红茶菌也未能取代黄老吉在我的小镇流行起来。）

糟粥摊在茶水摊的对面，摆着一张矮方桌，浅口的海碗，五分钱一碗。粥是棕黄色的，像放了酱油一样。粥里放的是一种叫“黄糖”的蔗糖，为本地农村的糖榨听出产，比较便宜。

黄糖的形状是像豆腐大小的方块，很坚硬，烧菜时要用刀刮，孩子嘴馋时也用刀砍成小方块作为糖果。在我的小镇，白砂糖是奢侈品（到了 80 年代才成了白糖的产地），无论是糖粥、储糕、糖水丸子，一概用的是黄糖，因此所有甜的东西，都是黄糖的黄乎乎的颜色。

沙街与东门口相连的地方还有一家卖酱袖盐的小铺子，里面常年蹲着一个老头。这家铺子卖一种叫豉油的调料，豉油的作用跟酱油差不多，但色更深（深得有些发黑），味更浓，不是液态而是膏状。

我的小镇不喜欢酱油，认为酱油稀且颜色浅，不上算。只有用豉油炒菜味道才正宗。

豉油装在一一只宽口的瓦盆里，旁边放着竹刮子和晒干的桐油叶，有人来买，两分钱一小刮，五分钱一大刮，用桐油叶来盛豉油，长长的叶柄穿透叶面。

豉油的香味在傍晚的时候从三家五家的门里溢出来，飘满了整条沙街。一种暖融融的气氛因了这特殊的香味而充盈着、扩散着。夏天的时候各家把饭桌搬到门口，豉油炒猪肉的香味更加透彻，使得只吃青菜萝卜的人家也闻着这香味多吃了半碗饭。

除了以上的几种营生，沙街上还有两家手工业者，一家是做木桶、木凳桌子的，经社会主义改造后成立了一家木器社，在 60 年代中期，木器社已经十分衰微，名存实亡，还原成为单干户，儿子已到新建的水泥厂当了工人，老子在家只接些修修补补的活，门庭很冷落，已经完全没有“社”的样子了。

另一家是沙街上除了两家国家单位外最体面的人家，这家只有一个不太老的女人和一个小女孩。老女人靠替人打毛衣过日子，小女孩是我的同班同学，叫斯慧。

斯慧名字这样不俗，想来她的父母或者老爷爷一定是有学问的人。但她的家永远只有姑妈一个人，偶尔有



个把青年男子进出，那也只是斯慧的表叔表舅。

斯慧从不说她的父母。不知她的父母是不在了还是在很远的地方。

斯慧的家一年到头十分幽静。她家的门厅光线很暗，在阳光强烈的白天，从街上看不清门厅里的任何东西，走进门，会忽然看见有人正在看你。

斯慧的姑妈在漫长的白天喜欢坐在门厅里。她有时坐在靠背椅上打毛线，有时靠在躺椅上养神。

她的手指白晰细长，毛线缠绕在手指上，很像藤蔓缠在某种暗淡的百合花朵上。

斯慧的姑妈喜欢种花草，门口的空地上，用断砖头围着，放了一些沙质土，种着一种开紫色小花的紫色扁豆（蛾眉豆？），豆叶爬上架，长成满满了一架叶荫，紫色的小花间插其中，既有无限的清凉，又有美丽的情致。

她们家的天井里，养着月季花和指甲花。指甲花是白的和粉的两种，月季是粉的和红的两种。

在我的小镇，指甲花是一种最普遍的花，每户的天井（或者门口）都放着几盆，极为平实，毫不起眼。与

我后来记忆中美丽绝伦的指甲花大相径庭，我想那种超现实的印象肯定是斯慧家的指甲花造成的。

穿过斯慧家幽暗的门厅，从一条窄小的走廊穿过去，就是一个天井。天井的四壁和地上全长满了青苔，潮湿、阴凉。光线照在天井里映得有些发绿，在湿绿的天井中间放着两大盆指甲花，一盆粉白，一盆鲜红。

粉白的清淡，鲜红的妖娆。一白一红相配，就完成了一个绝色女子，夺人心魄，不动声色。柔软的花瓣在若有若无的风中轻盈地翕动，又像呼吸，又像颤抖。花瓣无声地掉落，一片一片地分布在湿润的绿色青苔上。

指甲花的香气在潮湿的空气中隐隐浮动。被雨水浇湿的叶子在天井中间闪闪发亮。

多年来，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无声的天并在我的记忆中盘桓，幽暗的门厅和走廊阒无一人，艳丽的指甲花在疯狂生长的青苔中间徐徐开放又无声地落下，成为我后来关于沙街的故事中的重要场景。

沙街的房子，无论是斯慧家还是卖猪红的、种菜的人家，格局都很一致，全都是又窄又长，像某些旅游胜

地的一线天。一进门就是一个窄而长的厅，厅的尽头是一条长走廊直逼到后门（后门是菜地或果树）。走廊把人带到每个房间和天井。

天井是沙街的民居中最重要的部分。没有天井的房屋在沙街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天井就没有亮光，没有下水道，没有晾衣服的地方。沙街的房屋一家紧挨着一家，没有阳台，没有开向外面的窗户，只有天井才是唯一的空隙。

天井就是太阳。

天井也是晒衣场，也是下水道，也是花园。

不同的天井有不同的用处，第一个天井放花盆，是一个家庭的门面，第二个天井晒衣服，牵着晾衣绳。第三个天井接近厨房，就当下水道。

只有一个天井的房屋是寒酸的。只有布满三个天井，才够得上完美。

沙街上只有农业局不是这种格局。农业局的房子是新建的，一个院子进去，排了几排参差的平房，房前房后全是树木，我印象较深的有橙子树和梔子花，这两种

花都有很浓郁的气味，它们常年浮动在农业局的院子里，成为我童年时代关于气味的重要记忆。

农业局的平房质量极好，砖是上好的砖，瓦是上好的瓦，瓦檐上有护板，涂了一层暗红的颜色，人字形的屋顶，在墙壁的最高处开了一个圆形的透气口，上面装着像百叶窗一样的木片，也同样涂了深红的颜色，这使整幢房子像有了眼睛似的神采奕奕起来。这又是一种身份，一种标志，在我的小镇，人武部、检察院、县委会这样的机关，墙顶上都有这种圆形的出气孔，这使它们有了一种天然的气派，与紧挤在一起的灰色民居划开了界限。

从沙街沿着河岸走小路，绕过农业局的围墙，就到了县城唯一的公园。公园很小，不过十几棵大树，几处石凳以及一些花草，一个戏台，一眼就能看周全。公园的边缘是河岸，连接着大河，并伸延到对岸，对岸是一片平坦的萝卜地，视野十分的开阔，比起装点着人工湖和假山的大城市公园，反倒浑然天成，味道十足。

公园里最美丽的树是两株鸡蛋花树。这种树非常有趣，长着像巴掌那么大却比巴掌还要长的大叶子，又厚

又硬，树底下是一片浓密的树荫。树上开的花朵，只有叫鸡蛋花才恰当，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鸡蛋花的学名叫什么。

鸡蛋花的花瓣是蛋白那样的白色，靠近花心的地方，却变成了蛋黄的颜色，于是一朵绽开的鸡蛋花恰好就像了一枚花插着切开的鸡蛋。

鸡蛋花树开叉很低，分叉繁多，像是专门为孩子们上树准备的，再胆小再笨拙的孩子也会受到这些密布树杈的诱惑，情不自禁地一节一节往上爬。

这两棵鸡蛋花树，有中等的榕树那么大，需两人才能合抱，不知种了多少年，不知是谁种的，树种里从哪里来的，我一直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这种树，在我的小镇，这两棵奇异美丽的树孤零零地生长着。我 17 岁插队，19 岁离开家乡上大学，后来分到省城，在那里才看到了鸡蛋花树，一次是在一个导演家，看到的是盆栽的，还没开出花来，我因此认不出，无意间问问，却听到一个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名字，久违了的鸡蛋花的形象洁白美好地从绿色的阔大的叶子中间鲜明地浮现，使我在别人家的客厅里出了好一回神。

还有一次是在这个亚热带城市的某个风景区，我看到了几棵这种树。当时正是开花季节，我一眼就认出了这种外白内黄的花瓣，但它们此地显得瘦长单薄，老气横秋，连树形都瘦瘦的没有多少树杈，丝毫引不起亲切之感。但它们的确就是鸡蛋花。

我怀疑这是一种变种。

过了很多年（大概十几年），我回到小镇，那两棵树已被砍掉。但这树的影子日复一日地在我的记忆中沉积，越来越变得完美无缺，光彩熠熠，散发出年深日久的灿烂的芬芳。

公园里还有两种不错的树，一是万寿果树，一是红豆树。万寿果在北方似乎叫拐枣，红豆树的学名是不是叫相思树，我至今没搞清楚。

万寿果树根高，万寿果果实很小，曲里拐弯的很不好看，大概在能吃的果实中是最丑陋的一种。

万寿果熟干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一阵风吹过，三三两两地落下来，孩子们眼巴巴地等着，一掉下来就直接从地上捡到嘴里。

孩子们喜欢捡的还有红豆。红豆有两种，一种是扁的，全身皆红，一种是椭圆的，半红半黑，又叫鸳鸯豆。在我的镇子，两种红豆都有。

捡了红豆，用手帕包上，回家放进煤油灯里，被煤油和玻璃一折射，或拉长或挤扁，在夜晚幽幽忽忽的灯火下，这些或长或扁的红豆在煤油中艳艳地红着，产生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装饰性。

煤油又称“火水”，因此红豆又叫“火水豆”。

公园的一角有个露天的戏台，是用土筑成的，很矮，周围用砖围着。戏台的两边，种着一些美人蕉和扶桑。这两种花木，在公园里随处种着一些，只是东一丛西一簇的，没有章法，显得有些七零八落。

戏台侧面是一幢古色古香很好看的房子，先是做着图书馆，后来又成了广播站。房子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玉兰树，下去是一口水井。

这口水井很讲究，井口砌成八角形，井台很宽，外沿是一道排水道，与井口并行形成外八角形，内外两个八角形之间又有一行出水道，水井里的水满了就沿着这

出水道流到外八角形的水道，人们可以在外水道直接洗手洗脚洗菜洗水桶。

水井的周围围了一面有三人高的高墙。

没有高墙的一面，是一个老亭子，亭子的后面是一道矮墙，墙上有一个圆形的门，门里是一所特别的房子，最显眼的就是它那大大的木格子窗，这在我的小镇是绝无仅有的。

据说这房子苏东坡曾经住过，不知是真是假。我后来曾到过比我的县城更南的县分，也有与苏东坡有关的遗址，想来当年苏学士也许确实来过此地，并且停留了十天半月。但这房子是否真的就是他住过的那所，这是很可怀疑的，看着不太像经历了八九百年的样子，但这亭子刻着东坡亭三个字，确实是纪念东坡所建。

那房子后来成了县博物馆，逢星期天开放。

公园的后面，还有一座大木桥，有上百个桥墩，用木板钉牢，能过板车和自行车，但桥身的木板间隔较大，像电影上看到的铁索桥，只不过这桥的桥栏不是铁索，而是木条。



平常的日子里，桥面离河面很高，过桥心惊胆颤。有一种在山顶着峡谷的感觉。

每年都发大水。河一涨涨到挨近桥面，这时站在桥上反倒不害怕，有一种脚一探就探到地下的感觉，而实际上，这时的河水是深得不得了。

有时水发得很大，就会淹没桥面，整座桥一下不见了，而这种时候，连沙街也都淹没了，人们或者到亲戚家避一避，或者把东西搬到阁楼上。大水虽然涨得快，退得也快，一夜之间也就下去了。

水退之后大家一看，街面上一层淤泥，还有一些上淤漂下来的垃圾稻草，每家的墙都留下一道清晰的水痕，好像有人统一划了一条线。

有人在自家的墙上用木炭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发大水”，以此纪念。

大水过后一切照常，房子仍然能住，桥仍然能过。这木桥造得实在结实，一年一年的发大水，日日夜夜站在水里，水淹没了又冒出来，不歪不斜不散架，该运沙的运沙，该拉菜的拉菜，板车辘辘地从桥上经过，一点

也不耽误事。

只是有一年发大水，住在河边的糟鼻子王二的小屋被冲掉了，老头从此也就不见了。

公园的前门出来，是一片开阔的街面，有一家少年之家和一家电影院。在 60 年代，少年之家曾给我的小镇带来过莫大的荣誉，这荣誉到了 80 年代还在伸延，因为当初来这里视察过这少年之家的胡耀邦同志在 80 年代初当上了党的总书记。

少年之家还出过一些有传奇色彩的事，我曾在一个回忆材料上看到过。其中之一是，少年之家曾经养着一条大蟒蛇，这蛇通灵性，在 1966 年红卫兵将要砸烂少年之家的前夜，大蟒蛇咬断铁窗，一去不回。

电影院在少年之家的侧面，据说是本地的海外华侨捐资所建，故名“华侨电影院”。

这是我幼年和少年时代常常要去的地方。电影院不光放电影，演戏，开大会、听报告，只要是需要集会的事，就在此处进行，因此电影院也不知怎么就被叫成了礼堂。

我在这里看过的电影有《小铃铛》、《花儿朵朵》、《雷锋》，大的是在五六岁到六七岁，很快就没有电影看了。由于没有电影看所以对从前看过的电影念念不忘。

后来忽然又有电影看了，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再后来是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沈阳，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桂林，莫尼克公主美丽的微笑照耀了中国从南到北的天空。又有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庄则栋稍稍发胖的身躯挥舞着球拍，科教片和新闻纪录片穿插其中。后来电影渐渐多了起来，终于又有了故事片，越南片《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朝鲜片《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人》。

又有了拍摄成舞台艺术片的样板戏，开始是黑白的，并且只有16毫米的胶片，用一台旧机子架在座位中间放。第一次放的是《智取威虎山》，是过路片，第二天就要还人，于是一晚上连放三场，整个镇子的人兴头十足地守候在电影院门口。散场时看到影院门口外拥挤的人头浮动在半明半暗中。

在影院门口的灯光所照射到的范围里，人们相互招呼、闲谈、等待，他们从不同的角落，不同的阶层来到

这里，他们在这里翘首以待，像虔诚的教徒等待进入天堂一样等待进入电影院。

多年以后我记起这种场面和这座建筑，确实错位把它当成了教堂的样子。这个教堂并不通向天上，而是通向远方，远不可及的永远不可能到达的远方就是我们当时的天堂。那里又是通向梦乡的处所，我们把票交给守门人，进入灯光微暗的大厅，墙上凹凸不平，使我们产生奇异的感觉。

我们身处异地，奇怪的墙阻挡了外面的世界，掩盖了平凡的日子，我们被单独地抽取在这个地方，等待一种东西的降临，我们在兴奋中又有几分紧张，我们仿佛来参加一个神秘的仪式。一道铃声召来了黑暗，把我们彻头彻尾全身上下笼罩在这莫测的黑暗中，我们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这时一道灰白的光从我们的脑后直射而来，停留在我们面前的白色布幕上，我们的双眼被集中在这片光亮上。这是我们唯一的通道，我们将从这里进入我们的梦乡或者天堂。

我们身不由己地被催眠，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片亮

光之中，我们觉得那上面的人就在我们周围，我们穿上了电影上的衣服，爱上了其中的男主角或女主角，我们真诚地流泪，真心地高兴。我们不记得这一切都是假的。直到终场，直到灯亮，我们仍似醒非醒地揉着眼睛，沉浸在梦境之中。

这是电影事业最坚实的基础，我从幼年起就是这基础的坚实分子。后来我到电影制片厂工作，亲眼看到电影是怎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出来的。即便这样，也仍然在看电影的时候接纳它的悲痛与欢喜，它的残片与台词。

这样单纯天真的观众在我的小镇比比皆是，或者说，镇上全是这样一些单纯天真的观众，看电影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的社交，他们的时髦。

有时碰到盛大的节日，电影院里装不下这许多人，就会把银幕牵到县城开万人大会的场所——体育场。

体育场很大，比足球场还大一倍，周围是一圈马尾松和柚加利树，没有围墙，外面是平阔的稻田。这里本采是刑场，专用来处决死犯的。后来修成了体育场，所谓体育场，也就是修了一条跑道。为了便于开大会，还

筑了一个戏台。直到 70 年代，处决犯人仍在这里进行。

仍说看电影。

偌大一个体育场，中间竖着一方小小的白布幕，显得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一阵风吹来，布幕兜着风，动荡飘摇、像大海中的一张船帆。

但是奇迹马上就出现了。人们拎着小板凳或者塑料布或者旧报纸，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鱼贯而来。他们一登上体育场的台阶就看到了竖在草坪中间的银幕，看到银幕，他们两眼发光脚步加快，他们纷纷迎着这布幕走去，然后在布幕一面的中间坐下来。

人越来越多，正反两面渐渐坐满，坐成黑压压的一片，坐成人的海洋。

于是奇迹就此形成，在草坪中间风雨飘摇的船帆顿时变成了一面旗帜，呼唤着人们的热情，X 像一种魔法，迷惑了人们的理智。

电影开始放映，电影的声音被空旷宽广的场地所吸收所分散，怎么努力也听不大清楚，银幕空悬着，上面的人又薄又扁，风不时吹来，把银幕吹得歪歪扭扭，上

面的人也跟着歪头歪脑，两条腿斜斜的。

很容易觉悟到是假的。

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地松松地坐着，像看热闹似地看着银幕，一边嗑瓜子闲聊，还有起身到外围买一节甘蔗来吃吃。孩子们或者已经瞌睡了，或者开始在人缝中窜来窜去。

这跟电影院完全不同。电影院像教堂，体育场像公园。而体育场上一般也不放新片，放来放去总是《地道战》，或者《地雷战》，人们已经看了许多遍。银幕竖在那里就像一个喷泉设在那里，银幕上的人在动，就像喷泉在喷水，是公园里的一个点缀，是节日的一个点缀。

在我的小镇，一年中从4月到11月都是夏天，在闷热冗长的夜晚，很需要有点文化生活。电影院里倒也夜夜灯火不断，在最没有电影看的日子里，也没荒废。

在当时，遍地都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各学校、厂矿，小的厂矿有业余的，大的厂矿有半脱产的，县里每年搞一次汇演，以选拔文艺人材，而县文艺队的演员中，有几个就是在汇演中选出的。

县文艺队是县里唯一的文艺团体，是县里的一朵花，一颗珍珠。文艺队的几位台柱子，受到全县城的注目，县城还有那么一位特别幸运的（绝对不是最漂亮和最有一技之长的），被选到了地区文工团，这在县城里，就像是当了皇妃一样，她每次回家看父母，总是高高地昂着头走在大街上。

地区文工团每排出一套新节目，就下各县巡回演出，一连演好几夜。接着还有省里的各类文艺团体的小分队下乡演出（县城也是乡村），这下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弄得着票了。电影院门口热闹非凡，组织部门还派来了工人纠察队，戴着红袖标排成两排站在门口旁，谁也别想冲进去。

演了几夜，忽然来了消息，说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准备在体育场举行一场公演，不要票。于是大家都去看，看过了的也去。

邻县的也来演，铁路的也来演，部队的也来演。一来就到礼堂（该演戏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将电影院称为礼堂，好像这样才名正言顺）装台，也没有什么可装的，不过是挂一块随队带来的布幕。卸下服装道具。



一看电影院门口出现了大卡车，就等于出了广告，说明晚上有戏看了。

不管县里的，地区的，甚至省里，不管是铁路的还是部队的，节目都大致相同。开始时不外是些对口词，三句半，《收租院》。后来发展得比较丰富，一台节目中有藏族姑娘的《洗衣舞》，雪白柔软的长袖在舞台飘垂，十分的美丽。又有朝鲜族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女演员们穿着朝鲜人民的长裙子挂着腰鼓疾步旋转，裙子鼓得像灯笼。表现越南人民打美帝的《竹签舞》，竹签是用来做陷阱的，表演时每人带着一根。还有戴着草帽挥舞镰刀的《丰收舞》，以及纺织女工之舞，炼钢工人之舞，等等。

光舞蹈不行，没法换服装，需要穿插一些笛子独奏或二胡独奏或者民乐合奏、或男声独唱或女声独唱。

压轴戏自然是样板戏，某一场，或某场片断。大幕久久垂着，听见人们跑来跑去的声音，拖动重物的声音。大家伸伸懒腰，交头接耳地等待着。

大幕拉开，舞台上竟有了一间屋，虽然只有一面墙，里面也只有简单的桌子椅子，但确实是一间屋子。而这

间屋子的后面，或者是莽莽的雪原森林，或者是黑乎乎的铁道，这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

于是大家屏息凝神，观看一场痛说革命家史或者到深山访贫问苦的戏。看了很多遍，每个动作每句台词都是知道的。

仍然睁大眼睛看。

就像一首流行歌曲（革命歌曲或者摇滚），如果大家都唱，剧场效果必是极热烈。

也有专场演出全剧的，省歌舞团来演《白毛女》，地区京剧团来演《红灯记》，邻县强一点的文艺队也能演上一出《智取威虎山》。

大家觉得看真人演比看电影过瘾，于是电影院门口夜夜灯火，总有一些等票的年轻人。

大量的文艺演出在 60 年代，是我的小镇上最主要的文化生活。人们弄票看戏，得以交际。得以施展手腕和魅力，得以作为借口，作为人情。

人们看了演出，得以度过闷热冗长的夜晚。无聊而闷热的夜晚就这样一夜一夜地过去了。

平时的日常娱乐，也每天都有，比如两个女人吵架，吵得披头散发，声嘶力竭，两家的隐私声高低，被围观的人们听得一清二楚。又比如两个男人打架，头破血流，怒目圆睁，血是真正的血，眼睛里喷出的火也很厉害，足以烧灼仇敌好几代人。

这些都很好看。

但都是些小打小闹，不算盛举。盛举是文革中的武斗。小县城里没有用真刀真枪，却用了许许多多的砖头。

声势是浩大的。

浩大的声势是吓人的。

有一年（大概是 1967 年），沙街上所有的单位及人家临街的窗全都封了起来，门口用一根橡树一样长的木头顶着。

这一切都让人不安。

街上没有亮光，狗在叫。

到了天亮，从沙街走上东门口，到了大街上的十字街口一看，满地砖头，砖头中间有几滩血。县城最高的建筑四层楼的华侨大厦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这是我小时候看见的一次武斗的残局、废墟。无法言说。

其余的日子里大人不许出门，也没有学可上。关在封了窗口的房屋里。

全国备战。全民挖防空洞。县城旁边的一个山头，挖了许多纵横交错的战壕，又有猫儿洞，又有像《地道战》那样的真正的地道，钻进去没有亮光且曲里拐弯，分不清东南西北。

学生也挖。工人也挖。干部也挖。

关于光辐射和冲击波的知识在迅速地传播。准备打仗。每家门口还放着两口大缸，一缸里沙，一缸是水。我至今不明白这沙和水如何应付核战争。

防空演习要开始了，要每人准备一套黑衣服，以免暴露目标波及全体。不久又要准备一套白衣服，穿在黑衣服的里面以挡住（减弱）核辐射。

自然是很难办到的事，于是折扣为以深色衣服代替黑衣，以浅色衣服代替白衣。

仍有麻烦。要长年预备在枕边，待警报一响立即穿

上。小镇上的人们一共只有那么一两套衣服换洗，老是预备着平日穿什么呢？

防空警报却响了，是县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发出的，呜呜地响，长长短短，一声接着一声，十分紧迫，你不由得惊醒，不由得从睡床上爬起来。

你先觉得这是假的，因为事先来过通知要演习，于是你从容地穿衣穿鞋，从容地开了门走到大街上。

大街上却一片忙乱，警报声比在室内听到的更加响亮，更加刺耳，听起来有些心惊胆颤。再一看，满街的人都在奔跑，气氛紧张。

你不由得疑心这也许是真的，敌国已经开始突然袭击，飞机黑压压地随后就到，这一想你觉得这确实是真的了，便也跟着奔跑。

四面黑乎乎的不准打电筒划火柴，黑沉沉的夜裹着黑压压的人群。

刚刚到达防空的战壕，却传来了消息，说警报解除，演习结束。大家轻松而疲惫地往回走。

第二天上班，却成了回味无穷的话题，谁家的男人

错穿了女人的上衣，女人却穿了男人的裤子。谁穿反了鞋，谁扣错了扣。而秘密恋爱的某男某女，在黑地里没有跑到防空洞，却钻进了树林里。等等。

从此丰富了平淡的生活。

在沙街，还有一样大景致，就是河对两船厂的造大船。

船厂荒废了一段。后来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于是沙街的居民们隔着河望见对面的船厂从屁股里伸出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开始时横七竖八地堆在沙上，后来来了一些人，这边听见丁丁当当地敲，那边就看到船的骨架竖了起来，一日一日的丰满成型。船厂的工人革命热情高涨，夜里牵了一盏一百瓦的大灯泡。

一百瓦的大灯泡明晃晃地悬在船厂的沙滩上空，在闪着微光的河面上空上了一层绸缎般的光泽和颜色，暗黑的阴影衬托着被灯光照得泛金溢彩的水面，河水流动，变换着闪光的位置，远远看去，像是一座水榭式的戏台，在黑沉沉的群山和马尾松之中，独自明亮着，舞动着，给对岸的人们表演着无尽的风流潇洒。

新造的船却出奇的大，从骨架上就看出来了，张牙舞爪地像一只特大恐龙，这只新船叫“革命一号”。这船因为太大，怕在河中心搁浅，造好后披红挂绿一番以示庆祝，却始终不敢下水，据说是因为技术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使用。

成了一个笑话。

却因此有了“革命二号”。

二号平头正脸，吸取了一号的经验教训，没有虚胖。但仍然是夜里加班，夜是夏夜，沙街的人坐在木垛或码头的台阶上，看见灯映在水上，船罩在灯里，人影绰绰，红旗无声地拂动。

船慢慢地就造好了。

仍然披红挂绿，敲锣打鼓。这回胜利下了水。船厂的沙滩是一个斜坡、船被拖着，缓缓地下滑。船肚触碰到水面，水花飞溅。

下了水，先横着驾驶。

船是木船，却装了机器，所以叫机帆船。机器突突地响，溅起了浅浅的水花。虽然船已见过无数，但装了

机器的船却是个新生事物。沙街的人们聚集在码头上观看，心情有点激动。

他们听见机器突突地响，“革命二号”四个字被漆成鲜红的颜色顶在船上驾驶室的正面，被早上的太阳照得一跳一跳的，河水也有些晃眼，人们纷纷手搭凉篷，搭了凉篷也仍然晃眼。在晃眼之中船就到了跟前。

原来是接水运社的领导试航，水运社的领导是个好脾气的老头，他不慌不忙地上了船，在船头上他对大家说，这次试航就是开到大木桥那边，转一圈就开回来，仍开到这码头上，欢迎大家上船玩玩。

我就是在这次乱纷纷的试航中第一次跳上一只装了机器的木船。

我从码头上向船舷奋力一跳，跳跃的姿势停留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童年时代在沙街的平淡生活中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一跃。

## 离开与抵达

广西虽然是我现在已经离开的地方，但我发现，这种离开反而把它更近地拉向我的内心。



我在广西的时候，广西是一块我身外的空间，我在其中走来走去，并没有感觉到特殊的意义。当我离开，这块完整的空间就变成了无数的碎片，它的点点滴滴从遥远的南方来到我的眼前与梦中，又在我的梦中变得无比巨大。棕榈大道遮天蔽日，它的一张叶子就有整个天空那么大，而它们常年的绿色守候在我北方的窗口，我在对它们的凝望中瞬间抵达南宁，这个我生活了 8 年的城市。我看见自己在没有雨的傍晚骑着单车走遍全南宁。我的风衣或裙裾在向着七一广场下滑的大下坡高高扬起，那一种飞翔的感觉只有南宁给过我；如果河堤路稍稍平整一点，我会很乐意每天傍晚都到那里去；我热爱七星路、桃源路、民主路、我是所有这些路的女儿，在 8 年的时间中它们看着我从 24 岁到 32 岁，我最饱满的青春岁月与这个城市骨肉相连。

我最爱的是南宁市人民公园，那排低矮的平房是我的世外桃源，此后我再也没有福气居住在一座公园里了。湖水、大树和寂静，是现代都市奢侈的东西，我在这片奢侈中居住了 3 年。我爱它还因为我的父亲就埋葬在这里，我离开以后才听我的叔叔说我的父亲在 61 年病逝后

埋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那个山坡，我想那时候公园一定十分荒凉无人管理。

我与广西的联系是一种骨头的联系，我对广西的记忆也是骨头的记忆。

1996 年 9 月 11 日

### 1999 独白：回望

1999 这组年份数字首先使我想到的就是诺查丹玛斯，这个异国的预言者，早已死去的人。连同这个名字出现的是人类的末日、地球的毁灭。我在黑暗中仰望天空，看到太阳系的九颗行星在未来的时间中已排列成十字的形状。连成了十字的光芒锐利无比，它在未来的时间中飞快地朝向我们，而我们正在不可扼制地迎上去。

那片弥天的火光是否会出现？那轰鸣的巨响是否有人能听见？

在等待命定的 1999 年（到底是哪一种命运我们无法知道，命运远在我们的意志之上）到来的时间中，回望我出生以来的几十年，有什么事情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呢？

有些事情对我的影响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了，它横亘在那里，在这个世纪的中叶，成为压在民族心上的巨大石头。在民族共同的命运中，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在我出生之前的 1957 年发生的事件就这样对我的生命散发着阴影，它的余波延续到 1959 年，在这一年，我的父亲（他当时是县城一个单位的领导）被打成了“右倾”，降职减薪，不到两年他就病故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导致我在未成年的人生阶段承受我力不能及的劳动、饥饿、失学的巨大因素。

凡是注意过我的手的人很容易就会发现这双手经受磨炼的种种痕迹，她（他）们的目光使手的记忆瞬间复活，铁锤在我掌心和虎口的震感顷刻从天而降，与此同时，我的左手紧握一个铁皮圈，拳头大的石块被我固定在圈里，我以纤弱的力气一次次地敲击它们，它们飞起，溅到我的脸上和身上。我常常扭过脸，以便让我的眼睛躲过飞起的碎石。这是用来铺路的石头。紧接着我的手记起了洗化肥袋的经历。县化肥厂将用过的化肥袋回收，雇人清洗后再用。残留的化肥以极其呛人的气味到来，它们在水里和空气中侵向我的皮肤，从手上的褶皱和细

小的裂纹烧灼我的皮肤，烧灼的疼痛从手指尖利地到达心。化肥的气味铺天盖地，使我头昏恶心。以及在暑假的烈日下搅拌水泥浆，像大人一样建造真正的房子。这个经历使我目睹自己的同伴从三层高的楼顶摔下来，她经过脚手架、经过铁、绳子和竹片落到地上。她因五脏破裂而死去。

以及用铁皮车运木头，从工厂运到锯木厂锯成木板再运回来，途中要经过两段险恶的坡路。运载着重物下坡是一个走向深渊呼啸而下的过程，比跳伞、从高处坠落更可怕。斗车和木头，巨大而沉重地顶在身后，完全无法控制。车轮飞快地滚动，越来越快的加速度使车速变得像闪电一般！它们迫使我飞快地奔跑，拼命奔跑，车子就像一头凶猛而健壮的怪兽，如果我跑不过它，就注定会被它压碎。我被巨大的惯性推动着在大下坡上奔跑，这种奔跑完全无法控制，如果迎面开来一辆汽车或拖拉机，我肯定必死无疑。我深知这一点，这种恐惧从出发就笼罩着我。直到现在，那种呼啸而下的感觉还能在记忆中惊魂夺魄地复现，它们瞬间就能抽取我身上的重量，变为多年前悬挂在车把上的轻飘飘的少女。那一

次，木头没有绑在车的中间，重心靠后，下坡的时候车把一下将我整个人扬了起来，我脚尖碰不着地，身体一下悬空，同时我不能松手，不然就会掉在车轮底下，我尖叫着呼啸而下，滑入坡底。这个情景多年来沉淀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恶梦的根源之一。

在这个关于世纪末的独白中，饥饿的记忆不可扼制地来到。我想起了自己 8 岁时在课堂上因饥饿而哭泣的情景，饥饿的烧灼感从胃部蔓延到全身，灼烤着体内的每一个感官和每一寸肌肤。这种烧灼从第二堂课就开始，随即越来越明显，它们以极快的速度滋生与集结，每一个分子一手举着长矛一手举着火把，在我的身体里步步紧逼，它们一次次把我的唾液驱赶到我的喉咙，我一次次把它们咽下去以平息腹中弥天的烧灼。饥饿的怒火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拉锯战中我很快就败下阵来。我全身的冷汗奔涌而出，眼睛再也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也听不见老师的声音了。我全部的感官只提供一个感觉：腹部里有一个越来越烫越滚越大的火球，它正在挤压我全身的水分和力气，它已经烧到了我的心，快要烧到我的脸和头了。这是一个巨大的

www.BOOKOO.com.cn

唯一的感受，遮天蔽日，如果我不逃脱，我将死于这个火球，而这正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同时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没有任何能力熄灭这个凶猛的火球，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但酷刑般难忍的滋味还在继续，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切。后来我绝望地哭了起来。饥饿的感觉跟随我多年，在我成长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感到饥饿，因为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没有早餐可吃。饥饿使所有的上午漫长难熬，在太阳底下站立都会眼前发黑，最后我就这样长大了。

我知道，与大量饿死的人相比，我的饥饿微不足道。

失学这个词如同饥饿，像尖刀插入我未成年的日子里，它们的出现总是使我隐隐疼痛。1967 年不算，那一年老师们北上串连，我们集体失学。对我造成特殊伤害的失学是在 1969 年，我 11 岁，被送回了农村老家，成为了多余的白吃饭的人。在那个四年级开始的学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没有人想到我应该上学。在那段日子里，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队的学校张望，我远远地站在教室的后面，看着那些衣服破旧的孩子在上课，

我的内心充满了艳羡、焦虑、茫然等复杂的感情。

我跟现在“希望工程”所要救助的儿童毫无二致。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听着陌生的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

1996 年，我想一切都应该好起来了，饥饿和失学（就我的女儿而言）都不会再有了，但是在这一年的 4 月，我在单位落聘下岗，生存的压力立即蜂拥而至。当然，我每月还能领到相当于 100 多斤大米的基本生活费，饿是饿不着了，但面对小学中学大学的高收费，我确实不敢说能保证我的女儿受到稍好一些甚至是基本的教育。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可以靠写作养家，但假设我不写任何短文章以保证不间断的收入，而是遵从自己的想法，花三年时间写一部 20 万字的长篇（且不说花五年时间写 30 万字或花 10 年时间写 50 万字），那么在这没有固定收入的三年时间里任何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是难以保证的。

我知道自己太关心个人的生存，我理想中人类社会的进步尺度是每一个个人都能获得良好的生存与发展。我希望在下个世纪的钟声敲响时、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健康而快乐，地球上的每一种植物和动物都没有灭绝的

危险，它们在生物的链条上能够平静地凝望这个新的世纪。

1996 年 9 月 11 日于东四十条



## 语言中的他人

### 语言中的方方

我和方方有一种奇怪的联系，这使我很早就起念写一篇方方印象记，我从未写过这类文章，这个念头和我的能力之间形成的反比使我在几年的时间里心神不定，我设计了几种开头，它们无一能使我满意。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 1995 年，这一年所有女作家的运气都格外好，每个人都出了七八本书，她们不断地拿到自己的新书，又不断地领到自己的稿费，她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这样的机会在 1995 年成堆地出现，各种名目的会议，各个出版社组织的签名售书活动，这个活动刚刚分手，那个活动转眼又碰到了，她们像风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她们美丽或朴素的衣裙在许多城市里像花一样开放。

这个景观有些离题，与方方关系不大，我只是想传达一种与 1995 年的狂欢有关的喜庆气氛，20 年之后，当我们回首 1995 年，我们一定会感到当年的那种喜庆气氛在我们皮肤的皱纹上映照的余光。

在狂欢节般的 1995 年，方方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来了北京四五次，她在第五次敲响我家的房门的时候不失时机地说：我丈夫说北京人怎么还没讨厌你。她到北京总是来开些伟大的会议，什么国际女性文学讨论会、世界妇女大会，或者是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出访，有时则是为了一些比较正常的我们也一起参与的签名售书活动，总之方方的名字和她美丽的照片在 1995 年的报刊上频频出现，这使她原来就很吓人的头衔更加吓人，比如省作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什么的。

因此后来到了昆明签名售书，夜里迟子建在念出“方方家的旧影集上飘满了穿旗袍的女人”这句开头后，郑重地告诫我现在先不要写方方印象记，我明白她的意思，锦上添花的事情总是多少有些嫌疑。这个告诫本来应使我反省自己的写作动机，但她一字不错地念出我的一个开头，我意识到我的方方印象记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开的写作。这个想法转移了我的视线。

“方方家的旧影集里飘满了穿旗袍的女人……”

这是我设计的一种开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迟子建已经熟悉它了，我曾经在河北饭后说过这句话，蒋

子丹说，我以为你要写一篇《回廊之椅》，旧影集里穿旗袍的女人不是朱凉又是谁？

我确实不善于写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与我在同一个空间里平行地活着，真实就像一堵墙，挡住了我的感观，他们怎么也飞升不到我的语词空间，如果方方是朱凉，问题也许就会简单得多，朱凉顷刻间进入那座40年代的红楼，在细雨蒙蒙的天井里，在滴着水的夹竹桃下，我清楚地知道那里充满雨意的空气、回廊上的靠椅、楼梯旁的暗道机关、房间里的薰草气味、审讯和杀猪的声音，而朱凉洗澡的水会一直滴到我的脚面，我感到它的温度的同时听见它碰击我的肌肤的细微声音。

而方方却敲响了我家的门。

她敲开我家的门，我看到她在幽暗的过道里站着，穿着一打烟色的长裙，上身是一件白色真丝绣花上衣。外面套一件镂空麻外套。她的旅行箱我已经十分熟悉，现在它就立在她的脚边。

方方说：我又来了。

她走进来，换上我为她准备的草拖鞋，然后坐到我

家的沙发上。她在我的房间里走动，喝着很浓的茶，说着闲话，然后天就黑了，雨点开始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嗒嗒的声音。

如果我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她就会毫不迟疑地子弹般扑到方方的怀里，然后把她画的画拿给方方看，指点给她看哪是蚂蚁哪是蜻蜓，哪是恐龙哪是怪兽，缠着要她讲故事，疯闹、尖叫、唱歌、在地上爬，完全是人来疯的样子，方方就说：看这孩子多高兴啊。我的女儿是一个生性敏感胆小的孩子，看见生人就会哭，我想方方身上一定有着一种从人类的童年延续下来的极其明朗、明亮像阳光一样纯粹而温暖的东西，质地如此的人与儿童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我想起6月在三峡笔会上张炜曾说我身上阴气太重，如果单独跟我在一起，他会无端感到害怕，若我在许多人中间他则没有这个感觉。张炜认为我应与那些阳气重的人比如方方交朋友，让他们照耀我，驱散我的阴气。

我不知道他看见的阴气是什么。

我从小自闭，不记得自己有过人来病的情况，我想我的女儿也跟我一样。那天我才想到我们身体的深处会

隐藏着同样多的力量，只是没有遇到激活我们的人。

那个激活我们的人在许多年之后来到了，她就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她刚刚下飞机，她目光明亮，毫无倦容。我无法对这样一个人写出我的印象记。

方方家的旧影集飘满了穿旗袍的女人以及穿西服的男人，她的父系是书香人家，母系则是官宦家族，父系家族出了个学者汪辟疆，母系家族的名流则是杨赓笙。有一天方方偶然打开电视机，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铁血共和》，剧中的二号人物杨赓笙正是方方的外曾祖父。杨是江西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尔后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他讨袁、流亡，在南洋办报，1916年蔡锷在云南起义，杨将筹募的经费从缅甸送至云南。

方方家的旧影集里还有一些美丽而练达的女人，她们穿着旧时代的旗袍从发黄的照片中光芒四射地向你凝望，她们中有人曾像王熙凤管理着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有官有职，妻妾成群，四代同堂，充满了喧嚣与繁华。社会的大变故改变了这一切，为了生存，“王熙凤”曾一度居破庙而沿街乞讨，最后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乡下婆子。影集中那些风流倜傥的人物一个个在人生的落差中飘零

四散，那些大起大落由繁华到苍凉的故事让人无限感慨。

这一部“红楼”方方什么时候才写出来呢？

方方是一个散淡的人，她总是不着急写东西。早上她要睡懒觉，据说她的懒觉是遗传的，而她之所以要当作家就是为了睡懒觉，现在她的懒觉已经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而累及了整个上午，她得等到吃完中饭才能真正清醒过来。而她晚上又要看电视，而且尽看武打片。她来到我家，发现我们不看电视，她感到十分奇怪，她嘀咕说：你们怎么不看电视呢？我们一家三口每晚都看。然后她又突然醒悟道：这可以省出多少时间啊！每次我说她懒的时候，她总是振振有辞地说，我平常不写，一写就写得很快。

在方方家的旧影集上最频繁看到的是方方的母亲，那是一个美丽高贵的妇人，她毕业于一所教会学校，高高的额头，大大的眼睛，端庄娴淑，一派大家闺秀的风采。方方说她母亲热情坦荡，风趣开朗，她这方面的性格就得益于她的母亲。这种热情是多么可贵。方方的热心肠遍洒她的朋友，一有好事她总是想着朋友，朋友的事就像是她的事，谁说过一个什么事，她总是牢牢记在

心上，她对那些无权无势亦无名的朋友的一往情深令我无比感动，我总是看到方方在某一日背着一大堆橙子去寻找一家破败的小医院的情景，她骑着自行车找了几个小时硬是把这家医院找着了，她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朋友快要在这里死去了，他想不到方方会找到这里来，他呜咽着眼泪流出来。我无法忘记这件事。

方方从小生活在一个好家庭，这个好家庭给她带来了健康的体魄和心智，健全的性格，优秀的品质，从外形体态到内心质地，我们之间的反差真是太大了，我的忧郁敏感、冷漠多疑、内向寡言与方方恰成反比，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也与她的有天壤之别，我想只有最纯粹最无功利可言的友谊才能兼容这样如此不同的两个人。

方方在我的视野里很早就出现了，她在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之前就是一个获得过《诗刊》奖的诗人，我读过她的诗，然后又读到她的小说，我们虽是校友，而且是上下届，但由于不同系，我并不认识她。

有一年她到南宁来，她和《人民文学》的向前要去宁明看花山壁画，我没去过宁明，便也跟了去。方方当时已是全国知名的青年作家，我充其量只算得上是一名

省级的诗歌新秀，我和方方在花山壁画前合照了一张做雕塑状的照片，那是一个十足小儿科的构思，身体被人为地弄得做作且生硬。1995 年我再次看到这张照片时觉得确实够笑掉大牙的，方方恨恨地说：只有跟林白才会拍这种照片。我想方方在当时也真够随和的，她怎么不个性一点，拒绝摆那做作的姿势呢？

晚上在县招待所住宿，方方一听说我的住宿费单位报销不了时马上大包大揽地说由她报，方方的大方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贯穿在我们的交往中。面对方方对朋友出手大方的优点，我只好告诉她，我是一个小气鬼，她安慰我说：没关系，我的丈夫也是。

也是花山之行我领略了方方的高智商，在县招待所我们看到县文工团的演员在排练，他们跳着一种古怪的舞蹈，方方看了不到一分钟就说这肯定是叫《花山迪斯科》她上去问一名演员，果然正是。此后凡是碰到需要动脑子的事情，我们就全推给方方，比如在南宁街头买香蕉，7 角 8 分 1 斤，称了 4 斤 3 两半，这时我们就推方方心算，并说：谁让你智商最高来着。

后来方方到瑶族山区去，回来后向我出示了两枚土



著的银戒指，说：你一枚，我一枚，看谁最先换戒指。这是我一生中最早获赠的戒指，我十分珍惜，在中指上戴了很久。前段我在抽屉里看到了它，银质的光泽已经黯淡多了，八九年的时间一晃已经过去。

1995 年的 6 月我们在笔会中同游三峡，游船在葱绿秀美的青山下从容穿过，方方站在船尾无人的甲板上吟起辛弃疾的诗句：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如是。夜晚满天繁星，方方的民歌嗓在星空下高八度地回响，这个具有浪漫情怀的女人在那个夜晚光彩熠熠，魅力无穷。

三峡之行方方赠我一对用一种奇怪的石头做的石手镯，那手镯散发出墨绿的颜色，它们隐秘的“叮当”声回响至今。

### 闲看莫言领奖

在颁奖现场一直想采访莫言，但会前会后都没有等到合适的空档。他坐在沙发上，灯光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上，话筒在他的跟前晃来晃去，还有人凑近他的左侧或右侧，递给他名片或本子。

他的周围有一种热闹而动荡的气氛。他坐在沙发上，朴素而沉默。他即使开口说话，你还是觉得他是沉默的，你觉得沉默正是他的特质之一。我很难想象一个在公众场合滔滔不绝侃侃特侃的人能写出《红高粱》那样的瑰丽之作，很难想象一个饶舌的莫言。

这是人民大会堂的云南厅。“大家·红河文学奖”在这里颁奖。莫言酝酿 10 年写成的 50 万字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获得了高额的 10 万元奖金。这是一个吸引了各方人士的盛会，我听见有人说：“嗨，今天来得够齐的！”浏览一遍，果然看到了几乎所有在京的青年作家、评论家以及不少中老年作家、评论家，当然也有各文学单位的人士。

我闲坐一旁，看莫言领奖。

他从王光英副委员长手里接过奖杯和奖金，从一位姑娘手中接过一大束黄色的百合花。美丽的花朵映照着他林素的脸。这一鲜明的图案使他那些瑰丽而深厚的文字在我的眼前瞬间复活。

莫言说：我狂妄地想在这部书里艺术地勾勒出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的百年历史；我真诚地想在这部书里歌

颂母亲，歌颂人民，歌颂大地；我渴望着在这部书里与植物对话，与动物交谈；当然我也激烈地想在这部书里批判光荣的高密东北乡背后的落后与愚昧，但终因才力所限，我的艺术野心并没有完全实现。

以徐怀中、谢冕、汪曾棋、王干、李锐、苏童、刘震云等老中青三代评委组成的评委会认为这是一部内涵丰厚的作品，莫言以一贯的执著和激情叙述了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具有深邃的历史纵深感。文风时出规范，情感诚挚严肃，是一部风格鲜明的优秀之作。

莫言告诉大家，他这笔奖金将用于救助家乡的两名孤女和几位家无存粮的老人，以及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条件。

“我还将用这笔奖金，热情地款待今天在座和不在座的文学朋友们，我已经为你们定好了朴素而简洁的食谱：炸酱面和烤地瓜。”莫言说。

## 时间的刻痕

元旦那天我去拜望艾青老人。

这位终身热爱土地和人民的诗人已经 86 岁了。他自去年 6 月份出院回到了家里已有半年。

艾青穿着厚厚的灰色中式棉袄坐在客厅里，他的头发有点长，这使他看上去跟照片和电视上的艾青多少有些不一样。他行动不便，听力不好，已经完全是一个进入暮年的老人了。夫人高瑛用手拨开垂在他耳边的头发，把头靠近他的耳朵大声说：今天 是 1996 年 1 月 1 日，是元旦，你又长了一岁，你今年 86 岁了！

他点点头，脸上有些欣喜之色，有一种返朴归真的孩童般的神态。高瑛夫人把我送给他们的书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他抚摸着看清了上面的字，并大声而清楚地念了出来。

我在离他两三米远的对面坐下来，安静地看着他。我知道一般是无法与他交谈了。

我的右后侧是那尊著名的艾青塑像，出自女雕塑家张德蒂之手，我曾多次在印刷物上看到过。现在它就在这个客厅里，客厅的另一头坐着艾青本人，两个智慧而宽阔的额头在闪着同样饱满的光泽。我和艾青隔着两三米远的距离，我明白自己将怎样也越不过去了，我们之

间隔着的是几十年汹涌的时间，我安静地望着老人，时间无声地坍塌和耸起，形成着无形的深渊与高峰，我想起多年前看到的艾青夫妇在新疆石河子的照片，他们年青的面容使我心情感慨。

我只坐了一会就告辞了。

时间隐身在新年的钟声中，一遍又一遍地敲响，时间的刻痕纵然爬上诗人的额头，但永远无法爬上诗的额头。诗歌年轻的步伐永远走过无边的岁月和土地。

## 回忆父亲

关于父亲的记忆常常是一些旋转、闪烁、飘忽不足、难以确定的事物，它们总是变形，枝节横生，使我似曾相识却又迷惑不已。

我常常在睡眠中回忆往事，它是我的记忆的必经之路。是前奏，经由睡眠，荡涤了眼前的一切杂色，它分离我们使我们全身放松。然后我醒来，脑子里一马平川，记忆吹着嘹亮的军号，骑着白色的骏马向我走来，这时它清晰、生动、完整。最后它们抵达我的身边，环绕在我的周围，使我置身其中。

青褐色的龙眼果就是这样悬挂在我午睡过后的时间里。它饱满圆润，有一种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青涩感，我在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十分吃惊。它不同于我少年时代在北流、后来在南宁、以及现在在西单购物中心千载难逢地看到的正常的龙眼，它明显地不同于它们，有一只鹌鹑蛋那么大，这是龙眼中罕见的品种，叫广眼。我舅舅曾经在一个薄雾的早晨从乡下挑了担广眼到北流，我是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看见广眼，当时我的牙齿刚刚长齐，对一切可吃的东西有浓厚的兴趣，广眼使我兴奋异常，我迅速抓起一只就往嘴里放，这时候床上有一个躺着的人扑到我面前一巴掌打掉了我的龙眼，这个人身材高大怒气冲冲，挡掉了所有清晨的亮光，他不顾我高声嚎叫，用他坚硬的巴掌使劲打我的屁股。那种辣痛的感觉从此留在我最早的记忆中。

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逝去多年，他在 30 多年前身患绝症。死在异乡，没有人能确切说出他究竟埋在何处。据说父亲在南宁火化后就地埋在南宁市人民公园内，这恰恰是多年以后命运安排我住了四年的地方，我的单位就在这个公园里。单位分给我的宿舍

就是公园深处隐没在草中的平房。那是漫长而孤独的岁月，在漫长夏季的黄昏，或者冬日的午后，我常常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游荡。在没有开发的荒芜的湖边和人迹罕至的后山，在太阳落山之前的时间里，我常常徘徊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书。在 80 年代初，手里拿着一本书使每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在校园或公共汽车站，在列车上或马路旁，甚至公共厕所和饭馆的餐桌，或者另一些需要排队等候的地方，书籍在那个时代货真价实地凝聚着那些美好的字眼：希望、信心、理想等等。它如同水珠，使许多事物湿润而清新，呈现出生长的姿势，彩虹从这些雾蒙蒙的水珠中经过，到达许多人的心里。时隔 10 年，这一切像雾一样消退了。

在 10 多年前的南宁人民公园里，我手里拿着书（我觉得那是一本英文缩写本《简·爱》，我已经有 10 多年没看这类书了，漂浮在书页中最前面的英文单词已经消散殆尽），走遍了公园所有荒僻的地方，亚热带的植物繁茂无比，在夏天铺天盖地，各种花朵的气味、植物的气味像浓雾一样隐隐浮动。我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埋着我的父亲，10 多年后这个消息使我久久震惊，那时我已

远离南宁，后来我再也没有回到那个我曾经住过的公园。在哪一棵树的下面？被哪一片草所覆盖？那树和草是否因为了他的骨灰质地异常？有时候这些问题会侵扰我的神思，在我睡眠过后的空旷之处，它们如同一些黑色的箭，嗖嗖掠过我的眼前。关于底下埋藏了死人或动物的树在我幼年时就一再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现在想来我怀疑那是一种特殊的机缘，一种昭示。

在南宁公园 10 年前未开发的空地上，我是否在繁茂的草木中感到过血缘神秘的亲和力？因为没有墓碑的确指，任何一棵树和一株草都有可能隐藏着我的父亲。这个可能性使我对南宁的记忆遍布着无边无际的繁茂植物，在这些遥远的浓密草木中，我父亲的面容模糊地浮动。

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确切的面容。我对他比较明确的认识是在 10 岁以前母亲的抽屉里，一本紫红布封皮的影集上看到的那些照片。在黑色的衬底上，父母的青春面容清白姣好，像贮藏完好的新鲜水果，封存着以往完整而年轻的岁月。我喜欢在他们各自与同伴的合影中找到他们，那个高大而英俊的人，那个挺拔而亮丽的人，



他们在人群中是多么醒目，母亲扎着长辫子，系着蝴蝶结，她的照片一直保存至今，父亲的照片在我 10 岁的那年消失了。10 岁是我生命中的一道界线，在这一年，父亲的痕迹迅速消失，因为继父出现了。

最早的预兆就是抽屉里的紫红布面相集不见了，熟悉的东西突然消失总是使我感到不安。我每天打开母亲的抽屉，指望能重新看到失踪的影集。后来有一天它又回来了，我打开它，看到那上面是一些失去了照片的银白色相角，它们在黑色的衬纸上孤零零地漂浮着。我怀着忧伤翻动这本影集，所有与父亲有关的照片全都消失了，有时连着几面都是空白，只有母亲的照片还留在那上面，做失去了河水的鹅卵石那样光秃而孤独，有一种触目惊心的荒凉感。

从前那本影集就永远消失了。再次出现的影集没有了父亲，它不再是从前的那一本，它的残缺犹如一个失明的人和一副喑哑的嗓子。

我 3 岁前对父亲面容的记忆丝毫没有留存下来。小时候有时有人会问我，你记得你爸爸长得什么样吗？这样的提问使我拼命回想，有时我闭上眼睛，感到自己的

记忆在一步步往前走，它飘着身体越过一道道似是而非的门，门无声地打开，我的记忆畅通无阻地向前游走，它没有遇见我要寻找的东西，那种空落的行走使我的记忆失去了标记与参照（它不像在空间中的行走最起码会感觉到空气的摩擦）。行走换转为一种悬浮，仅仅是一种悬浮，它再也分不出哪里有方向，哪里没有，它找不到任何依傍和凭藉，上下左右八方不靠，四面都是空茫。有时候在黑暗中会出现一个模糊的高大的身影，但我从未看清他的脸。我不知道我 3 岁以前没有看清他的脸是否因为他的身体过于高大而又没有经常把我放在他的膝上。

所有关于他的面容的印象便只是来自那些我 10 岁那年就消失了的照片，这中间 10 年的时间汹涌而过，我成长过程经历的事情像粗细不一的沙子与石砾，磨蚀了那些清晰的线条。

现在我手头的两张照片是去年我回北流的时候向母亲要的，她说这是仅存的两张。我不知道她怎么会保存了这样两张照片而把其余的那些散失了。一张是他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合影，全身照，大家微笑地站立

在一所公家房子的门口。门楣上贴着“庆祝元旦”。男同志一律穿白衬衣和西装裤，上衣束在裤腰里，年轻的女同志穿着浅花连衣裙，令我想起已经陈旧的“布拉吉”的名词和前苏联的电影。母亲指给我看，他的确就是最高大的那一个，但他脸上的那小块相纸剥落了，整张照片除此之外都没有损坏，唯一看不清的恰恰正是在他的脸上，所有的人的脸都很清楚，他的身体也很清楚，但就是看不清他的脸。另一张是他单独站立在田野的风景照，他在远景上，人只有两根牙签那么大，身前身后星一大片水稻，侧旁有一所高大的白墙黑瓦的房子，他叉着一只手，意气风发的样子，但我无法在两根牙签那么大的地方看清一个人的脸。

我总是无法看清他，去年在北流，老家人曾商量是否到南宁人民公园捧一捧土代替他的骨灰，在家乡择一块风水好的地方立个位。当时我对此无动于衷，我怀疑他们说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从不在场，我从未看清他，从未有过这是一个亲人的感觉。

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亏空。我知道一个人有父亲和没有父亲是完全不同的。

## 我与王小波

登有王小波照片以及他的《时代三部曲》封面的报纸在我的桌上放了好几天。

我与王小波互相并不认识，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但我总是觉得，这是一个与我有着某种关系的人，总有一天，我们能在一个什么场合碰到。

但我一直没有碰到他，直到听到他离世的消息。

最早读到的王小波的作品是发在《花城》上的中篇《革命时期的爱情》，那种新鲜的叙事方式，那种真正的智者才有的放松，那份才华横溢的挥洒自如，使我十分地喜欢。随后又读到他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专栏随笔“晚生闲谈”，每一篇都新鲜有趣，用诙谐的语言说出了最朴素的真话。我甚至觉得，没有了王小波的三联生活周刊很难是完美的了，没有王小波文章的三联生活周刊总是有一两分不像。

有一天，我在《中华读书报》的“书评广场”版上看到王小波的一篇文章《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一开头就看到了我的名字，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紧张地读

下去，明白了这是一篇替我说话的文章，这使我深为感动。1995 年底，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我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是“准黄色”，是“坏书”，并称肯定此书的北大教授是“助纣为虐”，这类毫不负责、谩骂式的批评本来也同以不予理睬一笑置之，但它造成的恶果却使我越来越难以轻松起来。素不相识的王小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为我辩护，使我感到这个世界除了辱骂和中伤，也仍有良知的声音，是一个值得好好生活下去和写作下去的世界。

王小波不是一个在文坛中走动的人，我所参加的聚会与活动也极有限，所以几年一直无缘遇到本来也是十分正常的事，猛然听到他的死讯我才明白，从此永远不会看到王小波了。

王小波的告别仪式我未能参加。他的作品讨论会在京举行，我当时在外地也没能赶上，这都使我耿耿于怀。王小波的好友艾晓明女士告诉我，有王小波的纪念文集将要编辑，我若有话说可以写成文章收入，所以谨以这篇朴素的文字，表达我对王小波的纪念。

1997 年 5 月 20 日

## 李洪波老师

认识李洪波老师的时候，我 11 岁，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是我的老师，教算术。在小学里，四五年级就是高年级了，教高年级的自然都是业务骨干。洪波老师显然教得很出色，他的教学进度总是比其他各班快。记得有一个学期竟比别班快了许多，他教完那册教材后又跟我们复习了一遍，期考的日子还远未到来，我们都有些不耐烦了，学校便允许他在他的课时里给我们讲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常识。他边说边在黑板上画，搞得全班都很兴奋，一时间满是“白光”、“冲击波”等新名词。

洪波老师又能画画，若是图画老师生病或请假，便由他替上，他就拿了彩色粉笔到课堂来。大家惊呼：换算术课了？！李老师微笑着说：图画课。李老师这一笑一答，使我们感到心领神会的亲切，大家便都安静地准备好铅笔和蜡笔。抬头看时，黑板上已经出现了好看的图画：房屋，树林和太阳。李老师唰唰几下上了颜色，房屋和树林顿时都有了生气，亮晶晶地在我们面前晃动着。

洪波老师有很好的嗓子，能唱很好听的歌。记得当

时上映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里面有一首主题歌十分好听，但我们都不会唱。有一天清晨上学，听见走廊里有人在唱“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不管风吹雨打乌云满天，我们歌唱我们战斗……”是李老师十分好听的男声，浑厚悦耳，我们几个女生站着听了好一会。

多才多艺的李洪波老师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担任了校文艺宣传队的文艺老师。当时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排的节目除了样板戏之外，还有李洪波老师编的小戏。剧本发下来，第一行总是：地点：桂南某山区。记忆中李老师还会吹拉弹唱敲木鱼，若是乐队缺了人，他可以临时补上。

小时候就知道李老师是个无所不能的人，却偏偏不知道他会写诗、写小说。直到80年代末，当时我正在电影制片厂当编辑。有一次回家乡探亲，县里正开文代会，便也应邀参加。在会上我十分吃惊地看到自小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的李洪波老师，这才知道，洪波老师19岁就在《羊城晚报》发表作品了，多年来他一直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诗歌、小说和散文，成绩斐然。

看上去李老师还是那样年轻，文人气十足，好像十几年的光阴一点都没有流过去。

之后就不断听到洪波老师的消息：调到县文联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了，出版第一本诗集了，等等。后来我到了北京，在一家报纸当副刊编辑，洪波老师给我寄来他的作品，我这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诗作，我吃惊地发现，他的诗并不像一个教了20多年算术的人写出的，充满了才气和灵性，饱含了对生活的感情。语言轻盈，有一种静态的美，虽平白如话，却又处处都翕动着诗歌的翅膀。

不久前我因继父病危，回乡探望，看到家乡的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呈铺天盖地之势，省会、地区、县等各级的旧日文友绝大多数已弃文经商下了海，运气好的甚至买了小轿车了。文坛一时有凋零之感，但见洪波老师仍一如往日，依然平静、从容、孜孜不倦地沉浸在文学创作的境界中，交谈起来，也并不眼红人家发了财。觉得十分难能可贵。

洪波老师的第二本诗集《泥捏的恋人》将由国家级的民族出版社出版，嘱我作序，我作为后生晚辈，难以



担此重任，因盛情难拂，只以一名学生和读者的身份，写下一些对洪波老师的印象，就像旧时戏开演之前的摇铃者，摇过了铃，便请观众看那精美的戏了。

## 写作

### 记忆与个人化写作

在我的写作中，记忆的碎片总是像雨后的云一样弥漫，它们聚集、分离、重复、层叠，像水一样流动，又像泡沫一样消失，使我的作品缺乏严密的结构和公认的秩序。我以前从未思考过记忆与我的写作之间的关系，我被包裹在语言的气流之中飞升和下坠，感受到某种快乐。

我领会到记忆其实有着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个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尾，另一类则是往事的某一个瞬间所携带的气味、颜色、空气的流动与声音的掠过。前一类记忆已经通过普遍的叙事进入了新闻报道、公众的传播以及某些以记载事件的过程为己任的小说中，它们是这个时代声势浩大的话语，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叙事，就像我们这个星球的岩石和泥土一样众多，一

样天经地义。报纸电视使我们很容易被这种集体叙述所充塞，这种集体记忆的标准化和概括性使每个人的

记忆都变成同样的记忆。

在这种普遍的记忆中，我们丧失着自己的记忆，同时也丧失着自己。一件事情经过了条理化、秩序化、概念化的固定，呈现出真正的单一、枯萎和平面。这种记忆是沙漠，个人的经验与个人的记忆像水一样流失在沙漠中。它们又像一根绳子，将一个事物的根络、叶茎、枝杈、果核单个地提出来并且想当然地串连在一起，这种方式是残忍和丑陋的，它无视事物的水分，也无视个人的记忆。

这种集体的记忆常常使我窒息，我希望将自己分离出来，将某种我自己感觉到的气味、某滴落在我手背的水滴、某一片刺疼我眼睛的亮光从集体的眼光中分离出来，回到我个人的生活之中。只有当我找回了个人的记忆，才可能辨认出往昔的体验，它们确实曾经那样紧地紧贴着我的皮肤。

我所指的个人记忆不是一种还原性的记忆的真实，而是一种姿势，是一种以个人记忆为材料所获得的想象力。现时段的、当下的事物总是使人缺乏想象的空间，一目了然，直来直去，因而无法达到审美。只有眺望记

忆的深处，才能看到弹性、柔软以及缝隙。

个人记忆也是一种个人想象。

在我的写作中，回望是一个基本的姿势，这使我以及我所凝望的事物都置身于一片广大的时间之中。时间使我感怀、咏唱、心里隐隐作痛。在较长的时间长度中一切事物可远可近，我可以从容看遍它们的各个角度并一一写出。我的回望有三种情况：看一件在时间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看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它只在我的想象中发生，但我却觉得我看到了它，在凝望中感同身受；把自己置身于未来的时间中回望现在，这是一种使我能迅速找到表达感觉的最好方式。对现在现时态的书写往往具有一种日记性，或者叫作日记的姿势，当然日记也有种种不同，流水帐与心灵的深入总是有着天壤之别，但是日记天然地缺乏时间的弹性。

如果我要写现在，我常常喜欢把自己放在未来的时间中，眼前的一切变成过去，它们与我之间的时间距离犹如某种神奇的光，使一切焕发光彩。不光是写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常常有这种感觉，在一个普通的场合或者日常生活中，一下往前跨越许多时间，觉得眼前已经

是消逝了的生活，里面的人也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或完全改变了，这使我产生一种目睹华丽的时光凋零的感受。浓缩起来的时间容易使我们看到它的凋零与衰老。凋零的时光总是华丽的，在凋零之中它的光影带有永逝不返的意味，它转动中呈现的每一个点都附带上了无与伦比的美。而平常的时光就在眼前，它们平白、单一、缺乏幽深感。

我对现实缺乏应有的感受力，因而也缺乏判断力。面对现实我经常头脑一片空白，所以它对我总是缺乏美感，即使最美好的时刻也还会有缺陷，那些缺陷一次次地使我感到美只存在于包含着想象力的记忆中。

现在的一切都将被写出，但那必须在多年以后，或者假设在多年以后。“多年以后”这个词组将所有的事物都投入到巨大的时间之中，它们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对我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

特性。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教事的覆盖（这二者有时候是重叠的），这二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和淹没。淹没中的人丧失着主体，残缺的局限处处可见。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

（注：这是作者 1996 年 7 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沟通：面问世界的中国文学”会议上的发言稿。）

### 置身于语言之中

语言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它能够创造无数的现实，一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经由语言诞生，语言赋予它高大或细小的身躯，它的细微的茸毛在语言的枝杈上挺立，既然它以如此清晰可感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呢？

而那些一次次发生的事情，它们如果没有语言的勾勒和凸现，它们就将坠入虚无的万丈深渊，我们站在悬

崖上往深处扔一块石子，如果一直听不到回声，我们很可能搞不清楚是否有这块石子和它是否已被扔下去。

语言有时是现实的回音，有时不是。

语言在生活与生活之外穿行，穿越生活又悬挂在生活的表面，它被语言的操作者赋于各种各样的形体，在这里，上帝不是读者，而是作者。作者创造一个艺术品，一个另外

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语言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它绝对是独立的，它独立得有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体态，它们之间不同的组合和置放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其中那些优秀的生命睁着它们美丽的眼睛向我们凝望，与它们相遇是我们在人世的福分。

我喜欢一切美丽的事物，我喜欢那样的语言，它们朴素、诗性、灵动、深情，它们以一种无法阻挡的脚步进入我的内心并在那里久久回响。同时我也喜欢语言的绚丽、繁复、热烈，它们火一样的闪动正如它们水一样的流淌。

我喜欢语言中的力度和柔情，语言中的过去与现在，

语言中的此地与彼地，语言中的青春与暮年，语言中的女人与男人。当然，我最喜欢的就是语言中的自己。

在家园逐渐丧失的时代，语言就是我们的家园，语言在我偏爱的作品中芳香四溢，它们此刻化身为我最偏爱的中篇《回廊之椅》，它们化为了一个外乡人的故事以及革命的话题、主仆两个女人的友谊、神秘的回廊、茶杯和薰草的气味，它们隐藏在一座细雨蒙蒙的红楼中，悬浮在现实生活之上。我既可置身其外安静地凝望，又可置身其中与世隔绝。

它所包含的寂静与诗性比较符合我的心情。



## 空中的碎片

### 精神病患者

关于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我已经写过几篇文章，但我觉得一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说出来。

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不久前我的一位至亲得了精神分裂症，在我跟医生讲述病历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在我的家族中，与我有着血缘关系的同辈里有三位曾经得过精神病，程度甚深，都住过院。医生说精神病有 85%是有家族病史的，是有某种素质，遇到诱因就会发出来。我想我一定是有着这种致病的素质的。

那是一种神经质的东西，它常年累月宠罩我的脸庞。

我在经历了许许多多让人想不开的事情之后为什么没有发疯？现在我已经找到答案了。那是因为我写作。我把内心黑暗的东西写出来，放在阳光下，让空气从中间穿过，疯狂的气息就逃遁了。

我从 19 岁开始写作。15 岁起记日记直到现在。它们

是我生命的需要。

## 童年记忆

它们沉淀在我生命的早期，成为我这个人、我全部作品的底色。我常常想逃脱它们，写些别的东西。我到最后还是发现它们像血液的一种类型，是终生不变的。

我想不会有人有与我大致相同的童年印象，有谁在童年期要每天从太平间经过呢？有谁家的阁楼堆满了男女生殖器模型呢？

我小时候住在医院宿舍，太平间是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它是我打饭的必经之地，同时它又在我们厕所的后面，每当夜晚上厕所，昏暗的灯光、福尔马林消毒水的气味连同太平间阴森森的气息不动声色地从另一个世界徐徐步来，它们越来越重，压在我的身后，从我的下体开口处直抵内脏。而在另一个时期，我家的阁楼上堆放着许多肉色的人体生殖器模型，我的母亲用它们作计划生育的宣传。那是些塑料或石膏做的剖面模型，露出红的血管、白的骨骼和肉色的肌肉，我常常在孤独的下午面对它们，既好奇又感到恐怖，在我更小的时候，大

概六、七岁，我曾亲眼看见一只小白山羊在防疫站的办公室的桌子上被抽血致死，山羊被捆在桌子上，血越抽越多，山羊开始吐白沫，尿屎流了一地，最后血尽而死。我很早的时候就目睹了这些恐怖的事情，它们像乌云一样堆积在我生命的早期。

### 隐秘事件

那是我头顶的另一重乌云。

我极力要把这件事忘掉，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总不去想这件事，结果是：我真的把这件事忘掉了。

但我不知道它还潜伏在我的潜意识里，像一个毒瘤被一层粘膜所包裹，我不知道日后有一天，我的精神成长起来，足够正视自己生命中任何可怕的事件，我会把它写出来，公诸于世。

这一天就来到了。

心中的石头松散成细小的颗粒，随风飘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雨中湿润而芬芳。这是我最美好的节日，生命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张开和呼吸。

我把它写成了一个长篇。在一篇序文和一篇自传里

也郑重地提到了这个隐秘的事件。它现在不再威胁我了。

这个事件是一个抄袭的事件。

## 飞翔

吸大麻者把进入迷幻状态叫做“飞”。我有一个亲密好友有一次跟我说：什么时候我们一起飞一把。然后我们四目相对，眼睛晶亮。我以为，这是我们友谊的最高境界。

有许多飞翔的形式。

做梦、违反道德、艺术创造，等等。

写作也是一种飞翔。高悬在空中，身体轻盈，不经意间就长出了翅膀，那是我们的梦想之物，我们身体的质量顿时就改变了，我们的眼睛看得最远，我们的耳朵分辨出无数种细微的声音。我们微微感到空气的阻力，那同时是一种使我们浮升的力量，我们飞翔的时候最明确地感到了它，就像我们游泳时水的阻力，我们在空中划动，我们的快感来自空气。

## 理想

我常常幻想能写这样的小说：它既是音乐又是绘画又是电影又是戏剧，也是诗歌也是散文也是新闻也是文献，当然更是独白、梦幻、想象、私语，像一个大花园，有各种颜色和气味的花。它应该让我们自己觉得好看，最好能深刻，不深刻也行，但一定要饱含生命的液汁，它要一层一层地进入事物的最深处。

当然这样的小说是没有的，以后也不会有。

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自由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写，不管写出来什么，我们就对自己说：这是小说的一种。

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获得自由的。而自由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字眼！

## 选择的过程与追忆

### ——关于《致命的飞翔》

#### 偏爱

我一直认为，在我这几年的中篇作品中，我最偏爱的是《回廊之椅》，关于外乡人的故事以及革命的话题、主仆两个女人的友谊、神秘的回廊、茶杯和熏草的气味，它们隐藏在一座细雨蒙蒙的红楼中，悬浮在现实生活之上。我跟它的关系亦十分奇怪，既可置身其外安静地凝望，又能置身其中与世隔绝，有一种很好很安静的体验。

它所包含的寂静与诗性比较符合我的心情，它来自我的内心。我朋友中的诗人或喜欢诗的人印证了我的想法，他们认为它比《瓶中之水》好得多，奇怪的是小说编辑和小说家朋友却认为后者更好。

#### 追问

《致命的飞翔》（下称《飞翔》）是我最新的中篇，在它之后我写作长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我一直没有写新的中篇。我选中它交给《世纪名家品荐精品大系·小说卷》，除了响应稿约中“新作为佳”的要求外，还有什

么重要的原因吗？

我问自己，《飞翔》是不是一部最接近我的心情的作品呢？

是不是一部最诚恳的作品呢？

是不是一部最符合我的理想的作品呢？

是不是一部最像我这个人的作品呢？

好像都不是。

我想也许是它的质地以及写作状态的反常使它可能与我往常的作品有所区别。

状态

我在写完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之后紧接着给《作家》写了中篇《青苔与火车的叙事》等四篇文章，我本来想休息一段，起码半年不写东西，但我发现我还是很想写，写作的冲动强健而有力，要写的东西已在空气中密布，我看不见它们，对自己将要写作的内容十分模糊，我只知道那里将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与众不同。我拼命想要知道她的名字。

北诺这个名字就在我写作之前的恍惚中再度出现了，她一直在我的眼前，我无法换掉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已经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出现过了，但她没有得到发展，下落不明，接着我知道使我产生写作冲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了，就是北诺。

我找出一本小信笺，就在饭桌上写了起来：“北诺曾经在我的青春期中一闪而过，如同某种奇怪的闪电，……”，下笔时我对北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一无所知，但我感到，只要我写出来，这些聚集在空气中的事物就会一一现形。写作，正是追寻北诺的唯一途径。

这部小说的前三分之一是在饭桌上写作的，三分之一后我就搬到了电脑上，写完这部小说电脑就坏了，那是一台转了好几手的PC机，我开机时出现了一行字“盘介质坏”，后来多次开机都不行，结果我以400元廉价处理了。

在饭桌上写作的经历我从未有过，在农村插队时曾坐在矮凳上趴在床上写，我从未觉得饭桌是离灵感最远的地方。《飞翔》的气味与我的日常生活完全两样，但它就那样堆积在我的饭桌上，这样的文字堆积在饭桌上始



终让我奇怪，这种情况后来就再没有出现过了。我习惯在卧室里写作，窗帘低垂，房门紧闭，我写作的时候无法容忍室内有人，但《飞翔》是个例外。我在饭桌写作的时候我的丈夫、女儿、小姐姐都在场，他们有时走来走去，但我常常觉得他们跟我不在同一个空间，我看见他们走来走去，就像是电视里的人一样，我摸不着他们。

房间里在放着台湾电视剧《家有仙妻》，小姐姐在看。我思路中断的时候会听见电视的声音。

## 质地

现在我重读《飞翔》，我觉得它的质地跟我其他作品不太一样，比如《回廊之椅》，我觉得它清彻而轻盈，即使关于革命扣杀猪、审讯和枪杀，也在雨意的柳红色的河滩中有一种欲飞的语感，我在凝视它们的时候感到了那种飘泞、这比较待合我一问的审美趣味。但《B 翔 H 却浓密和稠，我小知道怎么就成了这样，它不是我刻意的造就，也令是随意的到达，也许是因为北校与李高，这两个女入的质地决定厂 a 飞翔 H 的质地浓密与粘稠是由卜她们的热烈、繁复、绚丽造成的、她们的 D4 喊和血液沉淀在文 7 巾，使这部小说脱离了我惯常的轨道。

所以我有时觉得这部小说的节奏不好，它是否太紧  
I? 而对这样一部小说而言，节奏是否十分重要呢？

## 写法

在写法上想一握的是，我把这两个互不认识的女八  
（北论与李高）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的世体验合在一起  
同时写，复数第一人称“我们”则穿插其中，“我们体内的  
液汁使我们的身体闪闪发亮”，“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  
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

这在感觉上很舒服，有一种繁复而浓烈的气氛。也  
许在我的作品中说得上是一种绚丽。

## 性描写

在事实中真正的性的接触并不能使我兴奋和燃烧，  
但我对关于它的描写有一种奇怪的热情，我一直想让性  
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  
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  
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性的快感。

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想《飞翔》中的性描写全都跟内核有关，它必须那样展开。

## 标题

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写作是一种飞翔，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是一种飞翔，吸大麻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它们全都是一些黑暗的通道，黑而幽深，我们侧身进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另一边。

## 语言与声音

帕斯捷尔纳克年轻时学习音乐，并且准备终身以此为事业，但是他认为自己缺少“绝对听觉”，也就是辨别随意取来的音的准确高度的能力，这件事扰乱了他，使他心神不宁。他明白这一缺陷与总的乐感丝毫无关，他并且知道，一些伟大的音乐家，如瓦格纳和柴可夫斯基就可能没有绝对听觉，但他后来放弃了音乐。这也成为了原因之一，他在回忆录《人与事》中谈到，“我崇拜音乐，这样它就成为我的一个毁灭点，集中了我身上最迷

信、最无我的东西。因此，每当某一个夜晚我的灵感得到鼓舞，我的意志翩翩起舞过后，我便会在翌晨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上面提到的那个缺陷，而急于给我的翱翔中的意志泼一瓢冷水。”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在这段话上停留了好一会，我觉得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追求绝对完美的艺术家，他对绝对听觉这样一个虽然耸人听闻但事实上却不见得就那么重要的因素却如此重视，甚至成为一个“毁灭点”。面对大师，我对自己的马虎感到了真正的惭愧。

由此我还想到了有对音乐的绝对听觉，就有对一种颜色的绝对视觉。即把一种颜色从它隶属的事物（如花朵或衣服）中单独抽取出来，迅速作出辨认和判断的能力。这是把颜色进行搭配的基础。如时装设计师根据他们对面料的色彩（当然还有亮度、柔度、硬度等等因素，但色彩是最抢人眼目的）的把握，考虑如何搭配使人产生幻觉，如何排列能创造古代情思。这是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后者获得了足够多的重视，而局部的、细微的感觉常常被忽略，被认为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在我的写作中，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让局部的光彩从整体中浮现出来，把整体淹没，最好有无数珍珠错落地升上海面，把大海照亮。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也没有把自己的文字比作珍珠的意思。就算是一根草吧，无数的草生长出来，也会有一片美丽的草地。

声音和颜色使我想到了语词，对语词的辨认力即是“绝对听觉”，我感到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词，它表朗了对语词的天然的敏感，天生的辨认力，意味着语词在感觉层的反应。语词的触碰就像雨滴落到皮肤上，有着速度的缓急、分量的轻重、温度的冷暖等等细微的不同。有时一个词会十分锐利，一直刺到心里，在那里疼痛，而另一个词又像棉花一样柔软，令人感到皮肤的舒服。

如果我要知难而退，我就会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语词的“绝对听觉”，所有的词来自传统和文化，但它们最终是要来自生命，从生命的深处涌流出来，表达生命本身。

写作就是用自己的语词来寻找现实，对于我来说，现实广大无边混沌一片，置身于现实之中我总感到茫然和失重。就让我找到一个词，就像找到一根丝，然后像

抽丝一样把别的词抽取出来，再用它们构成一个我所能把握的现实。这个新的现实像房子一样把我保护着；或者像飞毯，瞬间把我带离物质的现实。

这是多么的好！

让我猜想我就是语词隐密的女儿，在很久很久的前就与语词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合力，语词像云一样在我的头顶悬浮着，它们准确地掉落在我的面前，落到我的纸上。在许多日子里，我喜欢这样一个有关语词的神话。

1996年5月19日

### 室内的镜子

在窗帘低垂的室内，空无一人。长而窄的穿衣镜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映照出幽暗的影子，一个女人对镜独坐，她的身上散发出含混不清的气息，树叶般的手指在她的眼前依次变幻着各种颜色。往事如飘零的花瓣，越过层层叠叠的黑暗，无声地潜入，它们鱼贯而来，汹涌而来，点点滴滴而来，铺天盖地而来，触碰着你柔软的皮肤，灼热而冰凉。或者有一个幻想，从幽暗的镜子中

隐隐浮现，某种神秘的虹光，从你的前世散发出来。你凝望这奇异的幻象，眼里饱含了莫名的泪水。或者沉沉睡去，在空无一人的室内，然后轻盈地出现在梦中，在那里你经历惊心动魄死而复生，最后你以一声惊恐的尖叫返回现实。你的叫声在室内回荡缭绕，你发现，它是多么高亢和嘹亮。

就是这面室内的镜子，它让我看到子弹飞出，穿透苹果，穿透时的速度和碎片，以及花瓣和星星和光影。它们全部像闪电般短促和明亮。无论完整还是破碎，你的美无与伦比。

一个自己的故事，或一个自己的幻想，或一个自己的梦，这是多么的好！回忆如花瓣，幻想如闪电，梦境如车轮。

### 唯美倾向及随想

我的创作是否有唯美倾向？这是一个我不太搞得清楚的问题。

我有时会本能地、情不自禁地美化经过我笔端的一切事物，但我的美化并不是把什么东西都写得很美，而

是要使它们接近我的诗性叙述的愿望。这个隐约的原则是什么呢？好像是要使事物或过程携带上激情、力度，或者使它们脱离日常生活的状态从而变得熠熠光辉，使平凡的事物变得不平凡，使不平凡的事物变得更加具有震撼力。只有这样，我才会感到心安理得。

在对绘画的欣赏中，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些包含了对称、和谐、柔美、优雅、温暖、舒适等等公认的美的要素的画面，我会无端认为它们平庸，无法使我兴奋和激动。但我照样不喜欢那些过分夸张、恐怖、恶梦似的画，比如达利，他的画使我震撼，但同时使我头晕。如果我不是飞快地翻过他的画册，我相信我一定会因此做上几个晚上的恶梦。与他的画相比，我更愿意阅读《达利谈话录》，这本书比他的画有趣得多，虽然书中也同样充满了怪诞和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因为你在第一页就能看到他的房间里有一只令人畏惧的戴着口套的美洲野猫不停地走来走去），但它并不是画面，而是变成了文字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不但没有感到恐惧，反而获得一种由惊讶带来的快感。我无比喜爱文字这样一种中介，它能神奇地改变事物的性质。



但蒙克的画不会使我做恶梦（除了那幅《吸血鬼》），他的某些画布满巨大的阴影，这些阴影就是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他那幅著名的立于桥头嚎叫的人所叫出的就是一直潜伏在我喉咙里的声音，那些有可能成为我恶梦根源的画面被我与画之间的共振释放了。

我有一大张印着十七幅表现主义版画的印刷品，我把它常年放在我的书架上，我喜欢其中一幅画着其丑无比男人头像的画，我认为他充满了巨大的力度，其余十六幅画均有作品名称和作者名称，唯独这幅没有标上，我始终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和谁画的。表现主义据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态度，在风格上并不统一，我看到这里还有康定斯基和保罗·里克，康定斯基是我所不喜欢的，克里有些线条简洁的画比较可爱，但这二人都不是我心目中的表现主义，我心中的表现主义就是那幅其丑无比充满力度的丑男人（它到底是谁画的呢？），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它以及其他风格相近的表现主义版画，这是我第一次梦见别人的绘画作品。

我所喜欢的美是这样地奇丑无比，如果我承认自己的唯美倾向，那我所认为的最高的美一定是那种富有力

度与激情的美。不知这种美是不是反常规的。我还喜欢克勒惠支的版画与素描，喜欢 195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聂鲁达诗文集》里的版画，尤其是那幅《聂鲁达和他的人民》。

由此我想到我所喜欢的力度来自底层，来自那种被一切人践踏的同时反抗一切践踏的激情与力，但我也喜欢历史上的某种无产阶级文学，我对它们缺少了解，它对于我只是一个概念。我无端认为它们粗糙和平面，缺乏艺术的高度。也许我实在是太浅陋了。不过我一直认为，生命与呐喊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有人因为饥饿，写出“桌子也能吃吗”这样的句子，我一定会被彻底打动，并且流下泪水。

1997 年 4 月 8 日中午

## 艺术与中介

我向来认为怎么写是一个比写什么更重要的问题。

一个自在之物不是艺术品，当然主体的审美也可以把它作为艺术品来欣赏，但它并不是人所创造的艺术品，只有通过艺术的中介把它对象化才能成为艺术品。正如

室内的一张椅子只是椅子，经过梵高旋转的笔触才成了艺术品；户外的树木和女人只是她们自己，通过修拉那种颗粒般的色点的中介就升华为艺术。

小说肯定也是如此。

小说的中介是语言，文学语言将它所叙述的一切变成了文学作品。不管是多么微小隐密的事物还是多么宏大的内容，它们在叙述面前的价值是相等的。我向来这样认为。

我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一种包含了诗性的创作。我的叙述理想是一种诗性叙述。那种向着文学理想迈进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文字伤痕累累，全是路途中跋涉的痕迹。

我确信，有一种小说的精神提升来自它的叙述，在叙述中就获得了升华，它把叙述之物以及叙述者本人都带离了现实而进入艺术之境。有一些人，还有一些人，将深入地进入它并深受感动。

1997 年 3 月 29 日

## 舞蹈

### 红土之舞

云贵高原是一片红色的诱惑，在冬天的太阳下尤其灿烂。红土绵绵，如生命涌动：一条大河，携带红色泥土劈天开地流来。据说壮人择居，一定依水；苗人、瑶人后到，总是离水源较远。云南的壮人，在一片红山红水之中，得天地的精华，变成无数随风歌舞的神。

有马骨胡声自山间来，若有若无，最好不要寻找，遍地都有都没有。最好碰见什么就看什么，走到哪里就看哪里，洒脱如这片山水流云。

在马关县看到棒鞭舞。村头一口大圆井，水泥砌成井围，用水管接来山泉水储在井里。一个老女人汲水洗衣，捣衣声沉实坚硬。四个黑衣黑裙的年轻壮女，就在井边的空地上跑舞，每人手执一根五尺左右的竹棒，有节奏地拍打，敲击肩膀、胳膊、膝盖上端，发出铿锵之声，悦耳动听，律动感很弱。棒鞭又称霸王鞭，是在竹竿上镶进十二组铜钱，每组三枚，敲击时铜钱互相碰撞发声。据说棒鞭舞是节日、喜庆或庆祝丰收时的舞蹈。

站在村口，听见满山满野响着棒鞭的敲击声，那是人们往一年收获的欢庆中，期待着再一次的播种。

有一个寨子，离越南很近，一山之隔，步行一小时就到边境线，这里不是战场，倒也安静悠闲。寨子里舞蹈队、篮球队、版画组都有成绩。版画组的作品曾拿到日本展出。舞蹈队队长发长接近嬉皮士，会拉手风琴，倚墙坐在一只篮球上拉琴，给姑娘们伴奏。四个女子徒手跳着一种很简单的舞。问：什么舞？答：壮族铜鼓舞。知道铜鼓蕴含了诸多文化内容，既是权力的象征，又是宗教祭祀的器物，既在战争中集合军队，又在欢庆场合中作为乐器，便常猜想铜鼓舞会是怎样铺天盖地的大场面舞蹈，眼前的舞蹈就觉得单薄了，明显的已经不是原始的舞蹈，少了许多生命的狂热与庄严。

在邱北县一个叫碧宗就乡的地方，终于看到很可观的狮子舞，在冬闲的田里，人声鼎沸，锣鼓热闹，便挤进去看，一时眼花缭乱，不知所以。细细看来，前面十六个汉子挥舞大刀、长矛、三尖叉、挡靶、半截棍，后跟两个鬼脸壳。鬼脸壳即面具，一人扮男，一人扮女，男的叫小抱，女的叫小鸭，接着是虎气生生的狮子。舞

狮的汉子体力极好，拼命跳跃，那狮子便总是精神抖擞。最后有两名穿着长袍大褂的壮族头人绕场。再打听，知道有婚嫁喜事，看见新嫁娘满身银饰，像一团耀眼的银光。

生命在土地中，土地在生命里。生命的律动正是土地的律动，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灿烂且辉煌。

1987.1

## 山 那 边

### 上 篇

坐在车上，人很恍惚，山极多，路极弯，马达声在寂静中很单调。

觉得生理耐受力已经到了极限，再往前就要垮了，然而汽车好像走进了迷魂阵，被一种巨大的魔法所笼罩，将要在这群山之中走上一千年，好像永远也到不了了。没有路人，没有车，没有灯，很久很久就是这样，过了很久很久还是这样，无穷尽的山路，总是山，总是黑压压的沉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山？为什么不是平原？听见有人说：“隆林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人都怀疑迷了路，甚至司机。因为听说下午 6 点就该到，快 8 点了，还是没有看见任何县城的迹象。就在这时，车子又拐了个弯，一片灯火浮在崇山之中，这就是隆林各族自治县。锁在重山里，走到再不愿走才到的隆林。

去赶集，去德峨乡，那里有苗族有壮族有彝族也有汉族，那里离贵州不远，那条河在贵州叫南盘江，在广

西叫红水河。

牲口市场全是男人和牲口，隔着一处高地，左边的山谷是羊市，右边的山谷是马市。

白色的羊只，黑衣的男人，黑白参差，极是好看。羊们静候在那里，男人或蹲或站，三三两两在交谈，心平气和，抽着竹筒烟，不大像做生意，倒像是来聊天。有成交的，就拿了藤条捆在羊脖子上牵走，那羊往往不大乐意，死命往后拽，买主便要使劲拖。羊市旁还有一处染布的，两个汉子，一个大汽油桶，底下燃着大木柴，浓黑的烟和颜料的蒸汽混在一起弥漫着。地上堆了一堆色彩鲜艳的布、毛巾，有大红的，有大花的。染布的汉子用湿漉漉的黑手一折，那红布花布便到了沸腾着黑颜料的汽油桶里，再用大木棒一捣，顷刻间便变成黑色的了，老女人和小女人们很有耐心地蹲在一旁等着，瞧着。真是不可思议，好好的花布染黑，实在是有些糟蹋，想问问，终于没有问。

隔着羊市和马市的，是肉味十足的熟肉市场，十几个硕大的铁镬席地摆放两排，每个铁镬都是满满一大锅牛肉，上面浮着厚厚一层黄油，冒着热气，铁镬底下架



着些木柴。山民们端着铜盆瓦钵，买了一大盆熟肉和汤，先美美地喝上一大口，咂咂嘴巴，然后端到女人孩子跟前。再搬上几块石头，席地坐成一圈，拿出木勺、饭袋，饭是煮熟了的，直接放进饭袋里，饭袋是麻布做的，透气，上端有根绳子可以提着，木勺黑光油亮，每人举着一个，小口小口边吹气边喝汤。看见有人站着看，他们会邀请你。

过来一群苗族姑娘，极斑斓的一片，上衣或红或蓝，镶着花边，裙子绣着彩色苗锦，走起路来一摆一摆，最引人注目的，是每人头上顶着的头巾，头巾条数多寡不一，有人顶着厚厚的一大叠，有人只顶了三两条，但都用带子小心捆好。苗女的头巾是情人送的，一条头巾代表一个情人，有多少条头巾就有多少个情人。情人越多，头巾叠得越高就越荣耀。你望着她们，果然是极漂亮的姑娘，肤色奇好，白里透红，若为系列化妆品做电视广告，是很可赚大钱的。又全都是双眼皮，眼睛又黑又亮又大，最绝的是那天然雕饰的神韵，谁冲她一笑，她也冲谁一笑，大方得很。既不做作，也不忸怩。

禁不住和她们合影留念，挽着她们，望着镜头，忽

然有人从苗女头上取了一叠头巾顶到你头上，便听见笑声，说你居然有这么多情人，赶紧取下头巾，那苗女接过来往头上一顶，冲你一笑。

又见那边的乡场上有人在跳舞。四个后生边吹芦笙边在地上打滚，叫“滚地龙”，七、八个姑娘拉着手围成一圈，踏着简单的步子跳着唱首，旁若无人，自得其乐。这舞他们跳了几千年了。从村寨里来，从麻栏里来，从泥土里来。走他们的山路，种他们的田，唱他们的歌。有个姑娘抢走了后生的钥匙，她相信后生会来追她的，头上的头巾或许又会增多一条。买盐巴的队伍很长很长。马三百块钱一匹。狸皮二块钱一张。那砣黄蜡是用来蜡麻线的。有黑白相间的织锦。有色彩斑斓的背带。苗人穿裙，壮人穿裤，彝人披着披风。有个小女孩站在路边，头上顶着几条头巾。问：“几岁”“十三。”

买盐巴的队伍还是很长很长。

## 下 篇

红水河从荒莽之中，劈开山石，奔腾而来。河水黄沙呈铜质状，上下翻滚。两山之间，各各从腰间伸出一

巨石，一缝之隔接成桥梁状。这里是天生桥水电站工地。

同是一个隆林，昨天在德峨看到的生活场景在这里恰恰成了现代化水电工地的巨大参照。还相当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最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黔桂交界的荒僻之地汇流、撞击。刀耕火种和世界第一流的美国掘进机，人畜共住的麻栏和铺着豪华地毯的高级宾馆，讲着苗话壮话彝话的山民和操着英语日语德语的各国洋专家。这里有古与今、土与洋、慢与快、静与动、正与反。事物的两个极端，都在这里淋漓尽致。

就像在这千百年来静止不动的混沌之中一下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窗口，参加过引滦入津工程、葛洲坝水利建设的部队开进来了，数以千计的民工开进来了，一流的美国掘进机花了几万元运费也开进来了。在坝首，看不到大跃进时代的人海战术，作业面上，都是现代化机器在施工，人不多，但很有秩序，和原先想象的热火朝天的大型工地不大一样。趁着冬季河床干浅，很快就要开始截流了，施工正在紧张地进行。前不久，由于一场意外的滑坡事件，有 48 名战士遇难，善后工作仍在进行之中。红水河流域险恶的自然条件既提供了丰富的水力资

源，又为人类会征服它设置了重重屏障。施工员说，像这样的高边坡施工在国内还没有更多的经验，在国外也是不多的。在坝首工地，有一种庄严的氛围。人与自然，既有较量，也要和谐，既有矛盾，又要共存。于是便生出许多既喜又悲、可歌可泣的业绩。

隧道施工现场的轰鸣声是间奏性的。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掘进机就在这里施工，要横穿一座石山，挖一条直径为 9.5 米的隧道，把河水引回山的另一边发电。与此同时，在地球的西半边，法国总统密特朗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共同签订了一项协议，在英吉利海峡建造一条海底铁路隧道，以缩短巴黎与伦敦之间的路程，该隧道的直径为 7.3 米。

乘上有轨拖车，呼啸着进入隧道，那速度快得使人有腾空感。隧道挖了有百来米，掘进机与岩石的接触面上有六十几个钻头在同时工作，电脑控制，工作人员寥寥无几，掘出的碎石用有轨拖车拉到洞外。担任讲解的工程师气质很好，挺精神，是武汉水力电力学院八六届毕业生，湖北人。上午去坝首时穿着一套工程兵的军服，下午去隧道工地换了一套印有“江南”字样的米黄色工

作服。

绯红地毯，黑色沙发，乳白色的大吊灯，这是工地指挥部的接待厅。蜂拥而来的报社和电台的记者、各种类型的参观团、各国水利专家都被请到这里。在这间高级接待厅里，会产生时空倒错的感觉，好像有人把你从原始闭塞的山寨一下子推到现代化的都市，历史的正常序列被切断了，文明的断层续上了全新的文明，中间没有铺垫，也不需要铺垫。

月亮很白，有山地感觉，以为是圆月，抬头只看见小半边。在都市，由于灯光和工业废气，观察星空已远不及山地了。有人说，要看哈雷彗星，广西最理想的观测地点是百色、隆林一带。在露天的一块空地上，正在放映广西电影制片厂电影创作会议参观团带来的两个片子：纪录片《白裤瑶风情》和喜剧片《南洋富翁》，这里的剧场效果和前一天在隆林县城放映同样片子的效果不太一样，工程的建设者们都知道马季，马秀一出场就有人喊名字。而隆林族自治县的观众则对纪录片《白裤瑶风情》抱有浓厚的兴趣，那以山歌恋爱、拉郎入室的生活情景，那砍牛祭葬的血的场面显然使隆林的各族观

众产生了一种贴近感，同是锁闭式地理环境的产物，同是南方民族文化的积淀，隆林各族与南丹白裤瑶在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上毕竟有很多同步的地方。

离去的路，又是重重叠叠的山。被山石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有些青绿在顽强地生长。一片烧荒的火宁静地燃烧，美丽、眩目。刀耕火种，火种即先烧荒，趁余温还在，撒下种子，温度使种子的外壳爆裂，芽瓣才得以伸出。在山那边。

写于 1986 年 1 月

### 叙述晕车

晕车是我的酷刑。

我的晕车不是一般的晕车，我只要一坐进汽车就会晕，一闻到汽油就会晕，一看见汽车就会晕，我走路或者骑车时汽车从身边缓慢经过（缓慢经过的感觉容易使我错误地认为自己正置身于汽车之中）也会晕，这些都是在身体不太好、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极端例子。通常的情形是能在车上坚持一个小时左右，一旦超过一小时，无论任何事物都不会使即将到来的晕车有所改变

或减轻。

我先是觉得眼皮发重，我所吸进的好像不是空气而是另一种有重量的窒息人的物质，冷汗紧接着出来，被一种侵入体内的重浊之物挤出毛孔，它们本来支撑着我的体力，它们一旦被挤出体外，我的力气也就随之消失，我立刻感觉到我的四肢发软冰凉，我的呼吸开始急促，心跳加快，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开始晕车了。

这是一个可怕的意识，我千百次地被它控制住，又千百次死里逃生地逃了出来，我怕它怕得要命，我总是躲不过它，它像一个小而隐密的网，紧紧地追随着我，嗖的一下把我网住，它只把我网住，别的人全都安然无恙，他们是自由的人，沐浴在正常的阳光和车途中，健康而明亮，而我却是被囚禁的人，我的阳光不是他们的阳光，我的车速也不是他们的车速，我被悬置在另一个空间，在那里，重浊的物质穿透我的身体，它们要把我体内的一切东西全都挤出来。

这时我总会听见一声惊叫，你们看，她的脸怎么全绿了！这是一声判决，本来我的一切难受只是自己的事，我愿意相信这很快就会过去，只要我咬紧牙关忍耐下去，

www.BOOKOO.com.cn

我不见得不可以获救，我给自己鼓劲，在心里唱歌转移注意力。但是我听见了这声判决，这声判决就像一道闪电，它导致的惊雷在我的头顶轰响，使全车人的目光一下对着我而不是对着它，我一下被暴露了，被暴露的同时被隔绝，被区分，在众多的目光之下我感到我的脸我的全身瞬间变成了一种黄绿的颜色，我成了另一种人，我感到了彻底的绝望与无助。我胃里的东西开始上升，那是一种与我相对抗的力量，我在最后的时刻深呼吸，想要阻挡它们，我一下就失败了，胃里的东西喷得满身都是，溅落在车座和车厢里，难闻的酸腐之气浓重地弥漫、缠绕。

如果全车都是陌生人，我会遭到共同的厌恶，公愤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无律的浮动使我感到羞辱（呕吐之后有一段短暂的轻松，使我去除了晕车的枷锁而恢复自尊心）如果全车都是相识的人。我就会得到一些关心，有留车药、糖果、活梅放到手里。但车里的区阿妹会使我无地自容，在勤人面前出丑比引起陌生人的厌恶令我更难受，我心里明白热八月陌生人一样讨厌呕吐，只不过被礼貌地掩饰了。



这种想法使我心理阴暗。

停车的时荆就是较命的时刻。停车的时候男人和女人分别到两边的树林组方便，我过高汽车就像进出了牢狱，站到地上就感到了轻松和自由，晕车的感觉奇迹般地在几秒钟之内全部消失，我不需要像别人那样去方便，因为我已经轻度脱水，两眼深陷了。

在我有了单位后，每次坐汽车故都要在随身携带物品里放上单位的牛皮纸信封，以供呕吐专用、这种信封的好处是坚挺（拿在手 L 不像图闹线那样软、那样随着流质移动）、开口稳定、饱满（塑料袋的开口总是贴在一起）、纸厚，在一次呕吐的时间里绝不渗漏，吐完 2 后随手扔出窗外，下一次呕吐（相隔几分钟至半个小时不等）再取出一个新的，它干净，易于放进包里，易于抽取，更让人高兴的是，在任何一个单位，这种信封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如果坐两三个小时事，我就带两三个信封。如果少半天车，我就带五个，如果坐一天车，我就带十个 O 信到使我感到极大的安全与安定，它使我轻松、从容、JL’理稳定，它比任何晕车宁、任何口感良好的小零食、任

何千奇百怪防止晕车的伎俩（往肚脐眼贴伤湿膏、使劲掐虎口、嘴里含一片生姜等等）都更使我放心，我知道我将安静地坐着、不惊不乍，文雅地不动声色地晕车。它保证了我的自尊与洁净，除了同座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晕车吐得一踢糊涂。凭着这些牛皮纸信封我经历了十分艰苦的考验，我乘坐卡车、防疫车、吉普车、面包车、轿车跑遍了西南各省，车子每天蛇行在盘山公路上，总是车一停就吃饭，一吃完饭马上开车。还有一次，我乘一辆日本巡洋舰吉普车从内蒙呼和浩特走了三天草原自然路到一座草原上的城市，返回的时候仍是坐汽车，早上6点出发，晚上10点半到北京，车上所有的人都坐得全身关节发硬两眼发直。

长途跋涉使我得到锻炼，使我在一次旅途的后半截不再晕车，这个发现使我惊喜交加，无限激动，我想从此我就解放了，我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到任何地方去，原来人们所说的晕车的原因是因为坐得少不适应，这的确是一个真理。但下一次我的晕车又再次开始，从天昏地暗到重新平静。

任何锻炼对我都不起作用，这使我放弃全部的幻想，

面对这必不可少的灾难。

## 女士芳龄

年龄是女人最大的压力，她们总是想方设法将它瞒住。

为了使这种隐瞒合理化，文明世界制订了一条不许问女人芳龄的规矩。打听女人的年龄是不礼貌的表现，所有的礼仪书籍和礼仪培训都这样告诫那些打算变得更更有教养的人。我们总是不能从容操练那些我们用起来并不娴熟的隐瞒年龄的技巧，据说这些技巧只有在西方社会浸泡过的女士才能使用自如，而我们由于对此生疏所以总是神情紧张，正如一个战士面对一样陌生的武器。

神情紧张使我们面部的肌肉显得古怪、坚硬甚至凶相毕露（这是任何人都具有的潜在的一面），同时我们天生不善于此道。无论我们说出“你看呢？”“你这个问题怪怪的”或者“不许打听女士的年龄！”或者“还没到一百岁”或者“二十八岁以上”等等，我们都无法理直气壮，我们总是心虚。我们的真实年龄像一块坚硬的石头、或者尖利的砂粒、或者黄蜂的刺隐藏在我们的心里，它

跟我们的血肉粘连在一起，它在我们的胸腔里转动，磨擦的粗糙感觉使我们不舒服，它上升到我们的喉咙，它无法在那里停留，它终于被我们说了出来。

这使我们前功尽弃，心情黯淡，使我们的自我感觉降到最低点。我们最初的坚守因为我们最后的放弃而显得滑稽，坐在我们对面的男人不战而胜。而我们的皮肤（我们最重要的屏障）因为这强有力的刺激和暗示而显得比我们真正的年龄更衰老，它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永难复归。

如果女人没有年龄的压力该是多么幸福！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那些使我们不必注意年龄的男人恰是一个性能良好的减压阀。在他面前我们不需要把年龄堵在心中和压在喉咙里，我们的面部肌肉因为放松而显得柔美，我们的噪音因为真实而圆润，我们甚至能活泼起来，我们说出了自己的年龄之后就忘记了它（它比不说出来要安全得多），去掉了年龄的压力我们像变了一个人。你要知道长寿的秘密吗？那就是忘掉自己的年龄；你要知道青春永驻的秘密吗？那就是忘掉自己的年龄。

## 有一些孤独的人不谈孤独

有一些孤独的人，他们从幼年开始就丧失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通道，他们被自己或被外界关闭，有一些东西总是将他们与世界隔开。他们没有爱，没有关心，他们像草一样生长，像草一样接受这个世界所能给予他们的最慷慨的事物：阳光、空气和水。他们独自高兴，一个人哭泣。他们长大后，那种与他人的隔膜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发加重了，中间的沟壑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日益加深，这种与别人隔开的东西来自他们的内心，他们能清楚地听见这片荒凉的声音，像水结成冰，把柔软流动的东西变得坚硬冰冷。它们日益堆积在我们的周围，四面的冰墙使我们寒冷彻骨。

但我们无法战胜自己和他人，孤独是强大的，它无形无色，像空气一样巨大，对它的笼罩和吞噬，有一些人注定无法逃脱。

也许孤独的人会在孤独中获得自由，他们的心灵是一片草地，对于这个世界日益堆积的混凝土、塑料、磁盘以及废水，没有通道也许会更好。

我没有听到这样一些人谈论孤独。

另有一些人，他们到处诉说孤独。我的一个朋友把这种情况称为夺过话筒谈孤独。

这种孤独是热闹的。

我羡慕他们。

也许由于这篇文章，我自己也正在变成这样的孤独者。

1996 年 3 月 11 日

## 说话

### 关于《一个人的战争》及其版本

《一个人的战争》是我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写于 1993 年 4 月至 9 月。相对于这部小说发表后的经历，它的写作过程简单之极。事先没有蕴酿。在动笔写作的前一天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在这之前我写了《回廊之椅》，觉得自己重新找回了对小说的语言感觉，语感的到位使我感到好像自己正坐在滑梯口上，有一种往下滑的冲动。于是在 93 年 4 月的一天，我觉得自己很想写一部长一些的作品，于是我提起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女孩多米犹如一只青涩坚硬的番石榴，结缀在 B 镇岁月的枝头上，穿过我的记忆闪闪发光。这是当时的开头。这个开头使我感到小说将会十分顺利地一气呵成。后来确是如此，手稿干净整洁，除了章节的前后顺序作了一点调整，所有的语句几乎很少改动。我当时觉得它们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水滴，圆润而天然。

当时我的现实处境十分糟糕，高度的精神压力和超常的工作忙乱，但它们没有侵入我的作品。写作使我在

瞬间飞离现实。它是我免受致命伤害的飞毯。

关于《一个人的战争》的版本，我想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梳理。此作首刊于《花城》94年2期，发表出来的时候出了一个错误，把第四章的标题“傻瓜爱情”排在了第三章三分之二的地方，我当时曾希望登一个更正，未能如愿，一直耿耿于怀。这是第一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是甘肃人民出版社94年7月版，这是一个十分糟糕但又流传甚广的版本，某些人身攻击和恶意底毁以及误解大概就来自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封面用了一幅着起来使人产生色情联想的类似春宫图的摄影作封面。关于春宫图一说，并不是我一己的夸大和偏见，而是报刊上评论家和读者的原话。面对我的诘问，责编强调说这是一幅由著名摄影家拍摄的著名的摄影作品。这还不算，这本书内文校对粗疏，最严重的一页差错竟达15处。另外第五章本是我的一个独立的中篇，人物、写法、情节等都是独立的，但我还没得到修改的时间书就出来了，作为长篇的一章实在是不伦不类。出版社通过责编作了一些道歉和解释，并保证马上换一个封面，出一个订正版，我接受了。但我一直没有等到这个版本。



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才在 1995 年 10 月份收到一份同意我撤回专有使用权的函件。

第三个版本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96 年 10 月版，这个版本的出版过程亦十分曲折。我收回版权后于同年 12 月与河北的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就在这个月，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发表了一篇很不负责的批评文章，称《一个人的战争》为“准黄色”，是“坏书”，重新签约的责编打来电话，说领导看到了这篇文章，对是否出版该书拿不准，说最好能在同样的版面发一篇正面的文章，但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他们退回的书稿，并让我尽快将合同寄去，以便按合同付我退稿费，但我至今没有收到退稿费。96 年 4 月我又与“世文图书公司”签约，授权该公司出版此书，由于某些不负责的批评，公司联系了七家出版社均被拒绝了，最后才由边远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接受下来。这个版本在题记和内文都作了一些删改，这是我所作的主动的妥协，因为据世文公司的人说，有家出版社在请专家审定此书时，专家说要把第一章全部删去、而且其余各章都要进行大的改动才能出版，我想不如我自己主动作出让步，以免有人看了不舒服。

第四个版本就是这次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所收的版本，这是我为文集所修订的一个完整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我将首刊时的题记全部恢复，并把这段话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作为结尾。我觉得这样更有力度，更具震撼力。题记的第一段仍保留，并放到全书的最前面（而不是像首刊时放在第一章的前面），第一章的标题也由原来的“一个人的战争”改为了“镜中的光”。我还删去了少量自己看起来不那么顺眼的文字，主要是开头和结尾各删了两段。从整体来看，基本上是一稿时的样子。这是我感到满意的一个版本，在此我郑重地向所有想要读一读《一个人的战争》的人推荐这个版本。

有关《一个人的战争》要说的就是这些。

1997年3月

### 炸掉《思想者》

有一个晚上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一部法国电影，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叫“罗丹的情人”还是叫“卡米尔·克洛岱尔”，从此这位法国天才的女雕塑家一生的遭遇，常常在夜晚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揪心地疼痛。

青春美貌的卡米尔披着她那洁白柔软的长袍轻盈地在我的阳台上走过，阳光在她金色卷曲的头发上勾出一道灿烂的金色镶边，这道金边沿着她的额头、鼻梁、嘴唇一直延伸到她的肩头，低徊华美的女声哼唱（请想象《美国往事》和《西部往事》的主题歌）从那道金色镶边上滑来，它们带着令人心痛的往事在弦乐上滑动，孤零零地出现在许多年以后的一个中国女人的视野里。有一个夜晚的镜头（电视剧？电影？或者是书本？）覆盖了那道金色的镶边，穿着一袭粗布的中年卡米尔手握石头，向一扇散发着家庭幸福灯光的窗口奋力掷去，我听见玻璃碎裂的声音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那个异国的春夜传来，我真愿意自己就是那块石头，替不愿意继续当罗丹情妇而穷困潦倒的卡米尔一泄孤愤。我再次仇恨罗丹，为了他的名声不受“玷污”，人们把卡米尔软禁在疯人院里，让她在那里活尸般地煎熬了三十年，到死的时候没有亲人和遗产，只有一个蹩脚铁床和带豁口的便壶，正是因为罗丹，她被人称作“母狗”、“女妖精”“狐媚子”，是罗丹使她永远没有丈夫、家庭和孩子，使她如果不离开他就只能永远在他的荫庇下做她的学生、情妇和“灵感的启示者”。

我真后悔没有学董存瑞扛上炸药包到曾经展出的“罗丹艺术展”的中国美术馆把罗丹的雕塑炸个稀巴烂，我认为这件事实施起来并不太难，现在距离董存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高科技的 90 年代，炸药的体积一定用不了一大包，若能弄得到高强度的炸药，放在化妆盒里就可以了。甚至用不着进大厅，那时候他的思想者就放置在美术馆门前的空地上没有大铁门隔着，只有低矮的铁栏杆，“思想者”直接裸露在空气中，面对着大街上川流的人们展现着罗丹先生的倨傲。我将在夜色苍茫行人稀少时分（深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栏栅前更容易引起值班者的注意），或者更早些。在美术馆清场之前，我怀揣装有高强度炸药的化妆盒，我装成照镜子与情人相会，这时我掏出一包坤烟和打火机，当然，最后我就是用点着的香烟来点着化妆盒里那根细如发丝的导火索的。之后我迅速撤离现场就像富有经验的战士，飞快跑到馆前一侧的树林里，我听见背后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地上微微震颤了几下，我回过头，看到火光在罗丹先生的杰作上随风舞蹈，一朵庞大的黑色蘑菇云从思想者的头顶升起，我感到无比畅快。卡米尔·克洛岱尔于 1943 年秋在巴黎远郊蒙特维尔格疯人院离世，整整半

个世纪后，一个中国的女子捍卫了她的尊严，报了她的深仇大恨，这几乎成为该年度最轰动的新闻之一。当然，若罗丹先生还在世，我一定不会撤离现场，我将像那名刺杀印度总理拉·甘地的女人一样，在献花的时候引爆炸药，我也随之粉身碎骨。

毫无疑问，思想者现在还完好地呆在它所该呆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在想象中把它炸掉。

### 1995 年的性别歧视

1995 年是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年份，据说在这一年里，女性权利得到了大大的张扬，女性问题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有一首歌还唱道：小女子抖了一回精神。各家出版社纷纷投资，成套出版妇女题材的丛书以及女作家作品集，女作家们到处签名售书。这一年，从天而降的集体狂欢遮头蔽脑地落到了不少女性的身上，夏天的浓烈气氛几乎跨越了 95 年的所有季节。

在这一年的秋天，10 月份，由于外界的情势所迫，我不得不四处求职，以便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职业。我心目中理想的职业不外是文学杂志或出版社。我托了

朋反又自己找上门去，问了三四家，结果却是出奇地一致，他们说我们这里女的太多了，他们说女的一概不进。后来我打听到一家老牌的出版社下属的一家周报有一个空缺，这家出版社的领导我原本也认识。于是我从直接主管的中层领导开始，一直找到社领导。各级谈话都很顺利，我感到此事可能成功，因而心情愉快。但事情忽然就搁浅了。据说有一位领导认为，进该社的女干部最好不能太难看，也不能太好看，生活方式不能太守旧，但也不能太新潮，否则会给出出版社招惹麻烦。又据说该领导看过我的照片和作品，认为我不符合这四不原则，属于会带来麻烦的人。

我一下全懵了。我十分认真地对转述的人说，我绝对符合四不原则，既不难着，也不好看，穿衣打扮既不呆板也不太具个性，而且一不闹离婚，二不当第三者，三不搞同性恋，如何给出出版社找麻烦。还是不成，有朋友替我分析，认为是我的小说给出出版社领导造成了错觉，等等。

但我忽然感到了自己的不得要领。在一个男权笼罩一切的社会里，你无论如何都不会符合他们的原则的，

所谓难留还是好看，是以他们的目光为标准的，生活方式的开放与不开放也是以他们的看法为看法的。你只有完全交出自己，按照社会的目光（基本上就是男性的目光）塑造一个合规中矩的自己，即使这样，你最终还会听到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女的。

在 1995 年这样特殊的年份经历性别歧视，这使我心怀悲哀与激愤：女人是否只能向整个社会低头？

1996 年 1 月 23 日于北京东四十条

语词：以血代墨

以血代墨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词，如果我们不是首先由此想到残缺、压抑、呐喊、眼泪这样一些过程与事物，我们至少会想到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这句至理名言，好在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与艺术的本质有关的语录得以畅行，这使以血代墨在它的衬托下显得不那么叛逆和充满破坏性。

以血代墨被认为是女性写作最重要的特质，最早由美国女性主义诗人里安所提出，我在我的朋友徐小斌的笔谈中看到了这个词，它因为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使我备

感震撼，在它闪电般的光芒中我看到男女两种人类无所不在的区别。男人和女人由不同的血液所构成，有不同的流向与温度，使它对世界的感受也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在阳光下和空气中，几千年凝固不动。据说 90 年代的景观之一就是女人的嗓门越来越大，快要变得跟男人一样大了，这些声音由细小变得粗砺，一点也没有以前的优美流畅，它们从窃窃私语的房间来到蓝天之下，迈着一一种特别的步伐。

就是这样。

有什么比这更高贵的呢？犹如大海遮盖海浪，月光笼罩冰山。女性的声音既是血液又是风，它的意义同风一样广阔，既通向光明又通往神秘的道路，既像静默那样进入心的最深处，又像轰鸣那样直接震荡我们的皮肤。以血代墨，这同时是心灵与皮肤给予我们的启示。

它们将到达怎样的倾听者那里呢？

作家还是女作家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潜意识的第一个反应是前者。我的潜意识肯定认为作家必须要比女作家高出不知多少



倍，更有档次，更有身份，更能使我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使我的目光专门盯着社会、政治、历史的种种宏伟而高拔的山峰，总是想着二十年磨一剑，弄出一部史诗作品以永垂青史。女作家的自我暗示总是使我不自主就陷入了个人感觉的泥潭，永远也拨不出脚来，使我远离中心，自甘边缘、自甘落后。即使你有时以为自己抓到了一种木质，并且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你曾以为你的表现深入而丰满，遍布着时光中的触角、气味、细微的声响和明暗的各个层次，这种时光不同于所有概念中的时光、历史中的时光而别具一格。但你不敢相信它的价值，你从来都不自信，觉得别人的贬低和否定天经地义。

关于作家还是女作家的暗示，来自整个社会，也来自我的同类。我总是记得我们的前辈丁玲，据说她是坚决拒绝女作家这一称呼的。我总是看到或听到同性别的作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响亮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一个女作家”。这些观点潜入了我的意识的最深处。但是不能细想，一细想就可能心里疼痛。一个自强的口号给我的暗

示是：女人比人低一等，女作家比作家低一等。我们无端就低了一头，无端就遭到了蔑视，而且别人还会觉得这种蔑视是恰如其分的。到现在，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我是否应该认为为自己的性别写作是一件庄重的事，就像阳光下的天空一样美丽，无需隐瞒，无需自卑。我是否应该这样回答：对于我来说，我认为自己同时是人和女人。